

Crossing Borders
Transcultural Feminist Practices

◎ 王政 著

越界

—
跨文化女权实践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女性意识”、“性别意识”、“女性味”、“男子气”，这些词语在今日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社会性别”？它同中国“现代性”和“全球化”有什么关系？它对理解当代社会中的男男女女有何意义？旅美学者王政以跨文化女权主义视野和后结构主义方法，剖析这类常见词语所蕴含的复杂社会文化意义，揭示社会性别话语的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革的密切关系。本文集以对文化两栖者个人经历的回顾、评点社会文化景观的散文、学术论文、讲座报告等多样体裁，深入浅出地介绍女权主义核心概念，展示女权主义学术在国际学界的发展概貌，也记录了作者推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些实践与思考。“文化，包括社会性别文化是人的建构，它同时又塑造了文化中的人。多一种分析文化建构的工具，将有助于我们增强抵抗强势文化控制的能力。”文集的女权主义分析框架为读者提供了解构男性中心文化密码的棱镜。

ISBN 7-201-04804-X



9 787201 048048 >

ISBN 7-201-04804-X

定价:20.00 元

越界

——跨文化女权实践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 / 王政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5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书系)

ISBN 7-201-04804-X

I. 越… II. 王… III. 女权运动 - 文集
IV. D4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576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1 插页
字数:170 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20.00 元

前 言

对文化两栖者来说，“越界”可能是一种熟悉的体验。跨越国界的旅行虽然有时差和过境手续造成的疲惫和麻烦，却是一种相对轻松的“越界”。跨越文化的界限则艰难得多，因为这意味着对自我的突破和重构。记得1985年秋初次抵达美国，一位同龄美国朋友的父母来机场接我。我以中国小辈对长者的尊敬询问如何称呼他们，二位白发老人毫不迟疑地说，就叫我们的名字好了。这个回答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从小我家教是对长者甚至不可用“你”“你们”“他”“他们”这类人称代词来指称的，这直呼其名如何使得?! 虽然有老人的许可，但看到白发与皱纹便产生的条件反射使我的舌头转不过来，别扭的感觉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不起眼的经历其实是跨越文化界限的开端，以后在异域文化中所经历的无数不适、别扭、困惑都不断促使我去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文化界限，去反省在特定界限中构成的自我。而自己选择的文化比较研究，也便于我不仅从经验也从理论层面来理解中美各自的文化界限。

“中美各自的文化界限”是个粗略的概念，因为中国人美国

2 越 界

人在具体的时空中都被更具体的界限构造,也在不断制造名目繁多的界限和区别。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性别、地域、宗教等等,这些在具体时空中产生的界限交错起来塑造着每个具体的人。在被前人划定的界限中生存较有安全感、稳定感。而变动的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往往既使习以为常的界限显得格外不合时宜和束缚人,又可能产生维护既往界限以求稳定或巩固现存权力关系的强烈欲望,所以打破界限和维护、巩固、再制界限的斗争在历史上往往平行发生并绵延不断。

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在全球各地最明显和最大规模的“越界”是女人的越界。生产方式的变迁和全球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各类男女的生存状态,由宗教、法律、习俗、政权、婚姻制度、劳动分工等等社会体制维持的男权文化对女人的界定和限制受到了全球各地女权主义者的挑战和冲击。她们不仅身体力行地突破男权文化对性别的限制,也力图跨越国家、民族、种族、阶级等种种在男权文化中建构起来的等级界限,并在这样的实践中寻求跨越地域文化差异的全球联盟,如世界妇女大会所生动地展示的那样。当资本主义全球化使资本和资本主义价值观跨越国界在世界各地巩固和复制各种等级制时,全球各地女权主义跨文化跨国界的抵抗行动正日益壮大。“跨文化女权实践”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以此为题不仅是为了说明笔者活动的实质,更是为了引起国内读者对这一女权主义“全球化”的关注。

女权主义的越界行动表达的是人对自己生存处境的一种新的觉悟,这种觉悟却并非天然根植于女人的生殖器官。无论何

种性别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对外界和对自我的新的认识。但是因为女权主义的“越界”历史追求表达的是对公正、正义理念的追求,是对各种享有特权的阶层及其所制定的规范和意识形态的尖锐批判,她使许多在现存界限和等级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感到不安,甚至反感或视为异己。作为一种来自边缘的挑战力量,她被男权中心的主流社会文化排斥完全不足为奇。男权主流社会对女权主义的排斥是发展女权主义的必要性的反证。主流社会政治文化对女权主义的吸纳接受或排斥拒绝程度是检测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公正程度的有效指标。

这本文集记录了过去十多年我寻求了解文化界限,并以女权主义的视野跨越界限的部分思考和行动。因为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工作,我的身份在国内一般被界定为“海外学者”,但这个“海”不仅无数次地被跨越,在我每天大量的网上工作时间里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确实,互联网为跨文化女权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过,跨越国界的便利并没有减少突破男权文化界限的艰难。那些界限和准则长久以来甚至被女性自己也内化为自我的组成部分,更被全球化资本主义披上一层“现代化”的外衣,因此即使在意识层面上认同女权主义理念的人(包括本人),在无意识层面上依然会有种种不适或困惑,往往难以清醒地识别哪些是必须跨越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女权越界行动是重构自我的一种努力,是一种未完成状态。

当然,女权主义的越界实践目标不仅是自我完善,更是改造社会,这样的实践不可能仅是一种个体行动。在过去十多年里,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国内外诸多女学者和活动分子,并和她们

一起从事了一些推进女权主义学术发展的工作。文集中的许多思考都来自这些集体实践活动,有的文稿也是这类实践的记录。如第1篇所展示的,我对女权主义的认识是在中国和美国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包括学术活动中不断深化的,而认识的变化则是新的越界行动的基础。这本文集除了第1篇,其余各篇基本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便于读者较明晰地看到我的实践和认识的变化。文集中第7篇至第12篇都是基于我在国内一些高校的讲课和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的,在此一并感谢各位师生精心的文字转录工作。

自1999年以来,我和国内许多高校女学者一起开展了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课程发展工作,试图通过高等教育中的课程改革创新,在中国把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这是跨越知识生产领域中的社会性别界限的必要步骤。这个步骤本身又涉及到跨越传统学科的界限和知识生产体制的种种界限。作为一个往返于中美学界的中国女权主义历史学者,我清醒地看到,此刻若不突破这些界限,中国的知识生产在21世纪将继续复制男权文化和等级结构,从而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中国现存的各种等级差异,也会扩大中国知识界与国际知识界在认知结构上的差异。改造知识生产是女权主义学者的重大历史责任,我衷心希望有大批年轻学者积极参与行动,让我们共同努力通过重构知识体系来开创属于21世纪的新文化。

谨以此文集献给正在和将要从事女权主义学术发展的同行们。

王 政

2004年2月于密歇根

目 录

前言/1

心智的选择/1

“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

——对当代中国女权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析/25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序/53

当代中国妇女研究/65

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92

孔雀舞与社会性别/115

高等教育中的妇女学中美比较

——在“社会性别与教育”读书研讨班上的发言/120

突破单一的“地位”分析框架/157

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174

关于 gender 的翻译/183

妇女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193

面对女权主义学术/208

心智的选择

1983到1984学年,我参加了美国福布莱特文化交流项目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办的高校师资培训班,专修美国史。第二学期美国教授布置大家各自选题做篇结业论文。我的选题是“美国的职业妇女”,至今我也不太明白当初怎么会选这个题目的。在这之前,我从未写过关于妇女的文章,思考问题时也很少想到自己是个女性。当时交往的朋友中男性多于女性,常爱同男性朋友们就时事、政治、文学等不涉及妇女的话题海阔天空神聊。那位美国教授是传统的男性学者,也没在课上讲过美国妇女。全班十几位同学,只有我选了关于妇女的题目。今天细想起来,我当时对美国同类的兴趣一定同自己的潜意识相关。

论文怎么写的,今天已毫无记忆。因为学期中母亲去世,对我打击非常大。今天的记忆中只有围绕母亲去世的一切细节历历在目。提这篇已经忘却的论文是因为它竟然是我人生转折的一个标志。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是武汉大学教师,他得知我选了妇女题目后,便找我谈,说美国史学会的秘书长刘绪贻教授在编一套美国史丛书,想找一位学者写美国当代妇女运动,问我是否

有兴趣。我当然受宠若惊,因为以前从未写过书,美国史也刚开始学,一下子就有人约稿,自然立即答应下来。这期间我正在申请赴美留学,那位同学也认为我去美国后,搜集资料就方便了,写这本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1985年,我被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历史系录取,成为美国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因为有写作任务在身,我要求一位美国妇女史教授做我的导师,我的研究领域便也是妇女史。当时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压根儿没想过我要做妇女史学者。在那一阶段,自己兴趣最浓的是文化比较研究,选了不少这方面的课,后来还获得了学校里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和比较历史”课程的结业证书。

可我那位美国妇女史教授罗森把我当做她第一个学妇女史专业的外国留学生认真对待,手把手地教。当她得知我想在学习期间完成一部美国当代妇女运动史时,更是热情地帮我组织座谈会,推荐书目,介绍我参加各种妇女活动,目的是让我身临其境地了解美国妇女运动。在初期的所有活动中,我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参加的,只是出于好奇去了解。我也经常被邀请在各种场合介绍中国妇女的情况,我总是毫不犹豫地讲中国妇女在社会主义中国所享受到的男女平等。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常常会无意识地扮演无冕大使的角色,我到处宣传中国妇女的社会进步主要倒不是出于民族主义,而是真心认为自己是个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并且相信中国妇女的解放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的。在美国妇女史课上了解到的美国妇女受歧视的历史和现实更使我对自己作为被解放了的中国妇

女的优越地位感到自豪。“怪不得她们要搞女权运动呢！她们遭遇不平等的事太多了！”我心里常常这样感慨。有一天妇女史课上几个美国女同学在激动地讲述什么，原来是学校里有一帮学生为了挣钱，搞了部 X 级的黄色片子来放。学校里的妇女组织很气愤，决定晚上在电影院前搞抗议活动。我问是什么样的黄色电影，因为我从来没看过黄色电影，对此没概念。罗森教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搞美国妇女研究，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黄色电影。我建议你去看一下这部电影。”我那时很穷，学校里放电影虽然只要两美元一张票，一般我也不舍得去看。这次为了研究了解，决定去看一场。

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完全被大银幕上赤裸裸地表现的对女性肆无忌惮的污辱所震惊。更令我无法容忍的是剧院里一些男学生每每在有污辱女性的场面时起哄。我觉得简直像自己被一群流氓所包围，遭到强暴，那种深深的屈辱感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我不断提醒自己是干什么来的，坚持到电影结束。我冲出电影院，跑回住处，一进门就向我的美国女友大声嚷道：“你们如果不禁止这种东西，你们美国妇女永远不可能获得解放！”说完冲进自己的卧室大哭起来，让眼泪冲洗满胸的屈辱与愤懑。

我显然认为自己处于比美国妇女优越的境地。我的人生经历确实很顺利，在家是受到父母宠爱的小女儿，上学工作也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女的而受到歧视。相反，有好几次因为是个女的而获得男性所没有的“优待”，比如在农场时被挑选去广州交易会当讲解员，被挑选去主演一部电影等等。当然，那时我从来不把自己的机遇同性别相连，因为我坚信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

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我们农场在两万多名职工中发展新党员,第一批四个人中就有我,当时我才18岁。1977年恢复高考,我以初中二年级的学历考上大学。在大学里又被评为市“三好”学生,优秀党员,也是校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又被留校当教师。在我看来,我的人生就是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写照,尤其是在同我母亲的强烈对比之下,我更感到中国妇女的进步巨大。我母亲是裹过小脚的文盲,包办婚姻嫁给我父亲,生了9个孩子,操持家务一辈子。

因为认为中国妇女已经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解放,我在美国妇女史课上或参加美国妇女的活动时常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她们的路还长着呢,连产假还没有呢。”在当时的在我看来她们的历史与现状都跟我们很不同,她们的女权运动对我、对我们国家都没什么关系。比如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持续了70年,而我从来没为选举权操过什么心,那个权利在中国宪法中是早为妇女规定的了,但也不意味着什么。两个国家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相差太大,难以借鉴。我当时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在自己将要写的书里尽可能忠实地反映美国女权主义的历史和现状,使国人能跨越文化地、而又设身处地地感受美国妇女的状况,多一分了解,少一点误会,仅此而已。

当然我也经常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美国女权主义者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所感动。1986年春美国各地妇女组织联合起来在全国几个大城市同时进行示威游行,维护妇女的堕胎权。我们学校的女权组织也联系了好几辆大客车,把参加示威游行的志愿者运送到洛杉矶。一位女权主义男教授是我的朋友,通知

了我这一活动,我便同他一起上了路。汽车从戴维斯开到洛杉矶要八个多小时。我们是周五晚上出发,在车上睡一夜,第二天一早抵达,便参加游行。那天有几万人从西部各地涌到洛杉矶参加游行,男女老少以及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都有,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举着自己准备的标语、横幅、小旗,呼喊口号唱着歌,井然有序地在警察划出的街道上行进着。突然天下起了倾盆大雨,许多游行者没有带雨具,但没人离开队伍到屋檐下避雨,大家继续精神抖擞地向前走。

我也在雨中走着,不过打着我哥哥为我准备的伞。我心中既感动又惭愧,因为参加这次游行一是出于好奇,但主要是借机来洛杉矶同在此做访问学者的哥哥会个面。免费坐车来洛杉矶一趟,对我这个中国穷留学生来说是机会难得。在这之前,我在中国倒是参加过多次游行,但那都是学校或单位组织的,决不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什么主义或原则,为了发出自己的呼声,实现一群人的理念,维护一个群体的利益,而不计得失地自发行动。我看着那些淋在雨中的普普通通的美国人,我觉得她(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美,因为她(他)们每个人都洋溢着那种追求理想的独立的人的精神之美。

晚上夜车返回。头天在车上过夜,接着是淋雨游行,我已经觉得疲惫了,但同车的美国人(大部分是女学生)却兴致勃勃地唱起歌来。在一位音色非常优美的女学生的带领下,她们唱起了一首又一首民权运动中流行的歌曲。“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那歌声传出了她们美好的理想,表达了她们坚定的信念。那歌声伴随着车身有节奏的晃动触动了我的心

录。我在美国史课上放的历史记录片和历史书中熟悉了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中流传深远的歌曲,这是那一代美国人追求平等正义的理想精神的写照,现在由身边20来岁的女学生咏唱着,使我一下子把许多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和今天的现实联系起来,清楚地看到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理念和议题还在继续着,不仅中老年在继续为实现平等正义努力,年轻一代也踊跃地加入了这个行列。我被这些乐观地为理想而奋斗的美国人深深吸引。

美国妇女史的课越修越多,与修美国妇女史的研究生们也日益熟悉起来。闲时大家聊天,美国同学爱听我讲上海的生活。有一次我讲述了在上海坐电车遭遇扒手的经历:我下车时感到有人碰了一下我的口袋,我下了车一摸,皮夹子没有了,车门尚未关,我转身又跳上了车,指着那个碰我口袋的男人让他把我的皮夹子交出来。那男人慌张地否认,我看见他已把我的皮夹子丢在地上,便拣了起来,在他面前挥了一下,说:“就是你偷的!”然后下了车。美国女同学们听了高兴地笑起来,说:“你好勇敢!”我说:“那怕什么!那么多人,他敢把我怎样!”过了些日子,又和这些同学聊起上海的事,不知怎的又讲到坐公共汽车的经历,这回讲的是女人坐汽车不可避免的气恼事:在拥挤的汽车上经常会被下流的男人触摸。同学麦凯听到这儿,瞪大了眼问:“那你是怎么对付这种情况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什么办法,只好躲避开呗!”麦凯追问道:“为什么你抓小偷那么勇敢,面对这种人却要躲避?”这个尖锐的问题使我一下子语塞,我想了一下,解释道:“在车上揭露这种人的话,人家都会看我,反而会

觉得是我不知羞耻,我会非常窘迫的。”我知道自己的回答很有问题。果然麦凯又严肃地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你觉得这种情况正常吗?妇女就应该忍受这种状况吗?”她的连珠炮发问和她含着责备的眼神使我哑口无言。

麦凯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正面严肃地质疑我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她一定不知道正是她率直的批评性的发问使我开始了对自己的反省。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如自己想像的那么解放。我从来没有想到把那种令我胆怯想要逃避的场合同妇女解放的议题相连,当然更没有去理性地分析这种状况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特定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规范。在我所熟悉的中国妇女解放理论中,妇女解放是以女性在社会领域中的参与程度来界定的,这套理论没有涵盖女人生活的每一个场所。而在我简单幼稚的思维方式中,那些没有涵盖的部分似乎与妇女解放无关,也从没意识到那里尚存在许多问题,尽管我体验过女人的烦恼、目睹过女人的苦难。麦凯的问题使我悟到美国女权主义关注的一些议题同我的生活也有关系。女性在公共汽车上的遭遇可以毫不勉强地被界定为“性骚扰”,而以前我总认为这个美国女权主义发明的词只是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困境。

麦凯的提问不仅使我看到社会主义中国也有“性骚扰”,更重要的是使我体会到女权主义批判性思维方式的力量。为什么在她提出那个尖锐问题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上的矛盾以及这矛盾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因为我像千千万万中国妇女一样,把社会对女性的规范作为天经地义来接受了,更确切地

说,我缺乏分析社会文化对男女行为界定和规范的任何范畴、概念、语言,仅仅是信奉男女平等显然并不足以使我有识别不平等的火眼金睛。麦凯能在我习以为常的事情中敏锐地看出问题是因为她具有女权主义的基本概念和观察角度。与麦凯相比,我这个“解放了”的中国女性显然还有不少盲目性,对自身及所处环境的认识还很肤浅。

麦凯提问引起的反思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妇女史课上,在阅读中,在与老师和同学的交谈时,在听演讲、参加妇女组织的会议等等一系列活动中,我不再以旁观者的心态把看到的听到的归入“她们的经历”,而是会深入地想一下她们对事物的分析与我个人和中国妇女的经历有没有关系。当我调整了居高临下的心态以后,我发现尽管美国女权主义者关注的有些议题(比如堕胎权)与我的生活经历相差很大,但她们对事物的分析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常常激发起我对问题的新思考。我的学习不再是仅仅为了写一本书,而是为了弄懂许多我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在课堂上,在阅读中,我经常体验到火花在黑暗中一闪,豁然开朗的快感。在一次一次的思维快感中我逐渐转换了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对事物产生了以往所没有的认知。

记得第一次学到“内化”理论时,我不由地审视起自己到底“内化”了多少男性中心社会的价值观,以及这个“内化”过程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借鉴美国妇女史课上对维多利亚时代性观念及其对女性束缚的分析批判,我很容易地看到了自己恪守的贞操观是男权社会的价值观。那么这个价值观怎么会被我内化到近乎本能的地步的呢?我在记忆的隧洞中搜索着,以前从未回

味过的一些生活片段从脑海中浮现,在我新的眼光中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小时候我们弄堂里有个举止优雅容貌秀丽的高中女生,我从没有和她说过话,但在心里很喜爱这个姣好的少女。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她突然成了全弄堂关注的中心人物,她在辅导一个成绩差的男同学时,同他发生了关系并有了身孕。这件事是我童年所知道的最大的“丑闻”,弄堂里的女人们在背后对她的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清楚地告诉我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她的报应是必须嫁给那个使她怀孕的男的,尽管人人都说那个“小坏料”同她不配。她果然很快同那个男的结婚了。出嫁那天,她打扮得像别的新娘一样的喜庆,不同的是她握着一条小手绢,不停地擦着止不住的泪水,在女人们小孩们各种眼神的凝视中缓缓地、悲哀地走出了弄堂,就像是去赴一个葬礼。那个婚姻确实葬送了她少女时代常有的愉悦欢快神情,婚后不久,那个男的便开始打她,弄堂里常可以听见她的哭嚎声。目睹着她所经历的耻辱与苦难,我心里非常难受,但我并没有向大人发问:为什么她怀了孕就要受人鄙弃?就一定得和那个同她不配的男的结婚?成年人将失去贞操的女人打入另类并把这种做法看做天经地义般的自然合理,在那个幼小的年纪,我也悄然无声地接受了这个天经地义,把那少女的未婚先孕当做她堕入苦难深渊的根本原因。整个事件通过大人的叙述在我的眼睛里被个人化了,少女“咎由自取”、“一失足成千古恨”,我长大了只有“洁身自好”才能免此厄运。

那是一个强有力的内化过程,不需要任何人专门为我开设性道德课,童年的我已经深深地领会了社会对女性的性藩篱界

限何在,对越界的严重后果更是牢牢记取。我从未想到过质疑这一整套道德规范,直到接触了女权主义,学到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社会性别化的过程”、“社会性别的等级制度”等等剖析社会文化中制约人们行为的深层结构、机制和权力关系的理论概念。在对个人经历的反思过程中,我开始对女权主义的著名口号“个人的政治”有了深入的理解。初次遇到这个提法时,我脑中出现了我们“文革”时期国家政治统治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情景,怎么美国女权主义也会提这种口号呢?读了一些书并联系自己的经历思考以后,才悟到自己是因政治文化背景的限定而对美国场景中的事物作了歪曲理解。美国女权主义对父权制国家权力的警觉和戒备的程度是我们从中国政治文化中出来的人所难以想像的,“个人是政治”也决不是把个人生活各方面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交给国家去统率和管理。由于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私人领域的一切被看成是自然合理的,女性在其中的压抑苦闷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她们所遭遇的一切问题都被说成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所以女权主义运动兴起时许多妇女开始重新审视美国政治文化中关于私人领域的意识形态,并从妇女的群体经历中揭示妇女问题的非个人性质和非自然性质。她们分析了家庭、婚姻、性生活、家务劳动、育儿等领域中存在的基于性别的权力关系以及这些领域对形成和复制社会性别等级制的重要性。在这样的分析中,她们提出“个人的政治”,旨在提高妇女对社会性别权力机制的警觉。这个政治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党派政治”,而是指各种社会体制和领域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维系这种关系的机制。这个

女权主义概念使许多美国妇女从自责自卑的压抑心境中解脱出来,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的生存环境和人生经历从而获得改造社会的目标和力量。我想,如果中国妇女熟悉这种分析角度的话,许多人也会从抑郁中走出来的。如果这类分析成为中国社会的常识的话,未婚先孕的女子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进入痛苦的婚姻的悲剧也会减少许多。

女权主义学者对“私人领域”中的制度性、结构性的不平等的剖析有大量著述和独到的见解,而这些分析是我去美国前毫无知晓的,因此感到特别新鲜,并且很钦佩女权主义学者不墨守陈规敢于创新的胆量和学识。许多这方面的理论我是通过阅读美国妇女史专著了解的,每一部专著都解构了某种神话或提出了新见解、质疑了前人的一些定论。如果说这些特点是西方史学著述的共性,那么妇女史又以其独到的视角审视了传统史学从未关注过的领域。在美国学习美国通史已经使我恍然大悟:“哦!历史是可以这样写的!”学妇女史更使我感慨无比:在中国学界尚未想到过的领域中,她们已经用笔为篋子给细细地篋了一遍。婚姻、家务、生育、育儿、性活动、就业、职业、参政、教育、社会活动、社团活动、娱乐等等等等,各种族、各阶层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许多历史专著作详尽的、各有侧重的阐释和探讨。这大量的著述作为高等院校历史课和妇女学课程的读本成为年轻一代的新知识。我以妇女史专业学生和中国来的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在同中国学界和高等教育界的比较中,清晰地看到美国女权主义学术活动对社会文化的改造作用以及女权主义学术在中国学界的空白。每每手捧着一本美国妇女史专著读

着,内心就会有种骚动:像这样的研究在中国还没人涉及,而我是能够做的。第二个学年尚未结束,我已打定主意:完成了美国史专业硕士学位后,我要学中国史,搞中国妇女史研究。

在为了准备写作美国妇女运动史而学习美国妇女史的两年里,表面上看去我每天沉浸在对美国妇女的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中,实际上我在思维活动中时时进行着无法避免的文化比较——比较中美妇女的历史和现状。我的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左右了我在知识活动中的关注点,妇女史的学习更使这种关注从无意识层面转变为自觉的行动。远隔重洋,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兴趣和热忱注意起国内妇女状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变化。大众传媒中出现的种种关于“女人”“女性”的说法使我感到不安,因为它们同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主流妇女观如出一辙,即在建立幸福的现代家庭的幌子下贩卖以贤妻良母为界定女性的准则的传统妇女观。贝蒂·弗里丹的名著《女性的奥秘》揭露了这种“女性味”话语对妇女的压抑和束缚。在美国文化史课上我也了解了美国学者对市场利用传统性别观念推销商品从而复制和巩固了传统性别观念的做法的分析批判。我深知传统性别观在当代中国的回潮是同中国知识界对毛泽东时期的妇女解放政策的反思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传统性别观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但是,从美国妇女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女性味”的话语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对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自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我开始希望以我的写作来介入中国社会性别话语的较量:一部美国妇女运动史也许不仅能让中国

读者更多地了解美国,还能更深地认识自己。如果中国妇女能以美国妇女的历史教训为戒,那我们在妇女解放道路上就可以少走些弯路。细心的读者大概可以看出我在《女性的崛起》一书中的良苦用心:既想澄清国人对西方女权主义的误解,又试图通过美国妇女的经历来委婉地表述我想对自己同胞们说的话。对“女性味”话语的挑战是我在此书中的一个关注点。

1988年的上半年,我基本完成了当代美国妇女运动史的初稿。下半年我回国住了四个月,修改稿子和联系出版事宜。出版的事有周折,我又带着手稿返回学校。对于这次回国没把出版的事办成,我毫不遗憾,相反,我认定出这本书的时机未到。1988年的出版界正在热衷于投入“女性味”话语的制造中,带“女”字标题的书成了商业热点。与我接洽的编辑企图把我的书改头换面做成这类书来推销,我自然不愿这样干。看到国内一窝风地把女人作为卖点,公众包括妇女大多毫无警觉地把“女性味”话语作为对“男女都一样”的否定和现代化的时髦来接受,我想此时我的书即使出版也会因不合时宜而受冷落的。我决定把这书稿搁置一阵,集中精力投入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

1989年夏天,鲍晓兰在中国留美学史学会年会中组织了一个妇女研究论坛,当时一共联络到7个人发言,我是其中一个。我们7个女研究生在美国各地读各种不同的专业,但都对妇女研究有兴趣,都是大陆出来的,又是同代人,又都在美国求学了一段时间,初次见面就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们挤在一间旅馆房里,通宵达旦地聊天,谈在美国学习生活的感想,谈女权主义对我们的启发。我们很庆幸能有这个相聚的机会,使各人从

孤军作战的境地中走了出来。会议开完了,我们觉得这几个人不能散,应该成立一个组织,联系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交流我们的研究,为发展中国的妇女学做贡献。晓兰又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组织者的任务,会后靠电话联系,商量定成立一个妇女研究小组,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陈俊英起草了一份成立宣言,还刊登在一份中文报上,足见我们的郑重其事。宣言表达了我们共同的心愿,即希望为促进东西方妇女的交流和沟通东西方文化贡献力量。我们说愿意成为沟通东西方的一座桥梁。现在想来这个比喻不很贴切,桥梁有种被动的工具性的含义,而我们这个组织成立以来所表现的能动作用和主体性我至今尚未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

我们这些从大陆来的女留学生在国内大多是高校教师,作为城市的知识女性,我们这代人习惯于把男女平等作为人生的基本原则。到美国后,不少人有和我相似的体验:先是认为自己已经解放了,后来受到女权主义理论的启发对自己个人的经历和中国妇女的状况有了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看到要实现妇女的解放还有相当长的历程,还有许多事要做。我对于这个组织的热诚出于这几个基本认识:一、我们这些知识女性不能把自己的经历想像成中国妇女的普遍经历,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结构也使得中国大多数妇女——农村妇女不能享受我们城市女性习以为常的许多男女平等的待遇,我们已经获得了发展机会的女性应该关注缺乏发展资源和机会的女性;二、中国的经济体制转换使一些保障男女平等的机制丧失其原有的功能,如何创立新的机制来维护妇女利益推动妇女的发展要靠当代广大

中国妇女的自觉参与,作为一名女性中国公民,无论我身处何地都有责任有义务参与这项事业;三、西方也需要了解中国和中国妇女,我们这些留学生可以通过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做这方面的沟通。

就在我转到中国近代史专业这年,曼素恩教授调到我校历史系来了。她是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推动妇女史研究和教学的中坚分子,自然名正言顺地成了我这个希望做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博士生的导师。在美国高校历史系里美国史教授一般要占一大半,其他国别史的是少数,规模较大的学校会有一到几名中国史教授。能在这有限的几位中国史教授中遇上曼素恩这样不仅对妇女史研究有兴趣,并且以扶持培养妇女史学者为己任的教授,实属幸运。在她开设的中国妇女史课上,我很快接触了西方学者这些年对中国妇女研究的成果。读着西方学者写的中国妇女研究专著,我的感受很复杂。西方学者在受到地域、语言和中国政治气候的限制的条件下出了这么多著述可见这些学者的执著,我为她们的精神所感动。虽然同美国妇女史著述相比,20世纪80年代西方关于中国妇女的研究涉及的领域要窄得多,课题的设计和问题的分析也不够复杂深入,但这类研究在国内尚未出现,我们中国学界何时能出这样的学术成果呢?我为这显而易见的差距感慨焦急。几部主要著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了剖析和批评,书中的一些洞见使我很受启发。比如对国家父权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巩固的分析,对妇女解放未能改造父系家庭和婚姻制度及其后果的透视等等,这些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而产生的新见解以其独特的穿透

力令我震动和兴奋,透过纸背表现出来的作者们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更是令我倾心。与此同时,对大部分著述我又都有一种说不明白的不满之处,捉摸许久才悟到:我对中国妇女在这些著作中的缺席感到不满。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界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西方学界流行的大背景下,我对 80 年代西方的中国妇女研究著述中的问题才看得更清楚。她们的长处是分析体制性制度性结构性的弊病,短处是见制度不见人。究其原因,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受原始材料的限制。因为中国的长期与世隔绝,不仅中国人对外界隔膜,国界之外的人也难以实地考察了解中国,中国问题专家也只能靠官方出版物来做分析判断,得到的中国印象自然局限很大,也无法表现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经历。但是在中国妇女研究著述中不突出表现妇女的能动作用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东方主义的影响,女权主义的西方学者往往也在所难免。在西方人的叙述中,包括早期西方女权主义的叙述中,中国妇女大多是以缠足、文盲一类形象表现的。尽管在女权主义的著述中这类形象的突现是为了说明妇女受压迫的普遍性,但它同时强化了中国妇女是弱者的刻板模式。这种刻板模式恐怕限制了一些中国妇女研究者的想像,以至于在设计研究课题时没有把寻找中国妇女的能动性列为主要内容。同期出版的美国妇女研究著述就截然不同,你总能从中看到充满生气的、强有力的女性人物。

我这个有着美国妇女史背景的中国学生早就感到不服气:我就不信中国妇女比美国妇女弱。从古至今我们有无数的女英

雄,美国大众对此是闻所未闻的。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我就见过许多不属于弱者的女性。我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弱者。因为自己不是个弱者,在美国看到中国妇女被表现为弱者和牺牲品,就感到特别不舒服,甚至愤怒。这种情绪在美国女权主义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中有所化解,但是一个情结不散:我要通过我的笔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妇女。

1992年在哈佛大学举办了第一个中美妇女研究学术研讨会,我们妇女研究小组的许多成员都去参加了。我因为怀孕行动不便,没有参加。这次我没有参加的会议对我们小组、对我个人都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和国内妇女研究学者建立了联系。我们小组成立之初就希望同国内学者携起手来共同为发展中国的妇女学努力,这个愿望一直到哈佛会议才得以实现。在此之后,我们小组(后来发展成了有一百多位会员的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集体项目都是同国内学者合作的。1993年我在同天津师范大学合作的研讨班上介绍了《女性的崛起》书稿中的部分内容,发现妇女研究学者对它是有兴趣的,也就是说,我找到了这本书的读者群。后来经过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刘伯红的热情接洽,此书在世妇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出版,受到妇女研究界的关注。看到自己多年的无偿劳动为国内学者所需要,我感到欣慰。同国内妇女研究学者的密切联系使我们学会成员对妇女研究界的需求了解更深入,通过国内学者所做的研究,我们对改革中妇女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的认识也较全面些。在筹备世界妇女大会这个背景下,国内妇女研究界积极了解国际女权主义运动,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提出新的议题。中国妇女研究界的“接轨”

实践说明了国际女权主义运动关注的许多议题在中国也具有现实意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自觉地探索在中国解决这些世界妇女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具体途径和步骤,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使我们很受鼓舞。对我个人来说,参与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和实地考察中国妇女研究状况还别有一层意义。

我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妇女研究热潮的关注起源于写作美国妇运史时期。纵观美国历史,女权运动从19世纪中叶诞生以后虽经波折起伏却绵延不绝。一个多世纪里为改善妇女的处境,推动妇女的社会进步而自觉努力的美国女活动家层出不穷,当代美国社会里每一项符合妇女利益的法律和制度都是几代女权主义者奋斗的结果。联想我所熟悉的官方对于中国近代妇女历史的叙述,我不由感到纳闷:为什么我们中国妇女就只会被动等待救星来解放呢?我很怀疑真会如此。当我得知国内知识妇女自发的妇女研究活动时,很振奋,因为从中我看到了中国妇女的能动性。但是如何来理解中国妇女今天的主动和历史上的被动呢?今天的能动作用会开创什么样的前景?它同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有什么关系?这类问题不断在我脑中盘旋。

转入中国妇女史领域后,在阅读中我了解到20世纪初中国有过女权运动。伊丽莎白·克罗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专著《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小野和子的《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妇女的斗争》和其他关于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历程的著述中都有关于女权运动的描述,但是都没有追踪它的来龙去脉。马丽莲·杨在第一本关于中国妇女研究的集子中列出一系列需要探究的历史疑问时就提到:我们不知道当年女权运动积极分子的下落,参

加共产党的女权主义者命运如何？留在城市的女权主义者后来怎样了？我的好奇心被这些问题和这些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历史叙述给刺激起来了，想追根究底，把我脑子里更多的疑问都搞清楚。在国内一直接受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不适合中国国情。对美国女权运动的考察使我了解到，虽然女权运动最初由中产阶级妇女发起，但它涉及的妇女问题则涵盖了各阶层各种族的妇女利益，一个多世纪来也是由各阶层各种族的妇女的广泛参与才会跨越国界不断发展蔓延，这个基于社会性别、包含多阶层妇女利益和冲突的复杂运动是“资产阶级”这个词所不能说明和界定的。但是中国的女权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它在 20 世纪初出现过，社会历史原因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条件下妇女的自发社会运动能够出现？哪些人为了什么成为女权主义者？她们在什么时候、为什么消失了？中国女权运动与美国女权运动相比会有哪些异同？女权运动在文化历史社会背景差异很大的东西方国家出现意味着什么……我被自己脑中不断涌现的问题迷住了，决定博士论文就做这方面的研究。

1992 年夏天，我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回到上海，开始了为期 13 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在我的论文前期研究中，已经了解到 20 世纪初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几个大城市的女权运动都很活跃，但是因为我回国做田野工作没有得到任何研究基金，缺乏经费去外地调查，上海是我的老家，挤在哥哥家里，费用不大，我就全力以赴地在中国开展调查。起先我希望能找到当年女权运动积极分子的个人资料，如书信、日记之类

的,因为几部出色的美国妇女历史书都是基于丰富的个人资料,要深入妇女的内心世界,个人资料是很好的途径,于是遍访上海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史料收藏处,询问是否收集妇女的个人资料。接待人员一听到我的问题,就流露出奇怪与不屑的神情:“我们这里不收妇女的资料。”上海图书馆的馆员告诉我:“我们这里只收藏名人手迹,有孙中山和鲁迅的书信。”我知道自己犯傻了:怎么会指望这些地方收集妇女资料呢?真是美国待久了忘了国情了!(自从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以来,美国妇女自发筹款在全美多处设立妇女档案资料库,这也是美国妇女史学术繁荣的一个基础)我想,还是找幸存的妇女活动分子访谈希望大一些。通过调动我在上海的所有社会网络,我终于找到了一群出生在1900到1907年、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并热衷于妇女活动的老太太。

这些老太太的历史叙述使我震惊和激动:解放前竟有这么大一群职业妇女早在自觉地追求妇女解放!我竟然对这些杰出女性在推动妇女社会进步的艰难历程上所创立的业绩毫不知晓!显然,我面对的是一个被历史抹去的群体。这些在二三十年代曾经叱咤风云的知识女性很清楚自己今日的处境,一些人始终不甘于被历史所淹没。30年代做过妇女杂志主编的王伊蔚为自己准备了一块墓碑,请朋友写了碑文刻上,碑文记载了当年一起从事妇女活动的女友们的姓名和事迹,希望藉此让后人了解她们这一辈人的奋斗历程。我庆幸自己能亲耳听到她们的自述,我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为这一代女杰写出对得起她们的碑文。

以老太太们的口述为主要史料的《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一书 1999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众多的好评中,最使我欣慰的一句出自美国评论者的话是:“这本书轰炸了西方人所持有的对中国妇女的刻板模式。”是这些老太太不屈不挠奋勇开拓的人生经历轰炸了中国妇女逆来顺受的弱者形象,我从心底里感激她们。我由衷的感激之情还因为她们解答了我心头的历史之谜,她们给了我一份“家谱”使我寻到了自己的根。

1992 年、1993 年我在国内做调查时,“女权主义”是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认同的贬义词,因此我明明是研究中国女权运动的历史,也不敢公开声称,只是说寻访早年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令我吃惊的是,当我同这些老太太聊起来,她们却毫不忌讳地大谈当年的女权活动。94 岁的陆礼华对我说:“我参加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妇女参政协会等十来个妇女组织,凡是为妇女谋利益的组织,我都参加。”她讲到年长于她的妇女活动家反缠足、兴女学的活动,讲到那些妇女对她的影响,语重心长地说:“这些搞女权运动的人的贡献,历史也是应该记载的。”93 岁的朱素尊在 1930 年就自己开了律师事务所,经常义务为妇女打官司。谈到自己年轻时的职业选择时,她铿锵有力地说:“我就是为了伸张女权而学法律的。”显然,对这些经历过女权运动的妇女,“女权主义”这个词具有特殊的含义,不管今天的主流话语如何贬低它,她们始终珍惜给了她们新的觉悟和力量,从而使她们能够开创新的人生的女权主义。面对这些女权主义者,你是无法下结论说女权主义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失败了。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女权主义在中国造就了 20 世纪的新女

性,这些新女性始终在坚持为妇女谋利益的事业,直到变动的政局完全封闭了一切社会空间。

清末民初的改革者、革命者和新文化人士发表了大量鼓吹男女平等和介绍女权主义的文章,任何人只要翻翻 20 世纪初的报刊杂志都会看到“男女平权”这个响亮的话题。我从那一时期的文字资料中看到,女权主义是作为现代化话语的一只号角被中国知识男性所吹响,尤其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有话语权的男性更是把女权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来宣扬,作为抵抗儒家三纲五常的有力思想武器来散播。造就新女性在那代知识男性看来是迈向现代中国的关键一步,鼓吹妇女解放则是男性表现自己现代身份的捷径。正是因为女权主义在 20 世纪初是掺和在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话语之中由知识男性推上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它很快就进入了中国主流政治话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从那时起就同现代化主旋律融合在一起,没有哪一个声称要将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的政治力量敢于公开抛弃这些女权主义的口号,尽管利用这些口号改变其内涵的做法时有发生。我把男性的文字资料和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成长的新女性的口述材料作了对比研究,发现在男性的妇女解放话语中,新女性常常是被想像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载体;而对新女性来说,她们毫不含糊地要做主体,要做一个享有和男性同等权利的独立的“人”。妇女解放对她们来说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正是女权主义者们对这个目的的坚持,才使她们在 20 年代中期以后变化了的政治局势中受到排挤和打压。“女权主义”这个词从“五四”时期的中心荣耀地位向负面含义和边缘地位的转折也

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的。

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五四”新女性的叙述使我了解了围绕“女权主义”的激烈政治斗争,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也帮助我看清了女权主义各项议题被政党政治所吸纳的过程。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中所发表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完全照抄了1922年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时的宣言,这是因为有大批的女权主义者加入了大革命,更是因为两党都需要以妇女解放这面旗帜动员广大妇女的参与。1926年就在武汉加入共产党的黄定慧告诉我,当时参加革命的女性大部分是因为婚姻家庭问题而离家出走的,她本人就是为了逃婚而加入了打出保护逃婚妇女旗帜的革命阵营。当大城市里独立的女权主义组织因为不介入两党领导的政治运动而被界定为“狭隘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时,“五四”以来深入妇女之心的女权主义口号、原则、议题则在两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得到张扬,这是一个排斥、收编、吸收、改造同时进行的复杂历史过程。

女权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成为国际运动,我们中国妇女在那时就已经同国际“接轨”,只是这段历史被遮蔽了,它从中国公众的历史记忆中消失了。幸存的女权运动见证人使我明白:一个多世纪里有几代中国女性为了自身的解放做过不懈的努力,中国妇女在20世纪的进步是妇女自己争来的,而不是任何人恩赐的。聆听着女界前辈对激情岁月的缅怀,我既振奋又惭愧:我们这代人受体制的束缚太久,习惯于在前人种下的大树下乘凉却很少思量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的开拓精神尚不如“五四”新女性。世纪之交的中国,又处在与20世纪初相似的社

会激烈变革时期,我们能否像“五四”新女性那样激流勇进,开辟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更广阔的天地来?凝望着眼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们,我暗暗叮嘱自己要尽一切努力把这份“家谱”续下去。

作为“五四”新女性的继承人,我从此也像老太太们一样坦荡自豪地公开声称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虽然今天这个“女权主义”已经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多样的议题。

(本文原载《百花洲》2000年5月创刊号)

“女性意识”、 “社会性别意识”辨异

——对当代中国女权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析

在当代中国妇女研究领域里,西方女权主义的核心概念 gender 正逐渐为人们所熟悉。’95 世妇会在中国的召开以及妇联系统随后对《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的宣传,使越来越多的妇女理论工作者意识到 gender 这个概念在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个重要的概念的中文译词却不固定,较多的人使用“性别”,也有人(包括本人)使用“社会性别”来指 gender。^①此外,还有三个中文词被不加区别地用来指 gender consciousness:“女性意识”、“性别意识”、“社会性别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词语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来理解它们的不同内涵,从而说明这些词语所反映的中国当代社会性别话语(gender discourse)的复杂状况,以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对中国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

一、“女性意识”与“性别意识”

1. 词语引起的困惑

在当前我国对妇女问题的讨论中,女性意识或性别意识是个热门话题。这一话题引出了许多有关妇女的重大议题,并正在影响着政府的决策。^②对女性意识或性别意识讨论宣传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审视一下讨论者的语言,我们会发现,不同的人用同样的词在表达不同的意思,并且,不少人对这两个词表示困惑。请看从《中国妇女报》上选摘的几个例子:

——中国妇女有自己的优势,对西方不能盲目追随。中国妇女也有自己的不足,比如自身的女性意识不够强。^③

——身为女人,女性意识与生俱有,要想放弃这种意识就如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④

——在男女都一样的革命年代,还没有女性的意识,便面临结婚、生育,茫无目的地去承担义务;改革开放后,有了一点女人的感觉,便到处要女人性感、化妆,于是又不知所以地忙着打扮,始终没搞清自己是怎么回事;当了作家,有了一点女性意识,又被人认为能干的女人不是女人。^⑤

——女人并不是具有了女性的生理结构就一定有女性把握世界的这种眼光,因为男性社会的历史过程造就着你,使你已经不自觉地作出了一种认同,我们只会用一种眼光去看世界了,我想,中国妇女的性别意识的程度可能比估计的要低。^⑥

——“性别意识就是处处保护女的,照顾女的。”也有的女干

部说：“我从来都与男人平等竞争，不要考虑自己是个女的，要性别意识干什么？”^⑦

——性别意识就是男女平等的意识。^⑧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在目前的中国语汇里，“女性意识”和“性别意识”是被替换使用。其次，这两个词所指的内涵很不确定，不同人用同样的词表达的概念有时是大相径庭的，根据我所涉略的文字材料归纳起来，这两个词大约包含了下述内容：

（一）女人天生具有女性意识，若不受外界压抑，女人总会自然地表达女性意识。什么是这一自然女性意识的内容呢？女人对美的追求，对自身魅力的意识似乎是一大组成部分。如一篇分析女性意识的文章阐述道：当越来越多的生命活水注入女性领域时，新的女性意识便顽强地生长起来，她们开始重新寻找自己，重新认同、发现生命的意义，她们首先产生了一个共同而简单的愿望：女性是美的，女人应该富有女性，应该追求美……当她们按照自己的心愿和气质打扮起自己时，她们便回到了一种健康、正常的女性生活中，世界也因此变得生动了。^⑨

对女性性欲、生理特征、女性感受的关注和表现也是自然女性意识的重要内容。如一篇评论女性电影的文章谈到：“以往的电影表现女性形象时，很少正面描写女性欲望，充满了女性意识的电影在塑造女性形象上则不然。”^⑩另一女作家也谈到：“女作家写一些非常自恋的小说，或写自己在性爱中的个人感受，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女性意识的觉醒。”^⑪自然女性意识似乎还指女性对性别角色的认同。如另一著述中论道：

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正是一些奋进自强的女子,鄙弃并有意克制自己的女性行为,自觉模糊并淡化了女性意识……由于生理上的差别,女子的生活道路毕竟不同于男子,她们除了参加社会生产外,还必须亲身承受人类繁衍的职责和哺育儿童的义务……这种职责和义务,客观地约定了女子的人生之路,迫使她们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通常是青年时期)中断其社会生产……但就目前我国女大学生的情况看,她们对女性人生道路的认识不足;其女性意识,往往是盲目的、掩饰的甚至是抗拒性的。^⑭对女性意识的这一内涵,一位女作家表达得更直截了当:“40岁当母亲,就是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难道这不是女性意识、母性吗?”^⑮

(二)女性对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主体的有意识追求,如一位女记者谈到自己女性意识的觉醒,强调:“女性的参政很重要,女性的比例太少,会造成决策上的失误。”^⑯另一位女作家在阐释何为女性意识时指出:“最主要的应该是女性把握世界的独特眼光——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而且去参与对整个人类决定命运的那些重大决策。”^⑰还有的学者说:“女性意识就是女性的觉悟,就是对女性的价值、力量和优势的肯定,对女性是弱者观念的否定。”^⑱

(三)对社会体结构中阻碍女性发展的因素的警觉。如李慧英在《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一文中指出:“所谓性别意识,即从性别的视角观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对其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以便防止和克服不利于两性发展的模式和举措。”^⑲刘伯红分析道:“什么是性别意识,是承认男女不平等前

提,积极地消除男女不平等,特别是从性别角度积极地发现妇女问题,探讨在文化中社会结构中在人们的行为中消除这种不平等。”^⑬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述对女性意识性别意识的不同界定目前同时存在,各自却有不同的来源和历史背景,分析其来龙去脉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女权主义思潮的认识。

2. 自然“女性意识”的来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市社会出现了一个性别分化热潮。妇女问题第一次成为共和国时期的热门话题,男男女女都呼唤女性的复归,“女性意识”一词开始频频出现在讨论妇女问题的各种著述中。对于这一热潮的政治背景,国内学者早有论述。我们每个经历了这一阶段的人也都有一个共识,即,那是对“文革”极“左”思潮的一种否定,这一否定起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对笼罩一切的阶级概念的否定,宣告妇女从阶级范畴的分离;二,对“男女都一样”的主流社会性别话语的否定,男女有别成为新时期的时尚,而这一区别要靠女人回归女人来实现。由许多知识女性参与的这两个方面的否定对中国妇女在新时期的发展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我们知道,20世纪初,妇女问题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主旋律出现,引导了一大批知识女性迈进社会政治领域,并使妇女解放的口号进入中国政治话语主流。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新文化激进思潮的继承者和容纳“五四”激进分子包括女权主义者的组织,^⑭在新中国实施了许多“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议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妇女的发展进步。但是,“文革”中愈演愈烈的阶

级斗争却干扰了对妇女发展的关注,关闭了妇女自发活动的社会空间,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分析更是彻底取消了提出妇女问题的可能性。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文革”后妇女理论工作者把妇女从阶级范畴分离的努力成功地使妇女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工作者尚不了解gender的概念,但她(他)们努力的实际结果却是使社会性别成为合法的分析范畴。这一分离在实践中的意义至今已显示得很清楚。妇女研究已成为不断发展的一个领域,有了一支百折不挠的队伍,形成了许多机构,参与了不少决策,并不断在创造关于社会性别的观念,影响着当代社会文化,有意思的是,妇女从阶级范畴的分离动作是被视为非政治化的,尽管这一分离无疑是当代知识妇女开拓社会空间的重要努力。

妇女从阶级范畴的分离与否定“男女都一样”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尽管这两方面否定的具体内容不同。更确切地说,20世纪80年代一些妇女理论工作者是用男女具有自然本质差异的论点为依据来论证妇女从阶级分离的科学性。也正是这一所谓科学地探索女性自然本质的口号有效地淡化了分离行动的政治色彩。当然,提倡“男女有别”是明显地向“男女都一样”的主流社会性别话语挑战的行为。为什么这一挑战非但没有受挫反而得到社会普遍呼应?为什么是知识女性率先提出这一挑战?呼唤女性意识复苏和回归女性自然本质的哲学渊源是什么?这一思潮的出现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有什么关系?其社会效果又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女性意识”

一词的多种含义。

首先我们需要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以便理解“男女都一样”的社会性别观念的来源和发展以及它同中国当代知识妇女的关系。从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妇女解放历程具有与西方女权运动既相似又相异的开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两者以不同的方式都受到欧洲启蒙运动人权思想的激励。启蒙运动排斥女性的人权概念激起了西方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雄心。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诞生之际,西方女权运动正风起云涌,正在争取人权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不仅对西方妇女的斗争表示理解,还将女权的实现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中国富强的先决条件。《女界钟》的作者金天翻在1903年便宣告:“民权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①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更是以妇女问题为突破口来提倡个人权利,反抗传统文化的统治。可以说,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从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开始。^②在男女平等的大旗下,“五四”的女青年身体力行地开始了自身解放的行动。“女人也是人,也要有独立人格”成为那一代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多少女性在“做一个人”的愿望激励下,争脱了层层樊篱,开拓了新的人生道路。“做一个人”显然是那代饱尝了做女人的苦涩的妇女的解脱之路,这同20世纪末知识妇女“做女人”的呼声形成鲜明对照。^③“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也可说是这两个时代的突出标记,那么,历史如何会出现这一意味深长的转折的?

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理论深入剖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主体(subject)的构成,指出:启蒙运动建构起的主体是浸透着西方男性文化的主体,这个男性主体

的构成是以排斥女性来完成的,女权主义的目标不是要成为这个以男性为模式的主体。^③从刚才的历史回顾中,我们看到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在建构人的概念时是有意识地包括女性的。一个排斥,一个包括,两个启蒙运动对女性的不同态度是形成不同的中西妇女解放历程的重要原因,可以这样说:西方女权运动来源于欧洲启蒙运动对女性的排斥,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则是中国启蒙运动包括女性的结果。限于篇幅,对两者的比较就不展开了。这儿需要考察的是,中国启蒙运动在引进人的概念时,是否照搬了西方的男性主体?回答是肯定的。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表达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西方男性主体倾慕的文字不计其数。^④独立、自主、自由等表达西方男性主体的西方文化观念也早已成为中国人推崇的价值观。尽管“人”字在中文里是中性的,在西方启蒙运动影响下建构起来的“人”的内涵显然是“男人”。

基于对“人”的内涵这种社会性别的分析,我们看到两个启蒙运动对女性的排斥和包括的意义是:西方的启蒙运动既不让女人享受男人的特权,也不要女人做男人;中国的启蒙运动既让女人享受男人的特权,也要女人做男人。这儿的内在逻辑是:若要享受男人的特权,女人必须成为男人,即以男性价值准则来要求自己,同男人一样在社会领域里运作。本世纪初凡渴望做人的中国知识女性是深悟这一逻辑的,她们在行为上甚至发式服饰上都力图表现出男儿的雄姿,为了能像男人一样不受牵累地干一番事业,许多女青年选择了独身。同男人一样是这个时期许多知识女性的愿望和选择,作为第一代打破性别隔离、突破性

别禁区的妇女,她们因能够闯入男人的世界而获得强烈的解放感、自由感和满足,同男人一样因此成了妇女自己也认同的妇女解放目标。在同一时期,西方女权运动的主流也在争取进入男性世界,享受与男性同样的权利。

但是,似乎公允的与男性一样运作从而享受同等权利的逻辑,却包含着不合理性。首先,它抹杀、掩盖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对女性的要求。在不改变社会性别分工的情况下,在女性依然承担着为男性提供各种家庭服务的重负时,要求女性同时和男性一样在社会中运作以取得和男子同等的报酬、权利及地位,这显然是极大的不公平。对这一不公平,新文化先驱们是有所认识的。在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影响下,当时不少男性知识分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随着《妇女与经济》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美国女权主义者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公共厨房和托儿所的设想在20年代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中国共产党则在延安时期便开始实施这些解除妇女重负的措施。但是,解放以后大规模的实践证明,这些措施虽然有助于减轻妇女的负担,却不足以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大部分走上社会的妇女依然在家庭中承担着传统女性的重负,双重负担问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的突出问题。

到了“文革”时期,平等权利所包含的不合理性非但未能得到解决,反而加深了。以妇女为主的家庭事务变成了同革命大事相对立的小事、私事,于是,妇女一方面必须同男性一样抓革命促生产,另一方面仍要按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去尽母亲、妻子、女儿的责任,与此同时,还得承受国家意识形态对妇女家庭

角色的否定、贬低所造成的心理压力。其次,对男女平等权利的追求演变为“男女一样”的要求,这本身是男性中心文化在妇女解放过程中的一种表现。从“五四”以来的男女平等是以男性行为为准则来要求衡量女性的,其不言而喻的含义是:男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男性所代表的一切在价值上高于女性所代表的一切。对于这一点,连提倡妇女解放的中国新文化先驱中也极少有人认识到。^⑤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为自己能达到男性标准而自豪,未能提问:“女同志能办到的,男同志能办到吗?”“如何看待男女之间的差别?”“谁在界定各种差别的意义?”“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男女差别的价值观念是如何形成的?”“男女的哪些差异在被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是什么?”“平等权利只能属于无差异的群体吗?”^⑥我们没能质疑,因为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的社会性别等级观念深植于男性中心社会的每个人心中,包括我们这些自以为实现了男女平等的一代女性。

以男性为准则的男女平等也在“文革”达到极点:在装束上女性也得向男子看齐,不准许显示女性性别特征。在20世纪初女子着男装是一种个人选择,它使女性获得一种自由解放的体验,因而也是女性追求解放的一个姿态。但是当男性装束成为靠权力维持的统一模式,服从这一模式的女性自然没有解放感,相反,不少女性感到束缚与压抑。显然,女性的心理感受并非来自男性装束本身,而是同装束表达的社会文化内涵密切相关。统一装束表达的是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控制,这种控制(不仅在生活方式范畴中)又是以男性模式为表现形式的,常常暴露出根深蒂固的传统男性中心文化价值观,比如女性贞操观(对女性服

饰、性行为的控制都与此相关)。正因为妇女体验的是父权制的、以男性为准则的国家控制,是官方意识形态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贬低,她们的思想解放便以拒绝做男人、“回归女性”和赞美女性经历来表达。

在这儿需要指出的是,“回归女性”并不是全体中国妇女的追求。事实上,中国大部分妇女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现实仍然是男女有别的。对于经历着“女人”生活现实的广大农村妇女,对于那些尚无做男人一样的人的体验的女人,自然不存在“回归女性”的渴望。直到今天,恐怕许多农村妇女渴望的还是能做男人一样的事,因为那起码意味着较高的收入。^⑦今天“铁姑娘”的称呼不时兴了,但在许多地区随着男性劳动力的流出,女人们正肩负着男人留下的重担,并且没有那份奢侈去担心这会不会抹去了自己的“女性味”。

“女性意识”并非自然产生于女性的生理构造,任何意识都只能是社会文化的产物。80年代出现的自然“女性意识”是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在当时政治条件下的一种运作,用后结构主义语言来说,就是一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其目的,如前所述,是批判和摆脱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控制以及开拓属于女性的空间。这一批判和开拓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其本身也是那个时期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物。在当时最具批判力的异化理论影响下,城市知识妇女对在体制化了的、以男性为准则的男女平等中的经历和国家父权制对女性的压抑的反思,便通过诉诸“回归女性自然本质”来表达。这时涌现的女作家群是这一反思的先驱,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小说,呼唤

人性和女性的复归。^②女性知识分子也开始试图对女性的差别和特点以及女性的自然本质进行理论的阐述。^③表现女性特点和实现性别分化是80年代的时代特征。^④

有意思的是,西方女权主义在70年代下半叶出现过相似的思潮。在批判男性主流文化的统治过程中,一些女权主义者开始正面强调女性的生理差别,推崇女性文化和价值观。尽管这些被称为“文化女权主义”的理论产生于跟中国的女性意识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其内涵也有很大差别,两者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把女人描述为本质性的存在,一个与男性相对的固定的范畴。西方文化女权主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很有影响,虽然在80年代下半叶受到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有力批评,体现了文化女权主义基本观点的许多女权主义实践依然方兴未艾,如生态女权主义、女权主义和平运动等等,这些实践都以基于母性的女性优越价值观为出发点。对文化女权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的批评我们下面要谈到。中国的女性意识的建构是否也受到西方文化女权主义的影响呢?虽然在80年代我们没有翻译出版过西方文化女权主义的主要理论著述,但是通过各种渠道,国内妇女研究学者对它还是有所了解的,国内也出现过对女性文化的讨论,应该说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许较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对外来思潮的态度取决于我们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在五花八门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最有可能吸引处在性别分化过程中的80年代的妇女研究学者的,是文化女权主义和更早些的激进女权主义的本质主义的观点。限于时间和材料,对于两者间联系在此只能谈这点印象性的看法。

3. 对自然“女性意识”的反思

以女性的自然性来摆脱阶级论的控制,以对女性本质的“科学”阐述来开辟妇女的空间,掌握妇女界定妇女议题的主动权,这些都是新时期中国城市知识妇女卓有成效的政治运作。在充分认识“女性意识”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它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以自然化的女性为基础来建构当代女性主体意识,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对所谓男女自然本质的论述往往被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论奉为普遍真理,包括西方对人的本质论和本体论的认识。尼采曾这样论及西方的所谓真理:“我们编造了我们对真理的所有权,然后我们忘了我们的编造,然后我们忘了我们的遗忘。”^④在西方女权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层层剥离各种真理的构造过程时,我们恐怕也需要对那些来自西方的贴着真理与科学标签的理论质疑。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不少所谓科学地阐释女性特点的书,往往是搬弄了一些西方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的心理理论。这些理论已经被当代西方学术界证明并不是在客观地描述自然现象,而是在对男女社会行为提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了适应中国社会性别分化的需要而引进的许多所谓科学理论,实际上引进了西方 20 世纪中叶以前的主流社会性别观念。无怪一些美国女权主义者觉得 80 年代中国的妇女观令她们想起美国 50 年代的“女性的奥秘”。

其次,在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文化中,所谓女性的“自然本质”是低于、劣于、弱于“人的(即男性的)自然本质”的。在未能清理、解构“女人”一词所包含的所有文化含义(历史上的、当代的)

之前，“做女人”的口号必然调动起“女人”这个符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标志的负面意义，而对依然存在的社会性别等级文化则毫无批判力。我们能理解 80 年代中国妇女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把妇女从阶级分析的统治中分离出来，从而在政治上实现女性独立的主体地位。但是，如果因此强调“女性的生成和进化先于阶级，并在本质上超越阶级，两者隶属于不同的范畴（妇女属于人类本体范畴，阶级属于社会历史范畴）”，^④那便是认识论上的自我束缚。因为，脱离了对女性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考察，脱离了对女性所处的家庭、家族、社会关系的了解，我们是无法阐释和揭示置女性于从属地位的历史过程以及权力运作场所的。把女人的特点自然化也会掩盖形成那些特点的女人不同于男人的社会地位和经历。德波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引导了几代西方女权主义者孜孜不倦地探索女人在各不相同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变成不同的女人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西方女权主义成为西方学术乃至西方文化中一支强劲的批判力量，并形成了以社会性别为核心的诸多理论。

中国“女性意识”的建构者们因为致力于调整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采取了将女性自然化的策略。理论工作者的注意力偏向女性自然本质和女性特点，而很少考察社会、文化结构对女人的制约。在这一方面中国“女性意识”的建构与西方文化女权主义的努力也很不相同，后者是在批判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价值观的前提下试图建构女性文化价值观，其锋芒所指是西方文化

中的男性内涵。中国的“女性意识”建构过程则主要表现为女性的自律和自我发现,对中国文化中的男性内涵是什么,它的形成与女性内涵有什么关系,男女的内涵是怎样形成,如何演变的等等,都很少涉及。概括地说,自然“女性意识”并没有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形成挑战。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意识”的出现不仅没遭遇阻力,反而得到迅速广泛的呼应,包括广大男性的推波助澜。也正由于“女性意识”只具有解构“男女都一样”的国家话语的力量,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毫无触动,所以市场经济可以毫不迟疑地接纳、吸收、利用“女性意识”。今天,国家界定妇女的权力几乎已被商业文化所取代,大众传媒与广告不断制造各种“现代”女性形象,其基本要素不外乎消费主义+传统女性美德+性感。女人是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同时也比共和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有可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如果说自然“女性意识”在80年代曾给过妇女一种解脱和自由感,在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变化了的90年代,它显然已不再是一种能赋予女性力量和具有批判力的意识形态。

第三,对女性特点的非历史性的描述往往无视女性之间因所处的地区、文化、阶级等不同所形成的差异而构造出一个统一的女性标准,这类“女性味”的标准一旦成为主流妇女观便可能对不符合这类标准的女性造成压抑。由于具有“女性味”的女人的内涵包括了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要求,做有“女性味”的女人要求也意味着以传统的女性角色来规范女性,不符合角色要求的往往被归入“女强人”之列,即缺乏“女性味”的女人。

1970年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莱特曾对美国的“女性味”观念统治做过这样的控诉：“一个女人若想反抗‘女性味’，即女性气质、地位和角色，便会被看做精神病，因为正如‘生理是命运’一样，女性味是她的命。”^④从我国当代女性对“女强人”称号的厌恶也可衡量出“女性味”话语的强大力量。做有“女性味”的女人并非是自然表现了女人的天性，而是在新时期的不同形式的被塑造。“文革”后的一代城市女青年已被塑造得如此有“女性味”，以至于她们在职业选择时也有意识地趋向女性行业。在1992年上海的一个妇女研讨会上，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谢希德因为复旦大学物理系女生入学数跌到零而大声疾呼。对比50年代和60年代女青年踊跃打破职业界限的状况，我们很难断定今天的女性是否有更多的自由来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

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文化女权主义理论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强调男女本质差异的倾向，在此我摘录一段评论为例：“在男女间界定一条鲜明的界限会加剧男性对被看成有女性味的恐惧，而这无益于改变现状，因为它强化了男人对男性刻板模式的迎合。此外，夸大女人同男人的差异也会形成女人是他者（德波娃的概念）的观念。再则，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对女性保持距离和疏远还会导致将女人视为物品，这一点在一些色情形象中，和许多对女性的身体和性的虐待中表现得很明显。”^⑤西方女权主义者还指出，强调女性的差异常常掩盖了对形成差异的家庭、社会结构的改造的必要，而女性的差异又经常被用来合理对女性不平等待遇；对女性作本质性阐释的结果是反映和再制造统治文化关于女性的种种设想等等。^⑥

这些评论对我们面对的状况也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二、“性别意识”与“社会性别意识”

在当代社会语言中，“性别意识”与“社会性别意识”可以表达截然不同的内容，也可以表达相同的内容。“性别意识”这个词在新时期的出现具有同上面分析的“女性意识”同样的历史背景，因此，该词若在“女性意识”话语中出现，其含义是“对自然性别差异的意识”，这个含义同“社会性别意识”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它有这层意思，所以我在第一部分的标题中将它并列于“女性意识”。大众用语中出现的“性别意识”大半是表达这层意思，如前面提到的一位女干部所说：“我从来都与男人平等竞争，不要考虑自己是个女的，要性别意识干什么？”

进入 90 年代，尤其是在我国筹备世妇会的过程中，“性别意识”开始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同西方日益频繁的交往中，西方女权主义的 gender 概念被引进了，“性别意识”被作为 gender consciousness 的译词开始在妇女研究界流通使用。中国妇女研究者对西方女权主义核心概念的关注反映了我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现状。世妇会后，妇联的领导开始推动“性别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在对两个文件的宣传介绍过程中，许多学者更是有意识地解释宣传“性别意识”的新含义，《中国妇女报》还组织了专栏讨论，也正是这次有意义的讨论明显地反映了多种思潮的同时运作以及暴露了词语引起的困惑。

本人在 1986 年开始为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的写作做准备时，发现最大的困难是翻译 gender 一词。经反复思考，最后在书

中用了“社会性别”作为对应词。1993年在天津师大妇女研讨班讲课时,我们也都使用“社会性别”来指 gender。在那儿,我还得知,国内已有学者将 gender 译为“社会性别”。但时至今日,用“社会性别”来指 gender 的显然仍是少数。今天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强调对这一外来词翻译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 gender 的来源和意义

gender 既是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又是女权主义学术的中心内容。而在二十多年前,gender 一词只能用于语法中,仅指词的阴阳性。因为汉语语法不区分阴阳性(这本身是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所以没有对应词。英汉词典里把语法中的 gender 译成性。gender 这个冷僻的语法用词怎么会成为女权主义的关键词语的?这同西方女权主义者,尤其是首先使用这词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中叶,美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话语是“女性的奥秘”(弗里旦那语)。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组织携手作出对女性的严密规范,即贤妻良母是正常女性的惟一生存方式。这套社会规范的科学理论基础是生物决定论,即贤妻良母的角色是由女人的生理差别所决定的,归根结底,性的差别(sexual difference)决定了女人的从属地位。

在这个背景下,60年代末出现的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者冲击的重要目标是“生物决定论”。初期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区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婴儿出生后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证实的男性或女性;社会性别则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这个区分

的目的是指出:妇女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如以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说,是由女性的生理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规范的;人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行为都是在社会文化制约中形成的;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初期的女权主义者没有立即用 gender 来表述这种区分,而是用 sex role (性别角色)来指称社会对女性的规范。但因为 sex role 仍与 sex(性别,性)有明显联系,社会学家最早开始使用这个词是为了强调性别角色是由生理性别规定的,而美国女权主义者要反抗的正是突出女性特征、把女性当性工具、把对女性的束缚建筑在女性生理上的文化统治,她们需要一个没有传统文化包袱的词来表达她们的新认识,所以在 70 年代上半叶,她们开始用 gender 来指称有关女人的社会文化含义。

这种把 sex 和 gender 区分的认识后来受到女权主义的质疑。新的认识不是回到生物决定论,而是指出在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间划一条界线,会导致将生理性别看做是不受社会文化影响的、非历史性的、固定不变的特质。同西方学术界解构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相关,90 年代的女权主义反对将自然与文化对立,反对将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对立;强调人作为一种生物,处处都印上了社会文化的痕迹,包括性。这类对 sex 和 gender 不断深入的讨论使社会性别理论日趋丰富和复杂。

二十多年来,gender 社会性别已经发展成西方学术中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国际妇女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在世

妇会以前,我国学术界,甚至妇女研究界,对它的了解都是有限的。这一状况可能同社会性别理论的性质有关。同马克思主义创立的阶级概念相似,女权主义创立的社会性别概念也致力于探究一个被压迫群体——妇女——的历史与现状。但是,与阶级概念的诞生不同,社会性别概念不是产生于一个或几个人的著述,而是女权主义的集体创作。并且,这个创作没有事先规定的提纲和要求,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人从自己的学术背景或现实关注出发,从各个角度对社会性别进行探讨和阐述,表达各不相同的理论观点。面对繁花似锦不断发展的西方女权主义社会性别研究成果,想通过一两篇文章或著作来介绍社会性别理论的全貌,甚至企图列出几条“基本定义”,都显然是很困难的。在这儿,我仅能从我所熟悉的著述中选择两篇作简要介绍,以便在此基础上继续我的讨论。

盖儿·鲁宾在1975年发表的《妇女交易:性“政治经济学”笔记》影响很大,因为她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the sex-gender system)。“性/社会性别制度是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这些转变了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中得到满足。”她指出,是家族的再生产,或者说,是妇女交易,在家庭中再生产了男性权力和构造了社会性别身份。在男性经济中,女人被教成了供交易用的女性产品,这个过程的结局是将女人归入家庭领域去履行所谓自然的功能。基于对性/社会性别制度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她认为:“传统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如社会分层的演变和国家的起源,都需要重新做过,要包括母方表亲通婚的意义,在女儿身上获取的剩余价

值,从女性劳动力转换的男性财富,女性生命交换的婚姻联盟,婚姻对政治权力的贡献以及社会生活所有这些方面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⑧

受到鲁宾的启发,女权主义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探究社会性别制度在各种社会文化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和演变过程,社会性别制度与其他制度如家庭、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等。对社会性别制度的研究扩大了社会性别一词的内涵,也奠定了西方妇女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男女两性之上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性别制度——同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样需要研究。并且,社会性别制度不仅在家族制度中得到表现,还通过其他社会组织形态来表现。换言之,对任何社会组织形态的研究都需要考察社会性别制度在其中的运作。

80年代末,琼·斯科特的文章《社会性别: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对社会性别作了新的阐述,她强调:“社会性别是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分子,是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之上的;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作为社会关系的一分子,社会性别涉及到四个互相关联的因素:1.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文化象征;2.对象征意义作出解释的规范性概念(在宗教、教育、科学、法律、政治理论中表达);3.政治和社会机构组织;4.主体身份的历史构成。作为表达权力的一个基本场所或途径,社会性别同权力的观念和权力的构成牵连在一起,因为权力的分配(对物质资源和象征意义资源的控制和支配)经常以社会性别观念为参照。考察社会性别观念如何构成和合理一些社会关系,便能够看到社会性别和社会的相

互作用,看到在特定的情况下政治是怎样构成社会性别的,社会性别又是怎样构成政治的。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考察的含义是:像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一样,它的形成涉及到社会文化各个部分,对它的考察必须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能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本质主义的。^④

上述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否定而是互相补充,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制度来认识,也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了解。这些理论阐述不仅帮助女权主义学者们创造新的知识,它们还成为女权主义活动分子的行动指南(活跃于国际妇运的许多女权主义者本身也是学者)。通过世妇会同国际女权主义运动的接触,我们可以看到,对社会体制结构中、权力分配中(包括资源分配)的社会性别表现是女权主义运动关注的焦点,并且,这种关注是体现在各国女权主义者对社会性别在本国特定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具体情况的分析中的。社会性别概念只有用于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分析才有意义。社会性别是西方女权主义在对她们的文化、历史、社会的剖析过程中发展的理论框架。她们阐述的西方社会性别具体状况也许与我们的社会性别状况不尽相同或很不相同,但是,将社会性别看做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关系的认识却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认识来考察我们的社会性别状况,在对我们自己社会性别状况的历史的具体分析中丰富社会性别理论。

世妇会在我国举办使我国妇女研究者第一次大量接触社会性别概念,可以这样说,伴随着围绕世妇会的种种活动,靠着体制内外的有话语权的妇女协同努力,社会性别话语正在中国崛

起,并开始同其他话语较量,以达到改造主流文化的目的。

2. 翻译的缺陷和理解的障碍

从上述对 gender 内涵简要的部分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们使用的译词的不当。用“女性意识”来指称 gender consciousness 表达的是我们自己形成的观念,而没能转达 gender 在当代女权主义中的含义。中文的“性别”二字同样包含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意义,用“性别”来指称 gender 不仅对我们的理解造成限制也会产生概念的混淆。在这儿,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在国内妇女研究理论中有一个“有性的人”的提法。从作者对这个“有性的人”的阐述来看,许多用语同西方女权主义的语言很相似,如:“作为生物个体而相对独立的人,总是以其特定的性别身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人总是以具体的‘性身份’见诸自然并参与社会,正是在人的具体的‘性身份’中,浓缩着‘自然’与‘社会’两大范畴。”^⑧在这儿的“性别身份”如果是 gender identity 的译词,那么,这些话表达的是女权主义的 gender 观点,“有性的人”也应理解为 gendered person。女权主义的 gendered person 的视角,确实是一种全新的对人的认识,“造成了哲学上的一种革命”。但是,作者显然对“性别”二字作了出于自身文化背景的理解,即用“性别”在中文里常规的定义理解“性别身份”和“有性的人”,用英文来表述的话,就是 sexual indentity 和 sexed person。从而作者对性别身份的形成作了与女权主义社会性别观截然不同的阐述:“人是有性征的,抽象的人从来就不存在。有史以来,人,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女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便先天地预示

了他(她)的不同的生活道路,并因此造成了各不相同的行为方式和心态结构。”^⑨这个观点与“生物决定论”毫无不同。

对人是性有性和性欲的认识也许是人类最古老的认识:食色性也。8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性知识的传播不外乎两种途径:发掘古人的和介绍西方的著述。中国人可以谈论性体现了政治上的宽松,并非哲学上的一种革命。至于女人是有性欲和性的权利的观点,中国“五四”时期就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大声疾呼。在经历了“文革”的性禁忌后,知识妇女对女性性权利的呼吁对打破传统文化中贞操观对女性的束缚有积极意义,但是,一方面,我们主张女人应有性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得警惕对女人与性的关系的界定。强调女人性的属性,非但不是哲学上的革命,还可能重蹈覆辙,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期中的绝大多数女人的人生是由性来界定的。她们是为男人的家族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她们是男人的性工具。即使是在不准谈论性的那十年,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也从来没有铲除过。80年代以后性行业的迅猛发展就是一个证明。在性的问题上,如果不是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关系来分析现存的文化观念,而是用现存的语言,现存观念来表述,那我们不仅不能打破无所不在的传统文化的网,还可能巩固它。

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西方女权主义二十多年来发展了一套自己的批判语言,gender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词。也正因为此,我们在翻译这个词和其他女权主义概念时应格外谨慎,要避免用饱含陈旧观念的语言来包装新的概念。我们面临的困难是:若是用现存的语言,比如“性别”来作为gender的对

应词,必然夹杂了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文化意义。如上述的一系列例子所说明的,使用者一见“性别”二字,便会望文生义,产生出与 gender 在女权主义概念中不同的理解。若是生造一个词,好处是没有文化包袱,但是会让使用者有隔膜感,不易采纳,会影响这个概念的传播。认识到这一困境,我主张用“社会性别”。这个词的好处是,两个词组是中文里常用的,不至于给人太大的距离感;两个词的组合却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使人不能想当然地以自己的理解去套,而会产生一个问号:什么是社会性别?这种不带假设地提问是了解一个新概念的有利前提。但这个词的缺陷是,依然用了载着文化包袱的“性别”二字,未能表达出 gender 所标志的西方女权主义的新突破。此外,四个字的词组显得累赘,不上口,不利于流通。

我希望今天的发言能引起妇女研究同行对这个词翻译问题的关注。我们需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为 gender 找更贴切的中文译词。同时,我们需要剖析各个词语的内涵,考察它们历史的演变,从中追踪中国社会性别观和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并在对我们的历史和现状具体的分析中确定我们对变化纷繁的事物的立场和对策。

注释:

- ① 参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谭兢嫦、信春鹰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王政著,《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 ② 见《中国妇女报》,“宣传性别观点,唤起妇女自觉”,1996年6月20日,

- “性别意识：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上、下)，1996年7月9日和22日。
- ③ “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中国妇女报》1995年10月30日。
- ④ “女作家谈女性意识”，《中国妇女报》，1996年8月6日。
- ⑤ 同上。
- ⑥ “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中国妇女报》。
- ⑦ 汪红雨，“读者点题”，《中国妇女报》，1996年1月1日。
- ⑧ 张晓玲，“性别意识与参政决策”，《中国妇女报》，1996年7月9日。
- ⑨ 扈海丽，“企业女性的权利意识与女性意识”，见李小江、谭深主编《中国妇女分层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83页。
- ⑩ 魏红霞，“新时期中国电影女性形象”，《妇女研究论丛》，1994年第1期，第53页。
- ⑪ “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中国妇女报》。
- ⑫ 李小江著，《夏娃的探索》，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8～181页。
- ⑬ 1996年6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女性意识座谈会”的发言记录。
- ⑭ “用女性的眼睛看世界”，《中国妇女报》。
- ⑮ 同上。
- ⑯ 张晓玲，“性别意识与参政决策”，《中国妇女报》，1996年7月9日。
- ⑰ 李慧英，“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中国妇女报》，1996年7月9日。
- ⑱ “性别意识：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上)，《中国妇女报》，1996年7月9日。
- ⑲ 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⑳ 金一著，《女界钟》，上海：大同书局，1903，第3页。

- ⑳ 参见 Wang Zheng, *Feminism and China's New Women of the May Fourth Er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995; 舒芜著,《女性的发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促膝谈五四——本刊总编访夏衍”,《东方》,1995年第2期,第24页。
- ㉑ 见李小江、谭深主编,《知识妇女》辑丛,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扉页,“有一句老话:‘先做人,再做女人。’对此,知识妇女是一个超越,她的信念是:做女人,做全面发展的人!”
- ㉒ Judith Butler, *Contingent Foundations: Femi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Post-modernism'*, in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Judith Butler & Joan W. Scott, ed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㉓ 见李欧梵著,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Harvard, 1973. 作者并没有从社会性别角度探究现代中国知识男性的构成,但是他引用的翔实资料却反映了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中国知识男性对西方文化表达的雄性的仰慕和接受。
- ㉔ 周作人是“五四”男性知识分子中对妇女问题独具慧眼的一位,他在1927年写的北沟沿通信中明确指出:“现在的大谬误是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见《女性的发现》,第13页。
- ㉕ 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琼·斯科特对平等差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过批驳,她指出,“平等”在政治上的意义就是包括和建筑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的。见 Joan W. Scott, *Deconstructing Equality - Versus - Difference: or, The Uses of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for Feminism*, in *Theorizing Feminism: Parallel Trend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n C. Herman & Abigail J. Stewart, ed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 ㉖ 见《中国云南农村妇女自我写真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当代云南农村妇女在这本反映她们自己生活的摄影集中,表现了做农村女

人的艰辛,表达了“现在,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一样可以做”的自豪,却丝毫没有“回归女人”的意识。

- ⑳ 文学评论家李子云对女作家在新时期呼唤女性意识的努力有较全面的概括,见李子云,“从女作家作品看中国妇女意识的觉醒”,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性别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
- ㉑ 见李小江,《女人的出路》,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 ㉒ 见 Emily Honing & Gail Hershatter,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1988. 她们用大量报刊上摘录的妇女的文章反映 80 年代的城市妇女的状况,记载了那个时期性别分化,突出女性味的主题。
- ㉓ 转引自: Kathy E. Ferguson, *Interpretation and Genealogy in Feminism*. *Signs: Journal of women and society*, 1991, vol. 16, no. 2, pp. 322 ~ 339.
- ㉔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第 32 页。
- ㉕ Kate Millet,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Avon Books, 1970, p. 45.
- ㉖ Rachel T. Hare - Mustin & Jeanne Marecek, *Gender and the Meaning of Difference: Postmodernism and Psychology*, in *Theorizing Feminism*, eds. by Herrman and Stewart.
- ㉗ Linda Alcoff, *Cultural Feminism Versus Poststructuralism: The Identity Crisis in Feminist Theory*, *Signs*, vol. 13, no. 3, Spring 1988, pp. 405 ~ 436.
- ㉘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Modern Feminisms*, ed. by Maggie Hu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2, pp. 257 ~ 258.
- ㉙ Joan W.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two. p. 42.
- ㉚ 见李小江,《女人的出路》,第 140 ~ 141 页。
- ㉛ 同上。 (本文原载《妇女研究论丛》1997 年第 1 期)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序

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妇女研究的发展。’95世妇会前后,全国教育系统和社科系统纷纷建立妇女研究中心,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妇联系统的妇女研究机构大发展之后的新一波热浪。在妇女研究领域的机构和人员不断壮大的同时,我国妇女研究者的视野也迅速扩大,国际妇女运动中的议题、概念、理论通过《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为我国妇女研究者所熟知,而这些知识又在研究者中引发了进一步了解国外妇女研究的历史和最新成果动向的渴望。正是国内妇女研究者了解世界的渴望促成了我们编辑此书的行动。

参加翻译编撰这本译文集的是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部分成员,都是在欧美求学和供职的中国学者。在我们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们对西方妇女学和女权主义在各个学术领域中的发展有所了解。更确切地说,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女权主义繁花似锦的学术成果和不断推陈出新的理论方法。尽管它们没有直接解答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但是它们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

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开始以不甘于因循守旧、不畏于向习俗或“真理”质疑的态度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现实时,当我们开始以社会性别概念来分析我们自己的问题时,常常有一种走出迷雾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在实践中体验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本译文集表达了我们与国内研究者共享女权主义学术成果的心愿。

我们的心愿实际上近乎“野心”。经过了近三十年的蓬勃发展,当代女权主义学术在各个领域中的著述浩如烟海(仅英语世界的女权主义学术杂志便有一百多种),而我们这本集子仅能容纳十几篇文章,显然介绍女权主义学术发展是一项需要许多人长期努力的事业。令人欣慰的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便陆续出版了一些当代女权主义译作,海外中华妇女学会也做过一些翻译介绍的集体努力,*从长期事业的角度看,这本译文集也就是在沟通东西方的轨道上添加的一块枕木。

由于女权主义学术不是由一个或几个权威人士创立的,而是成千上万背景相异的学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问题进行研究产生的成果,所以它不仅卷帙浩繁,内容广泛,理论、观点、方法变化频繁,而且各种立场观点之间常常矛盾冲突,争论尖锐。由于女权主义学者和理论

* 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在这方面集体参与的项目包括:1993年与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国际研讨班(参见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编,《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和本学会选材、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译编的译文集《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西方的视角》);《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鲍晓兰主编,三联书店,1995);《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谭晓嫦、信春鹰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家们与以往的理论家们不同,她们不是追求去建立权威的“真理”理论体系,而是关注对具体问题的探讨解决,并承认个人的局限,尊重别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不同见解,所以将近三十年的理论学术发展中没有出现一家独尊的局面,而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这种状况使翻译介绍的难度极大。翻译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你可以声称是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女权主义却不是几本“代表作”所能代表的。那么,做何种选择才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广泛地表现女权主义学术状况呢?

根据国内已出版的女权主义译著情况以及国内发展妇女研究的需要,我们决定将本译文集定位于初步介绍社会性别(gender)研究在各学科中的发展。我们的目的不是通过几篇原作来归纳女权主义主要理论派别的观点,而是希望用选自各学科的各种文章来展现女权主义学者勇于挑战、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风貌,以实例来说明她们是怎样在各自的学术实践中运用、发展社会性别概念的。考虑到我国学术界对社会性别概念还很陌生,我们希望这本译文集将有助于学术界对当代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这一重要概念的了解和重视。妇女研究的深入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以新的角度和批评的眼光审视一切知识和观念。这种触及到深层文化改造的事业必然会牵涉到知识界。尽管我国妇女研究不是像西方妇女学那样发源于学术界,尽管我国学术界主流至今仍对妇女研究反应冷漠,但是近年来高教和社科系统妇女研究中心的发展预示了妇女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开拓的前景。本译文集不仅可以作为学术界内外妇女

研究者们的参考资料,也可以作为妇女研究中心教学的辅助阅读材料。

收入本集的文章包括了下列学科和专题:史学、文学、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法学、心理学、妇女健康学和第三世界妇女等。文章体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综述性的,回顾介绍女权主义学术在一个具体领域中的发展;一是分析范例,针对某一具体问题作深入剖析和阐述。选择这两类文章是希望既宏观地反映女权主义学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又具体介绍各个领域不同的方法、角度和观点。选入的文章最早的发表于1974年,最近的写作于1996年。在编排上我们按原作发表时间顺序排列,而不是以学科或专题分类。这样编排的目的是呈现给读者一份历史资料,有兴趣了解女权主义学术发展历史的读者可以按顺序阅读这些跨越二十多年的文献,从中便可领略学者们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点以及主要理论概念的演变发展。在附录部分,我们收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妇女学中心1996年秋季课程简介。尽管一个大学里一个学期的课程远远不能反映全美国六百多所大学的妇女学中心每年开设的三万多门课程的全面情况,但是这个简介也许能传达一些美国妇女学教学方面的信息,并使读者看到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和高校妇女学教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上述设想之外,我们对具体文章的选择标准是:原作所讨论的问题尽可能是同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相关,或是国内研究者也在关注的问题。设立这个标准是希望消除隔膜感。由于欧美学者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与国内学者的环境很

不一样,她们面临的问题也自然和我们的问题有许多不同之处。人们对于来自不同背景的差异是较难以理解的。为了缩小理解的距离,我们试图从介绍不同背景中的相似之处着手。也许读者对那些同自己关注的问题相似的议题感觉会贴近些,会更有兴趣去看别人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的。

不过,因为我们在注重文章的相关性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反映各学术领域的现状,所以读者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些概念很陌生,有些提法难以理解。由于女权主义学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翻译成中文的当代著述仅为沧海一粟,所以陌生感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学者在研究中运用了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而国内对西方学术界这些新思潮的介绍尚为有限,这可能使一些近期文章显得较为艰涩。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对有些概念性词汇加了译注。读者还可以参阅《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鲍晓兰主编,三联书店,1995),在该论文集里我们对近期的一些学术思潮和新概念作了综述性的介绍评论。我们谨希望通过不断地翻译介绍女权主义学术成果,许多陌生的概念和词汇会逐渐被国内读者所熟悉,这也是翻译在思想文化沟通中的基本作用。

不同的读者对一篇文章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了解文章产生的背景总是有助于加深对它的理解。我们在减少理解障碍方面的另一个措施是由译者或作者在每篇译文前加按语,简短地介绍作者和该文的写作背景,文章在其特定时期或特定领域中的特别意义。女权主义学者的写作不仅是针对现实中或学术领

域中的问题,也常常是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来加入女权主义理论的大辩论。也就是说,尽管绝大部分女权主义学者不是从事理论研究,但是她们是在女权主义理论争辩的刺激下思考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以自己的学术成果来丰富和拓宽女权主义理论。更确切地说,女权主义理论发展和女权主义学术实践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若没有广泛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就不可能有女权主义理论变化多端的发展;同样,若没有理论上的探究和交锋,学者们的思维便难以活跃,视野也难以开阔,要创造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是难以想像的。因为这两者的密切关系,所以本译文集的文章虽然是以学科研究为主,但又都反映出对女权主义理论不同程度的关注。读者可以从每篇文章对一个具体问题的讨论来了解那个特定时期的理论争鸣。

'95 世妇会以来,社会性别概念逐渐为我国妇女研究界所熟悉,从本集文章里读者可以看到,社会性别始终是女权主义学术和理论的核心概念。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女权主义学者致力于创立社会性别概念到 20 世纪 90 年代对它的质疑挑战,这个过程反映了女权主义学术队伍的壮大和多元化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同当代其他思潮的活跃交融。女权主义学者从各种角度、各种立场对社会性别概念的批评质疑并没有导致对它的否定和抛弃,相反,产生了对它更丰富、更复杂的认识。从对社会性别单一的强调和孤立的认识到今天将它置于各种差异之中来考察,强调社会性别同阶级、种族、族裔等等差异的交叉关系和相互作用,这种不断演化的认识也意味着对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我国,有意识的社会性别研究起步还不久。我们通过这本集子将西方社会性别研究的历程和今日状况概要地呈献给读者,并非是为我国研究者提供一个发展模式。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差异很大,任何一方面的发展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套。我们引进这个复杂的社会性别概念是因为认为它可以便于我们认识分析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而如何来认识、如何来分析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还要靠我们自己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在悠久的中华文明史里,各个时期、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妇女生活状况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性别关系同其他各种社会关系是怎样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的?这种相互作用对我们的历史、文化、国家、社会的意义何在?对具体的男男女女(即历史中的人)的人生有何种影响?近代以来引进的西方“科学知识”中的社会性别观念是怎样的?它们是如何作用于我国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在当代社会各种知识和专业领域的建立过程中,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社会性别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中有无穷无尽的谜需要自己去窥破,任重而道远。如果本集子能起到一点启迪思想、开阔思路的作用,为国内研究者的艰辛开拓助一臂之力,那就是译者们最大的欣慰了。

从事沟通东西方思想文化工作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语言既是我们必需的工具,又是我们最大的障碍。我们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希望用等义词来准确地表达原作中的含义,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语言也充满了差异,一种语言中的许多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等义词,于是我们设法寻找代义词。当发现代义词可能扭曲原意时,我们被迫造词。而造词的

代价是很清楚的,读者无法按字面理解,译者想传达的意思不能立即让读者领悟。本集的译者们时时需要在这种两难境地中做选择。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创造了许多新词汇来表达其对现代性的颠覆及对西方思想理论传统的挑战,这些词在西方学术界也并非人人皆懂,而我们却要跨越时空地让处于相当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中的中国读者理解,其艰巨性可想而知。

在此强调翻译的艰难是为了说明:我们的工作常常既是创造性的又是尝试性的。我们用了一些新词来表述中文里所没有的新概念,但我们并不坚持那是惟一准确的、权威的译法。相反,我们希望和读者一起磋商探讨,以便更深入地理解那些新概念和寻找更有效的表述方式。因此,我们在概念性的中文译词后面都附上了英文原词,便于读者的反馈。不仅是翻译新词颇为棘手,“老”词也同样成问题,因为词义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如何表述老词中的新义也是一大难题。这方面一个典型例子是 *feminism*,该词在汉语中一般译为“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本集译者们在选择 *feminism* 的译词问题上争论激烈。我们在此简要地介绍一下译者的各种意见,以利于读者了解翻译概念词汇之复杂性。

首先,所有的译者都认为“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两个词都不是对 *feminism* 的恰当翻译。*feminism* 有别于各种“主义”,它不是由几条定义和一系列连贯的概念组成的一种固定不变的学说,更不是排斥异己、追求占据思想领域中霸权地位的“真理”,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交融的场所。它历来同时包括理论与实践。“主义”二字已是不准确,

而“女性”、“女权”则更是未能表达 feminism 的丰富内涵和社会文化改造的宏大目标。

有鉴于此,有的译者建议将 feminism 译成“妇女解放思想”,来表达集体形成的各种各样对妇女解放的理想、建议、设想和理论,表现广泛的民主参与和参与者创造新思想的能动性以及突出 feminism 转变人的思想意识提高觉悟的作用和目标。如果仅仅是孤立地比较,“妇女解放思想”一词确实比“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都要准确得多,但是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中,它不是一个新词。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后不久就开始使用“妇女解放思想”一词来标明自己同 feminism(女权主义)的区别,“无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早已是中国政治话语中具有特定意义的熟悉词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若用“妇女解放思想”来指称 feminism,不一定能达到传达 feminism 宽泛含义的目的,相反,可能会造成误解。

在没有更好的译词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译者在“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两者之间作了选择,个别译者用“女权/女性主义”。主张用“女性主义”的译者认为:一、“女权主义”的“权”字作“权利”、“权力”解,但是 feminism 并非是简单的女性向男性争取权利或权力,而是改造男子中心的等级制文化和社会体制,消除对妇女及其他受压迫社会群体的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歧视的深刻广泛的斗争。20 世纪初中国刚引进 feminism 时,鉴于当时欧美妇女的争取选举权运动和早期的妇女权利运动,我们用“女权主义”一词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 feminism 的理论和实践都已有了很大发展之时,仍用“女权主义”便显得狭隘过时。

“女性主义”则因其强调女性的视角而比较宽泛灵活。二、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妇女研究者选择了“女性主义”一词为 feminism 的译词,同时又出现了“女权主义”来指称西方的 feminism、用“女性主义”来指中国妇女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现象。这一现象隐含着一种将中国妇女的实践同国际妇女运动的实践作非历史性的、本质化的区别的倾向。译者们担心这种将中外妇女差异本质化的倾向会在国内妇女研究者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造成思想障碍。为了避免加强这种无益的二分法,我们应将国外的妇女理论实践也译作“女性主义”。

坚持用“女权主义”的译者对上述意见既有赞同之处又有不同看法:一、她们同样不希望加强上述的二分法,但是认为可以用对国内的 feminism 也称“女权主义”的办法来解决。二、她们强调应关注词语变化背后的历史、政治、社会意义。词语含义的变化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在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群体的斗争较量中出现的。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引进 feminism 时,“女权主义”一词是标志着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的褒义词。它怎样在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演变成贬义词的?我们今天对于那一段被抹去的历史有什么样的责任?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她们主张用“女权主义”一词来表示对 feminism 在中国的历史的肯定和继承。三、当代国际妇女运动丰富发展了妇女权利概念,强调妇女权利也是人权。在这个新的概念和斗争实践中,争取妇女权利已远远不仅是争同男子一样的政治权经济权,而包括反对一切由男子中心等级文化对妇女的暴力、残害和剥夺。同时国际妇女运动还广泛传播了“妇女赋权妇女”(Women empower

Women)的概念(参阅《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谭兢嫦、信春鹰主编,1995)。在这个历史背景中,我们也可以对“女权”二字作新的阐释,即可作“妇女的人权”和“使处于底层的广大妇女具有权力和力量”(empowerment)解。“女性”二字则不能表达如此鲜明的政治态度。“女性主义”在中文里具有文化和学术的意味,但是 feminism 是起源于社会政治斗争的,理论和学术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我们的译词应表现其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政治力量的含义。四、剖析“女性主义”一词 80 年代在中国出现的历史背景,她们注意到该词的使用同国内流行的本质先于存在的妇女观的密切关系。此外,“女性主义”一词本身就有本质先于存在之嫌,它意味着生理上的女性天然具有独特一致的立场角度。尽管在西方的 feminism 中也有持本质主义观点的,但那不是主要的倾向,相反是近年来 feminism 理论所竭力反对的。用“女权/女性主义”的译者则认为:该词可以表现 feminism 的不同意义及对它的不同理解,能反映 feminism 的历史构成状况;既然在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今日世界中,混合杂交身份已日益成为一种常态,我们也不必追求划一单纯的译词来表现复杂的事物;相反,应看到翻译本身是文化与语言差异通过译者进行磋商较量的过程,是一种改变现状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应让“简洁”的译法给掩盖了。

译者们的各种观点反映了各人对女权主义理解的侧重点的不同以及策略考虑的不同。我们在本译文集中采纳了表达这些不同的多种翻译法,以表现我们这个女权主义群体的多样性。只是要请读者注意,“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和“女权/女性主

义”的英文词是一个：feminism。它于 19 世纪末出现于法国（作 *féminisme*），被用作“妇女解放”的同义词。然后传入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1910 年以后在美国流传开，非英语国家包括中国也在 20 世纪初期开始流传 *feminism* 一词。这是一个具有一个多世纪历史的老词，有它自己的历史延续性，只是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全世界女权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无畏开拓，使这个词的内涵急剧扩大，才造成了我们翻译的困难。谨希望本译文能丰富中国读者对这一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外来词的认识，并欢迎读者参加我们对译词的讨论。

当代中国妇女研究^①

本文通过分析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发展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试图描绘这个运动的轮廓并且探讨这一运动对参与者的意义以及中国妇女运动和西方女权主义的关系。

创立中国妇女研究——最初阶段

对于那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一代中国妇女，特别是那些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平等教育和就业政策的城市妇女来说，“中国妇女已经解放了”曾经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认识被动摇了，当时全国性的报纸上所报道的农村女婴被杀和虐待生女孩的妇女的案件，震撼了妇联和大部分受教育的城市妇女。全国妇联立即发动了一项“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的行动，这一行动意味着妇女解放尚未完成，还需要更多的公共关注。^②

此后不久，与城市妇女相关的其他问题引起更多的公共关注和媒体介入，如离婚率的上升、大龄未婚女性比例的增长、妇女的平等就业、女性是否失去了女人味、卖淫的重现等等。面对

新时期的各种各样的妇女问题,妇联决定把妇女理论研究作为首要任务之一。1984年9月,全国妇联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重点提出了妇女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要求各地妇联分支机构组织妇女研究者,要提高妇联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在以后的几年中,全国妇联为妇女研究提供了合法的舞台,全国妇联的组织网络力量也刺激了全国性的妇女研究兴起。毫无疑问,全国妇联是推动妇女研究的最主要的力量。

1986年10月,全国妇联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一百多人中,50%来自非妇联系统,如全国的社科院和高校。会议讨论了六个主要议题:改革和妇女解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妇女角色,妇女形象和妇女观,生育的社会价值,怎样使妇女成才和建立中国的妇女学(women's studies)。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与会者提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第一种意见反对建立妇女学,理由是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没有见过,它是开放以后从西方传来的,是带有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含义的;第二种意见则提倡妇女学,认为妇女学是一个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就像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可以来研究。^③

关于“妇女学”的辩论

在全国妇联理论研讨会上对“妇女学”的争议是一场公开辩论的继续。此前,1982年,《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第一次以“妇女学”来翻译“women's studies”。该刊在1984年刊登了一篇译自日本《科学观》(Science of Ideas)期刊的题为《女权主义运动和

妇女学历史》的文章。1983年,《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出版,编者朱虹介绍了美国大学中的妇女学。她将 women's studies 译作“妇女研究”。1986年,妇女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日本著作《女性学入门》(富士土谷子著,张萍译),在此,women's studies 被译作“女性学”。不同的人用三个不同的词来指同一个 women's studies,它们在中文内涵上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异。“妇女学”和“女性学”,很明显是外来的新词,尽管它们都用“学”字表达了这是一门学科,但是“女性学”可以被理解为仅仅是关于女性生理和心理的学问。“妇女研究”听起来是本土的而且在所表达的内容上也没有什么模糊之处:所有与妇女有关的问题都能成为“妇女研究”的对象。但是这个词没有表达同学科领域的紧密联系。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中国的妇女研究不像国外的妇女学那样集中在学术机构中,我认为,“妇女研究”(research on women)是对中国现状的一个精确的表述,同时“妇女学”是对国外 women's studies 一个很好的译法。

1984年,妇联的《妇女工作》发表了一篇邓伟志的文章《推动和发展妇女学》,呼吁在中国建立妇女学。他认为把妇女研究套上妇女学的标签是很重要的,这样人们才会从学术角度来思考妇女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有妇女运动的经验,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妇女工作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的一部分已经上升为理论,但是它们中的大部分仍然需要被理论化,需要纳入整个的科学体系。妇女学是妇女运动发展的产物和需要。”^④

1985年,李小江在河南省未来协会的名下创办了“河南省

妇女学会”，并于7月召开“妇女研究信息交流会”。1986年2月27日，《中国妇女报》发表了邓伟志的文章，题为《迎接妇女学的黄金时代》。1986年3月8日，《经济日报》发表罗琼的文章《关注妇女问题的理论研究》，反对在中国介绍妇女学，因为“我们的妇女解放理论在意识形态、服务的对象和最终目标都与60年代以来产生在美国和日本的所谓的‘妇女学’不同”。罗琼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对中国建立妇女学的必要性的公开讨论。有人认为妇女问题应该在各种不同的学科领域中进行研究，而妇女学会限制妇女研究的范围。有人认为妇女学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科学，它包含各种研究妇女的发达的学科领域，但是在中国建立妇女学的条件尚不具备。另一些人则认为迫切需要建立中国的妇女学。还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妇女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将会在中国有光明的前景。当时几乎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不了解妇女学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即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构成，也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但是对于妇女问题和妇女学问题的关注本身意味着在中国已经开辟了讨论社会性别问题的公共论坛。^⑤

关于妇女学的辩论并没有帮助澄清西方的妇女学究竟是什么，但是它激起了许多人对妇女学的兴趣。对其中大部分人来说，妇女学是一个全新的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研究妇女问题的西方学术领域。这场辩论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许多人，包括妇联干部都急于介入“妇女学”这一崭新领域。许多妇联的人感到当代的妇女问题需要一种科学的方法，新时代的妇联应该具有新的功能和新的形象。“妇女学”没有政治污点，但具有学

术威望,所以从1986年开始,各地妇联相继成立了“妇女学会”。这些学会是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为学者和妇联干部座谈、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妇联干部在研究项目中寻求学术帮助搭建了一座桥梁。1990年,全国妇联成立了全国妇女研究所,在国内出版惟一的妇女研究方面的杂志——《妇女研究论丛》。这本季刊不久就成为最主要的包括妇联系统和妇联以外的关于妇女研究的学术论坛。

80年代之所以成为妇女研究显著突出的时代,不仅是妇联干部努力的结果,还有许多妇女学者的自发活动。1985年,李小江在河南成立妇女学会。同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一些中外教师也成立了一个妇女学会。在长沙,当地妇女学者组织了一个妇女社团,座谈、讨论她们关心的妇女问题。1987年,李小江的妇女学会发展成为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1988年,美国史教授齐文颖在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妇女沙龙;中央党校的一些研究生和教师成立了妇女研究会;在天津师范大学,杜芳琴、闵冬潮和一些青年教师成立了“妇女历史和现状”的研究组;在上海复旦大学,一些英语系的女教师成立了妇女研究组;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徐安琪、陈惠芬和一些女新闻工作者成立了妇女沙龙。在北京,王行娟在民办的中国管理学院创办了妇女研究所,她在1992年开办了第一条妇女热线。^⑥中国在20和30年代也有过妇女研究的热潮,那是在“五四”女权主义的思潮推动下出现的,参与者主要是男性知识分子。20世纪末的妇女研究热潮则主要由女性推动。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妇联组织

从一开始,许多学者和妇联干部就声称中国的妇女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的。为了理解这一声称所包含的多种含义,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话语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四”女权运动,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和私有制历史的理论,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妇女解放观,苏联妇女解放模式以及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从“五四”女权运动以后,妇女解放作为现代性的标志已经进入了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从共产党成立到根据地建立,直到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套表述清晰的妇女解放理论已经形成并被指定是妇女解放的理论基础和方向。除了少数几篇从西方或日本翻译过来的西方理论著述外,妇女解放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党内妇女理论家的文章和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献。这一理论的主要论点是:1. 妇女的被压迫是由于私有制,因此它也是阶级压迫的一部分;2. 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是使她们彻底解放的惟一正确道路;3.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男女平等,但妇女的彻底解放只能到更高级的人类历史阶段——共产主义才能实现。

根据这个理论,社会主义由于消灭了私有制和实行各个领域的男女平等,是妇女解放的高级阶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实践忠实地依照这个理论实施:男女平等被写入宪法,并且在教育和就业上行之有效,至少是在城市地区和公有领域。尽管国家从来没有对中国文化中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进行过认真的挑

战,但是从“五四”女权主义继承的“男女平等”的口号,借助国家宣传机器的力量成为中国的日常用语,在中国的社会性别话语中,男女平等成为由国家提倡的主导话语。毛泽东时期的男女平等话语(“平等”常常由男性的标准来衡量)既成为当代中国妇女的批评靶子,又是她们批评力量的主要源泉。

在改革开放时期,当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重点同早先的男女平等政策发生矛盾或抵消后者的时候,妇女解放理论成为妇联为了妇女利益同国家磋商的最重要的场所,妇联积极进行重塑、重申和提倡妇女解放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固定的术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被用来指称在中国革命漫长过程中形成的妇女解放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内容却没有被固定下来。在妇联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时候,实际是以此来提醒党对男女平等的承诺,并且巩固自己作为官方妇女组织的权力。

妇联是在政府机构中负责妇女问题的机构,在改革时期开始有意识地以各种方式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来维护妇女利益。80年代初城市经济改革初期,剩余劳动力立即成为一个问题,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要是男性)公开提出在现阶段妇女的高就业率是不适当的,女人应该回家,为男人就业腾出位子。妇联干部和妇女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武器反对这个论点。她们强调妇女参与社会生产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没有妇女的经济独立,男女平等就失去了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保证妇女在就业上的平等。妇联的高层领导关涛后来评论说,由妇联干部和妇女学者引导的对妇女就业的研究和公

开讨论,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公众舆论,影响了国家决策者。妇联最成功的策略之一是1990年3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公开进行由妇联干部起草的题为《全党和全社会应该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演讲。这个演讲很快被妇联引用,使各级行政官员明了妇女解放仍然在党的议事日程上。

妇联在提倡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妇女研究上活跃的角色说明,妇联不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政府的工具,而是在有意识地探索为妇女利益工作的策略。当然,执行国家政策和要求仍是妇联的重要“妇女工作”;不过,妇联的“妇女工作”新的方面——研究和解决妇女问题——使得妇联在改革时期处于妇女和国家之间的中介人的位置。

当我们评估妇联的角色转变时,有必要着重指出它的一些连贯性。虽然在改革时期政府部分地放弃了妇联的财政,但妇联干部仍然是政府的职员,其高层领导的行政级别还是由她的上级政府部门批准的。一个妇联领导也可能以取悦自己的顶头上司为最高准则而不是主动探索为妇女利益服务的途径。领导者是决定不同地区妇联不同表现的最大的因素。换句话说,制度上的连贯性维系了妇联作为国家官僚机构的那部分功能。另一个重要连贯性是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首要地位。妇联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能够帮助她们为妇女争取社会公正,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语言中,许多妇联干部仍然坚持一个“真理”——只有以党领导下的妇联为领导的中国妇女运动才能成功。妇联同时认同妇女和国家的企图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代表”妇女的

根本利益(更确切地说,应是“界定”妇女的根本利益)。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关于社会公正和男女平等的信条受到市场经济力量挑战的同时,其国家主义的核心也在改革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受到妇女的挑战。事实上,这后一个挑战为中国妇女研究发展提供了许多动力。

女学者的角色

妇联推动妇女研究的初衷是促进妇女权益和巩固妇联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官方领导地位。但对学界的女学者来说,从事妇女研究是被80年代初期政治和学术上的反思潮流所引发,以及被最新的关于西方女权主义和妇女学的零散资料所激发。对她们来说,妇女研究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以及为妇女自发行动开辟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就这点而言,河南郑州大学的文学学者李小江在80年代扮演了一个最突出的角色。

当许多妇女以从事自发的学术或活动项目来改变妇联垄断局面时,李小江所做的不止这些。在1989年出版的一个小册子里,她公开地对妇联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宣称如果妇联一朝解散,对社会也没有任何影响。^⑦

有趣的是,李小江对妇联的挑战并没有导致妇女研究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女学者,另一个是妇联干部,而从一开始,两个部分就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的妇女研究,许多研究项目都是由学界的女学者和妇联干部共同合作的。李小江本人也是依靠各地的妇联组织的帮助才得以实施许多项目和活动。这种合作可以有以下几点解释:首先,妇联举办的妇女会议和由妇

联出版的刊物对那些在本单位得不到支持的妇女研究学者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女学者缺乏必要的资源来从事大规模的研究活动,而妇联干部却是拿着工资和带着其他便利来从事妇女研究。女学者没有理由拒绝妇联的资源来推动她们共同感兴趣的妇女研究。第二,女学者被妇联干部看做平等的合作伙伴和专家,在这个全新的妇女研究领域,妇联干部没有以专家或领导的身份自居于女学者。而且,女学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一个项目。她们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而且通过与妇联的合作能够参与决策。第三,妇联内外从事妇女研究的妇女几乎都来自相同的人群而且具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在90年代,她们大约四十岁左右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她们中的许多人在“文革”中下乡并在“文革”后重新走入校园。大学毕业后,一些人被分配到学术机构,一些人被分配到妇联。由她们目前的工作环境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并没有轻易地抹去她们在过去相同的生活经历中形成的共同目标和观点。事实上,妇联内外的这代人比同在妇联工作但不同年代的人更具有相似的观点。这代年轻的妇联干部使妇联在妇女研究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最后,妇女研究中的理论分歧也不是以学界和妇联为界产生的。早些年,李小江对妇联合法性的挑战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但是妇联本身在改革时期对妇女研究的介入已经意味着看到了毛泽东时期阶级观点的不足。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思想背景中,才出现了对妇女在改革时代中的问题的关注。尽管在这个时期没有出现一个清晰的社会性别概念,但社会性别议题已不再由阶级分析的方法包揽和左右。在这个背景中,“资产阶级女

权主义”的指责是无力和无法令人信服的,也难以吸引那些试图寻找新方法来分析妇女问题的年轻一代的妇联干部。

妇联中的一些妇女研究者不仅没有竭力去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划清界限,相反她们开始有意识地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由全国妇联和山西妇联合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概论》(1991),被妇联干部誉为第一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著作,书中用整整一个章节讨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女权主义的关系。虽然作者们的分析框架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但她们批评了那种完全拒绝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极端的观点”。作者们认为持有这种“极端观点”的人没有看到“妇女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她们的斗争是有益于人类的解放的。他们没有看到女权主义对一个没有性别压迫只有男女平等的理想社会的追求是同马克思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理想所一致的”。^④作者们认为拒绝认识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价值是“不科学的”;她们认为正确态度是将女权主义斗争的有益范例融合进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发展,包括女权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女权主义为平等权利而战的策略以及女权主义者为提高妇女觉悟而做的努力。这些论述标志着妇联从先前反对西方女权主义立场的重要转变。

妇联对西方女权主义接纳的态度避免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80年代出现的中国女权主义活动的正面冲撞,同时我们需要看到的重要一点是,学界的女学者既没有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没有立即使用西方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批判。在这个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不存在女学者和妇联干部的明显界限,尽管

学界的女学者在与西方女权主义学者交流中或在学术刊物或英文原版著作中阅读有关女权主义文章时首先接触了西方女权主义。由于80年代很少有当代女权主义的中文译著,而且大部分的中国学者并不读英文,对西方女权主义有兴趣的中国妇女了解一点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信息,但很少知道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她们对西方女权主义的看法往往来自她们与偶然遇到的西方女权主义者的私交或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批评。这种状况的一个结果是,早期的中国妇女研究者在发展中国的妇女研究时没有抓住西方妇女学发展中最中心的“社会性别”概念。

“本质”的妇女和“女性味”话语

到底是什么样的学术潮流形成或刺激了中国女学者在80年代寻求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在它的初始阶段,中国的妇女研究从当代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中受到的推动力多于西方的女权主义。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的时代特点是人们对性别差异表现出高涨的兴趣。这个兴趣的一部分来自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的和动荡的政治年代的反抗。城市妇女对于以男性为标准的男女平等极其不满并且迸发了“做女人”的热情。但对于理论学者来说,这个性别差异的问题也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着紧密的联系。著名的“异化”理论使得“异化”和“人性”这些词进入中国思想和文学话语。那些年里,理论阐释和文学描述的一种本质的普遍的“人性”成为理论界和文学界流行的主题。依据

异化理论的逻辑,一些理论家开始了关于极“左”的妇女政策扭曲了妇女的自然本性的辩论:中国妇女的“男性化”很快就成为极“左”的罪状之一;因而中国妇女的“女性化”也就成为“进步”的姿态,它意味着对“人性”的张扬。“文革”时期的“铁姑娘”也成为学术界和通俗文化中的笑柄。受毛泽东时代男女平等教育长大的一代妇女,发现她们被年轻一代看做是十分可怜的,认为她们从没有过“女性的生活”,有些人因此变得令人讨厌地“男性化”。许多女作家因描述那一代“回归女性”和“重新发现女性的自我”的痛苦经历而广为人知。强调在服装、社会角色、行为和职业中的性别差异(通过妇女的女性化来实现),成为80年代的特点并标志着改革时期的女性味话语的诞生。^⑨

这一性别分化的进程与妇女研究的兴起同步进行。当许多妇女以接受女性味的服饰和社会角色来表示对“男女平等”的否定时,一些女学者开始走得更远了。她们不仅要把妇女从外表上同男性区分开来,而且要把妇女在理论上从阶级中分离出来。毕竟,一个缺乏性别区分的时代得以实现主要是通过阶级这个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分析范畴的威力。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长期阶级斗争实践中,妇女利益总是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变成次要的或是被忽略,所以一些学者认为把妇女从阶级中分离出来对于建立中国妇女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妇联的妇女问题研究意味着脱离阶级分析的统治,那么一些女学者则明确地将妇女做本质主义的理论抽象来挑战阶级理论。

今天看来,这个西方词汇“妇女学”引起中国妇女的注意并

不是偶然的。正当中国的一些女学者寻求从阶级理论挣脱的支持的时候，“妇女学”来得恰逢其时。“妇女学”对中国妇女来说意味着在现代化国家，妇女被看做一个分离的、独立的类别，是值得用科学的和学术的方法来研究的。还有什么能比妇女学更有效地宣告妇女的独特性呢？还有什么能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妇女从阶级中分离出来呢？所以很可理解，“妇女学”很快就成为能够让中国妇女把“女人”界定为一个分析类别和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理论中脱离出来的主要工具。李小江 80 年代的著作为这个过程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在《夏娃的探索》这本书中，她力图把妇女从阶级中分离出来，以此为中国的妇女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她把她的努力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重新定义。她主张女性的构成和发展在本质上是先于和超越阶级的。“两者隶属于不同的范畴(妇女属于人类本体范畴，而阶级属于社会历史范畴)。”(32 页)她还认为对妇女的理论抽象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惟一正确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的前提，是对整个妇女的抽象，即对妇女的国家、民族、时代、阶级、年龄进行扬弃而获得的观念上的一般。”(同上)她进一步争辩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隶属于人类科学”范畴。因此，“不仅要在社会历史范畴考察妇女的阶级属性，而且要在生理—心理学基础上考察两性差异，并力图在人类社会的本质运动中把握妇女的存在”。(32~33 页)

李小江不断使用的像“科学”、“自然”和“本质”这类词汇，清晰地反映了李小江的妇女理论和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异化”理论辩论的密切关系。她求助于科学和科学知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

用来消解政治话语的惯用策略。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创立了一种科学的现代化话语。李小江的建立科学的妇女研究的努力当然是受到这种话语的影响。在 80 年代中国的政治思想背景中,对妇女的科学理解就是要用“硬科学”或伪科学的语言(大部分是 20 世纪初从西方进口的)来表现一个本质性的女人。这个本质性的女人既不受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控制,又不受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理论管制。如李小江所建议的,这个本质性的女人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础。

李小江在书中对西方妇女学的讨论则清楚地显示了西方女权主义对她的思想影响以及她对当代女权主义理论了解的局限。她注意到从 60 年代的女权运动开始,西方妇女学作为反对传统理论的一支力量在学术界发展迅速。她认为当代西方女权运动说明妇女作为一个整体在妇女利益的基础上反抗男性中心社会,这个反抗是一种抽象,为妇女学的理论抽象提供了真实的基础。(28 页)这里“抽象”这个词意味着寻找一个超越所有社会限定的普遍化的、本质的妇女。把妇女学的目的理解为对妇女做理论抽象自然反映了李小江本人在特定政治背景中的关注点。但正是这个“抽象”给了她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理论相异的观点。在李小江看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说明妇女可以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来为她们的共同利益奋斗;在中国达到这个抽象的关键是培养女性意识,即让中国妇女意识到她们是女人。

尽管她的著作反映了西方女权运动对她的影响,然而她所说的女性主体意识并不是社会性别意识。在李小江的理论里,女性主体性有两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女性意识和自我实现,

即在所有的领域里努力实现每个人的潜能。这就要认识到作为女人与男人的不同,不仅仅是生理差别,还有性别角色的差异——妇女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角色是由女人天生的生育功能决定的。李小江对女性意识的理论阐发基于对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话语的批判。她认为以往的男女平等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因为妇女被男性的标准来衡量和判断;并且认为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并不等于妇女解放,而是加给妇女的“双重负担”。在80年代这些批评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她没有分析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在改造男权文化和体制结构上的不足,相反,却指责妇女解放无视妇女独一无二的女性特点和它“对两性的原始特质的扭曲”。^⑩

妇女研究的兴起既受到了女性味话语(从讨论女人的本性开始)的影响又对女性味话语做出了贡献,它努力提供关于女性气质的科学理解并提出女性主体意识。因为女性味话语美化妇女的女性角色,可能让那些曾经为扮演妻子母亲角色而感到内疚的妇女获得心理上的宽慰,尽管它并没有做什么去改变妇女的双重负担,但还是有助于将妇女从阶级中分离出来。在参与创造女性味话语的过程中,妇女也开创了自发活动的社会空间。

但是,女性味话语对中国妇女的影响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中,妇女的天性或女性气质比人的天性具有更多负面的含义。当妇女被女性气质定义时,她们就被降到比人还低的地位。除非我们抛弃了蕴含在“女人”这个词里面的文化包袱,不然,简单地呼吁“做女人”会调动起许多被压抑的中国文化中关于女人的贬义概念。尽管赞美女性气质使中国妇女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如穿女性味服饰的自由),但是女性味话语

显然也限制了妇女的发展,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点。在1992年上海召开的一个妇女研讨会上,著名的物理学家、复旦大学前任校长谢希德(当时年过七十)出示了一份物理系的女生招生表,显示出招生人数从50年代和60年代的急剧增长到80年代末的急剧下降,1993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没有招一名女学生,因为这一代的年轻女性开始感到她们不得不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到更“女性的”职业中去。

此外,女性味话语被不同的社会群体提倡推动着。当学界从政治目的出发提出本质的女性的时候,商业利益发现了女性特质是有利可图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下,中国传媒中“现代女性气质”形象激增。被创造的各种现代女性形象既因循传统女性美德,又以性感的身體和消费主义吸引大众。界定什么是好女人的权利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力量。由于大众传媒的力量,商业化了的现代女性气质掩盖了李小江和其他妇女学者提出的女性主体意识;然而后者缺少理论的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在变化了的9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许多女学者开始深切地感受到需要有新的理论框架来抵制女性味话语,来突破原有的妇女理论的局限。

“世妇会”背景下的妇女研究

90年代初期,中国的妇女研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随着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NGO)论坛在中国召开,来自西方的新概念和全球女权主义涌入中国,并且成为中国妇女研究者急于想把握住的新的分析工具。结果

是,妇女研究不仅扩展了范围,并且在主导话语的质疑方面有了质的变化。

在过去的几年里,通过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到中国访问并与中国妇女学者讨论,邀请中国的学者出席会议、参加项目等等,促进了中西方妇女学者的交流。199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了“赋社会性别于中国研究”的学术会议,这是第一次有许多中国妇女研究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不仅达到了促进东西方妇女研究学者了解的目的,还产生了一个有意义的成果:它为两群身处不同地域的中国妇女创造了对话的机会。在中国从事妇女研究的女学者和成立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女学者建立起联系。两地的中国妇女学者(组织)一致决定联合召开一个研讨班。1993年暑假,CSWS和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在天津师范大学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的研讨班。一些来自CSWS(作者也是其中之一)的成员介绍了在社会性别问题上的女权主义视角,十多位国内的学者提交了她们对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报告。来自全国的一百多名妇女(来自学界和妇联)参加了研讨班。

天津研讨班使国外的中国妇女学者在中国直接发出女权主义的声音。国内的妇女研究者急于学习女权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强烈欲望也出乎CSWS的成员所料。一位高层的全国妇联干部也坦率地说:“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我们应该学习任何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许多与会者第一次在天津研讨班上接触了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中国妇女问题在新的角度下被重新审视。研讨班上提出了下列问题:国家是否总是代

表妇女的利益?—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是促进妇女解放的国家政策,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使用妇女劳动力?哪些国家政策产生了解放妇女的影响?影响了哪些妇女?面对劳动市场的歧视妇女、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和家庭暴力,除了寻求个人咨询服务和热线,妇女还应该做些什么?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仔细和全面的分析,但是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把天津研讨班作为“全球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登陆”,因为它把女权主义关键的概念——“社会性别”(gender)介绍给中国的研究者。

国际组织和西方的私人基金会特别是福特基金会对推动妇女研究的中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福特基金会资助了中国学者参加哈佛会议和天津研讨班。1995年6月,它还资助了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妇女和女权主义思想”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生育健康项目,送中国妇女学者去国外,同时将西方的学者请到中国参加会议或特定的研究项目。此外,福特基金会还资助农村妇女发展、妇女教育、妇女人口流动和妇女立法等项目。这些项目介绍了女权主义分析妇女问题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参与的妇女在项目结束后继续用新的女权主义知识来进行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例如,参与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翻译《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妇女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成立妇女健康组织,并且从事关于中国妇女健康问题的深层研究。这样的例子说明国外的学术和物质资源,为刺激中国女权主义运动成长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主办世妇会给中国妇女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政府开始临时

性地支持一些对妇女有益的项目。大量的宣传传达了中央政府正在努力提高妇女地位的信息。出版社开始寻找关于妇女问题的专著,杂志和报纸的编辑组织显示妇女成就和讨论与妇女相关问题的特殊专题,并且制作宣传世妇会和非政府组织论坛的特别电视节目。

在官方动员迎接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全国形成了一股建立妇女研究中心的浪潮。1994年2月,国家教委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一个为期两天的妇女学会议。大会的主席是彭佩云,世妇会中国组委会主席。会议的议程是讨论国内外的妇女学和为世妇会的准备工作提供建议,大约有25个妇女研究中心的代表出席。显然,有一些是在大学收到会议通知后匆匆成立的。不过,全国的高校都知道现在妇女学是有国家支持的了。

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发现了国家对妇女新的关注是值得期盼的。一些妇女研究者和活动家发现国家表现中国妇女美好形象的兴趣有时干预了她们对当代社会的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尽管这样,直到1994年底,许多妇女活动家仍然希望世妇会特别是非政府论坛,能够推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妇女活动的成长。会议的筹备有政府内外的许多中国妇女的努力,这也是一个提高觉悟的过程。对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听说到NGO(非政府组织)。对那些参加筹备的妇女,特别是那些有机会参加国际筹备会议的,看见NGO如何运作,提出什么问题,都是颇有启发和难得的经历。受到全球女权主义的激励,很多妇女很快开始传播NGO以及许多新概念,如“妇女赋权给妇女”的概念和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由全世界的妇女提出的其

他主要议题等。通过把全球的女权主义活动介绍给中国大众,一些妇女学者和妇联干部改变了以前对女权主义的看法。新的口号变成了与国际妇女运动“接轨”。“女权主义”这个词不仅经常出现在官方的杂志和报纸上,而且还开始具有正面的含义。

NGO 论坛顺利地结束了,中国的与会者让国家看到妇女不是一支反对的力量。所有为这次会议做各种不同工作的人都为中国赢得了荣誉。中国的组委会也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会,为每一个出席 NGO 论坛的人(全国共有 5000 人)颁发了荣誉证书来表彰她们对国家的巨大贡献。

在全世界的政府官员庄严地签署《行动纲领》以后,全国妇联迅速利用中国政府的承诺,马上召开全国性的活动,贯彻《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这两个表达了“全世界妇女心声”的文件。尽管这个宣传活动的影响主要限于妇联系统,但是它也为在这两个文件指导下开展中国妇女活动创造了合法性。换句话说,从现在起,这两个文件成为衡量中国妇女活动的尺度,把全球女权主义加入中国妇女解放话语的转变成为政府批准的行动。

社会性别意识的传播

在世妇会之后的适宜气候里,中国的妇女学者和活动家带着日益鲜明的女权主义社会性别观点来讨论妇女问题。全国妇联的报纸——《中国妇女报》和妇女研究所的杂志——《妇女研究论丛》,在传播世界妇女大会的精神中成为传递女权主义社会性别意识的主要媒体。

为了“让每个人分享大会留下的财富”，《中国妇女报》的主编王秀琳，1995年10月邀请一些NGO论坛的参加者开了一个讨论会，讨论的主题是社会性别概念。报纸在“通过妇女的眼睛看世界”这个标题下，将每一个参与者的看法做了摘要刊登。一位女学者简明地表达了这个讨论会的主要观点：“这次妇女大会给人们最大的启发是我们应该用性别观点看事物。”一位女作家描述她怎样在提高性别意识后能够看出媒体中明显的性别歧视，她强调“提高了性别意识，你就会注意到以前你从不关注的那些事情”。许多妇女强调中国接受社会性别观点的紧迫性，她们呼吁中国的报纸要“发扬世妇会的成就来影响社会和决策者，使他们考虑社会性别问题。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笔、我们的口和我们的思想来传播社会性别意识”。^①

1996年，关于社会性别的公开讨论继续进行，妇联的高层领导也参加了。1996年6月20日，《中国妇女报》在头版发表了以“提高性别意识，唤醒妇女自我意识”为题的文章。文章报道了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启藻出席全国妇联执委和各省市妇联主席会议上的讲话，报告指出世妇会通过的两个文件提出了社会性别概念，说“现在性别概念已经是国际流行的。它成为进步、公正和明智的体现”。这篇文章报道了黄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理解：“为了把性别纳入决策，我们必须在政策、法律、计划和项目制定以前就做性别分析。我们必须研究它们对妇女和男性分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一项政策只对男性而不对妇女有利，那么它就是不公正的和不合理的。我们还必须评估我们的政策和纲要的实际执行。如果妇女不能从中直接获益或者男性的利益超

过妇女,这说明政策、计划和项目是有偏倚的。”

黄启藻强调要使社会性别概念进入主流社会,各级领导就必须先了解,要帮助决策者掌握它。在阐明促进妇女发展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之后,黄启藻还特别号召中国妇女自觉参加致力于实现平等、发展和和平的事业。总之,这个讲话反映出世妇会和 NGO 论坛对妇联系统的强烈影响,提高妇女社会性别意识和提倡妇女自觉参与妇女自己的事业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还纳入妇联的议程。在高层领导的号召下,《中国妇女报》开始了一系列的关于如何提高社会性别意识的讨论。不同领域的妇女学者和政府官员一起被邀请参加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是政策问题,暴露出这些女性参与者想影响决策过程和使社会性别成为主流概念的急迫性。

这样公开的讨论证明世妇会已经推动女权主义进入中国官方媒体的前沿,也标志着一场与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气质的讨论全然不同的公众讨论出现了。80 年代的知识妇女力图通过求助于女性气质来把妇女从凌驾一切的阶级范畴中分离出来;但在 90 年代,她们转向用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来分析妇女问题。知识妇女关注的新焦点预示了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然而,中国妇女研究者要彻底摆脱女性味话语的影响尚需要大量的思想质疑活动。提倡社会性别概念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同时也是概念混淆的标志是,“gender”这个词在中国的妇女研究学者中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对应词。在前面引到的讨论中,两个汉语词汇交替地被用来指社会性别意识——“性别意识”和

“女性意识”。这两个词语的模糊含义以及人们不加区分的使用,说明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两个词同“gender”(社会性别)这个词在概念上的差别。由于“女性意识”同女性味话语的联系,用“女性意识”来指“社会性别意识”意味着要把一个西方女权主义的概念套到一个中国话语上却没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不兼容性。现在是中国女学者们从理论上和语言上把“社会性别”从“女性气质”分离出来的时候。这个分离将会构成对女性味话语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妇女的批判女性味话语的声音开始出现。在1995年发表的《15年来,我们走到了哪里》一文中,文学评论家陈慧芬挑战了许多关于女人的流行观点,并且指出“新的女性气质的神话”为妇女制造了新的两难困境。她要求读者注意社会制造女人的过程,并且强调看清“社会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规范女人和制造女人”是重要的。陈慧芬警告说:“在女人的自然和不受限制的‘个性’后面,有强制性的角色成分。那是男性社会的文化密码和商业文化的密码,在有形无形地引导和塑造妇女。”陈慧芬认为妇女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觉醒的定义“不是认同和跟随新的神话,而是质疑所有流行的观点,对社会现实做深入分析和理解”。^②

结 论

中国的妇女研究已经走过十多年的历程。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妇女发起的全国范围内的运动,所以这一运动本身也是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它既着眼于理论,又

关注社会实践。遍布全国的妇女研究机构和学会持续不断地举办关于妇女的会议,包括妇联干部和妇女学者在内的妇女研究者经常聚首讨论当前的妇女状况、问题和对策。通过她们的活动,妇女们表现了她们对开拓社会空间的关注和参与决策的意图,至少是对与妇女生活直接相关的那一部分决策。

与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相对照,中国当代的妇女运动是以妇女研究为发端的。它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反思运动;吸收了很多“文革”以后中国政治思想话语中的语言和意识形态。尽管这场运动成功地树起了一个与社会性别相关的引人注目的社会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从属于阶级的范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它是通过调动起本质化的女人概念来实现的。尽管它曾借助“女性味”话语来挣脱集权经济统制的控制、表达中国妇女的反感;然而,到了 90 年代,当市场经济剧烈地改变了妇女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时,“女性味”话语已经失去了它作为对抗力量的政治冲击力,而被日益强大的商业化力量所吸收利用。大众传媒推崇的现代“女人味”,把传统女性美德和消费主义混合起来,成为一种规范妇女行为、约束妇女选择的主导准则。在这种背景下,日益增多的妇女研究者转向西方女权主义寻找与之对抗的资源与力量。

在 20 世纪初,中国男性知识分子找到了西方自由女权主义并以之为武器,发起向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的进攻,用“女人也是人”这一核心概念,发起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到了 20 世纪末,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从西方女权主义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概念框架——社会性别。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转向

西方寻找知识灵感来武装自己,从而去抵抗中国的统治话语,这已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可以想见,她们会继续这样做。事实上,在第四届世妇会之后,许多从事妇女研究的女性都强烈地表达了对西方女权主义与全球妇女运动接轨的热望。她们与国外女权主义者的交流使她们懂得,中国妇女不会在学习别人的时候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相反,她们将在寻求社会性别公正中获得政治和知识上的赋权。这一被官方支持的、与全球女权主义接轨的新的开放气象,预示了在女权主义社会性别意识推动下的中国妇女运动将在 20 世纪末继续成长。

注释:

- ① 本文英文标题为“*Research on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原载 *Guide to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Gail Hershatter, Emily Honig, Susan Mann, and Lisa Rofel 主编,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C Berkeley, 1998。由于篇幅的关系,收入本辑有删节。因为是译文,引文的翻译可能与中文原著有差异。
- ② 李小江、谭深主编:《妇女研究在中国》,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 ③ 奚杏芳:“我国妇女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现状”,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会议论文,1989年10月。
- ④ 邓伟志:“推动和发展妇女学”,《为妇女学呐喊》,澳门出版社,1995,第2页。
- ⑤ 关于当时的讨论,参见丁娟:“我国妇女学科体系研究状况”,《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第192~201页;孙晓梅:“中国妇女学研究综述”,《妇女工作》,1991,第6期。
- ⑥ 参见刘今秀:“民间妇女学术团体一揽”,《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

第 580~584 页。

- ⑦ 李小江:《女人的出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第 37 页。
- ⑧ 山西省妇联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概论》,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第 272 页。
- ⑨ 美国学者韩启澜和贺萧所作《个人的声音:80 年代的中国妇女》对女性话语的表现有大量的记录和讨论。该书的中译本题为《美国女学者眼里的中国女性》,陈山、延宁、侯玉梅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 4 月。
- ⑩ 李小江:《女人的出路》,第 70 页,140 页。
- ⑪ 《中国妇女报》,1995 年 10 月 30 日,第 4 版。
- ⑫ 陈慧芬:“15 年,走到了哪里?”《上海文化》,1995,第二期,第 33~35 页。

(本文由蔡凌平等翻译,作者本人校对整理)

浅议社会性别学在 中国的发展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以后,我国政府签署的《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两个联合国文件的精神在我国传播,“把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成为各级妇女组织和妇女研究者的努力目标和熟悉话题。社会性别(gender)作为一种分析范畴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妇女研究者所掌握,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也在一些地区开展,对推动社会性别进入各阶层决策者和领导者的视野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同社会性别理论和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发展相比,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明显差距。在国际社会,社会性别理论是由学界在妇女运动的实践呼唤下发展起来的,它一出现,便同时在学术界和妇女运动两个领域中产生深远影响,又同时在和各种学术思潮的交融以及妇女运动的多样化实践中获取营养和生命力,不断丰富深化、推陈出新。在世界各国,包括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学术界,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学者们是推动社会性别理论在本土发展的主体,高等教育领域也是传播社会性别理

论的主要场所。高校中的妇女学系和中心是用社会性别范畴创造新知识和教育年轻一代的基地,还有各种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以及社会性别学术刊物专门投入新的知识的创造和将社会性别纳入学术和教育主流的有效工作。以美国为例,目前在高校内外有 250 多个研究所,有 700 多所高等院校有妇女学系和中心,每年向学生开设 3 万门同社会性别相关的课程,全美有 12% 以上的高校学生获得妇女学课程的学分,有 6 所高校授予妇女学博士学位,培养跨学科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专家。许多学校授予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和其他领域的联合博士学位。到 1995 年,在各个学科中以写妇女和社会性别专题论文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达 10,278 人。(Boxer, 2001)在亚洲,韩国也已经有了 18 年的妇女学课程设置历史,并早有了硕士和博士点,培养了大批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专家,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在妇女组织做领导,有的在传媒界供职,从各个方面努力创建新型的社会性别话语和社会性别关系。总之,在国际妇女运动把社会性别概念纳入联合国文件之前,社会性别已经进入了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和教育体制。社会性别也早已成为国际人文社科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范畴,经常同阶级、种族、族裔、性倾向等分析人类社会等级制的范畴并列使用。(王政,杜芳琴,1998)

国际学术界中的常识性概念——社会性别——对我国大多数人文社科学者来说却十分陌生。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妇女学”一词就传入我国,80 年代中期妇联的理论工作者和学界关注妇女研究的学者都呼唤建立妇女学,80 年代末我国高校中出现了妇女研究中心,但是,时至今日能够开设妇女与社会性

别学跨学科课程的高校寥寥无几。^①热热闹闹的妇女研究并没有在高等院校打开社会性别学的教学天地。从总体上说,社会性别学尚没有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教育界中建立起来。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过程中,中国学术界引进了多种当代西方学术思想,创建了许多新兴学科,但是为什么“社会性别”这个当代西方重要的学术领域却一直没能被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所关注呢?本文将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分析,并探讨在中国发展社会性别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阴差阳错”的历史背景

当代的社会性别理论诞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西方的女权运动中。投身于女权运动的学者们在社会上向男女不平等的现实挑战的同时,对在男权文化中产生的西方知识体系开始质疑。她们审视的眼光不仅看到了妇女在知识体系中的缺失和受贬抑,还看到了知识生产中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看到了社会性别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是以往学界研究所忽略的,看到了由这种忽略导致的人们作为常识接受的许多理论的偏颇和谬误,看到了这些偏颇和谬误在巩固妇女从属和边缘地位中的巨大作用。作为思想和文化运动的实践,女权主义学者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开始了认真细致的清理,把社会性别的棱镜引进历史、文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一系列学术领域,对西方各个人文社科领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伯克利大学教授卡罗·克利斯特指出:“(今天)任何评论者要对一篇文章提出全面的评论,都必须考虑到社会性别;同样,社会科

学研究也必须思考社会性别怎样形成和影响了研究者所使用的数据材料。”(Christ, 1999)总之,女权主义学者对西方知识体系挑战的一个显著成果是在学术界建构起了社会性别理论和分析方法,创立了跨学科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教学机构,向各个学科领域积极有效地渗透,从而改变了众多学科领域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阐释。(Boxer, 1998, 2000)

过去 30 年间西方女权主义学术成就辉煌之所以可能,除了大批女学者投入这个首要条件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是整个西方学术界反思西方知识体系的大气候。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就是这种反思反省的学术表现。这些学术表现不仅体现了西方知识界独立思考的传统,也反映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左派在学术界的政治影响。在对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分析中,上述主要学术流派的关注点是在如何反对霸权。在这一点上,女权主义学者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批判同西方学术思潮主流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受左派影响的西方学者所无法推卸的道德责任。

同西方学界的主要政治倾向相反,过去二十多年我国学界是以反“左”为主要任务的。尽管我们所说的“左”同西方学界认同的“左”的内涵大相径庭,但是在我国学界反“左”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对某些表达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原则的不屑与摒弃,比如,男女平等。否定男女平等的思潮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就出现了,当时它夹杂在对“文革”时期“男女都一样”的政策批判中。学术界和文化界对批判“男女都一样”

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生产了许多影响广泛的文本,它们所表现的形象和比喻很快进入当代社会性别话语,成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至今都对当时文化界对“铁姑娘”的嘲弄和否定记忆犹新,在80年代的批判话语中,“铁姑娘”是中国女性人性被扭曲和男性化的象征。^②批判锋芒所向,不仅是男女都一样的装束、工作、工资,还包括男女平等的政治理念。(张晓崧,1988;潘锦棠,1988)

80年代中国知识界解构六七十年代社会性别话语的热潮是由男女知识分子一起参与形成的。当时许多论点是由男女知识分子的写作造成了广泛影响的,比如“中国妇女解放超前论”和“恩赐论”(李小江,1986)。也有一些女性像男性一样赞美“东方女性传统美德”,呼吁女人要回归“女性”。但是深入分析那些有影响的著述,还是可以看到男女知识分子的出发点和角度有所不同。对城市知识女性来说,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其经典的表达是“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令她们感到不堪重负。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在背负传统女性家庭角色的同时被要求在社会上承担同男性一样的责任,还因为在以男性为准则的国家界定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妇女无法表达自身的多样需求和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使她们获得了表达和界定自己利益需求的可能,8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批评是她们开拓社会空间的一种方式 and 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妇女问题从“阶级”的遮蔽下突显出来。虽然中国知识女性当时还不了解“社会性别”这个概念,这使得她们的批评往往缺乏对男性中心文化主流话语的警觉和剖析力度,但是社会性别问题却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公众的

视野,并成为合法的公共讨论话题。^③

男性知识分子的批评则表现出他们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种政策带来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感到不安和反感。从“五四”以来,男女平等在中国主要被理解为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平等权利,这个理解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能占主导地位也是因为它同政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发妇女人力资源的需求相一致。在公有制经济中,男女平等政策使得大批城市妇女获得教育权和就业权,并对就业领域中的社会性别界限有所突破,城市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妇女的广泛社会参与必然导致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教育和职业使得大批城市妇女有可能选择不依附男性的人生道路,对许多女青年来说,婚姻也只意味着两个平等的人的结合,而不是“从夫”的人生安排。换言之,虽然两性间的私密关系不是各项政策的关注点,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家政策的影响,产生了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

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不仅是因为经济独立的妇女在婚姻中有更多的自主权,还因为它重新界定了“男性”和“女性”的内涵。继承了20世纪初中国女权主义对新女性的界定(最早的系统界定可见金天翻发表于1903年的《女界钟》),六七十年代主流政治话语中的“女青年”完全摒弃了儒家的“三从四德”性别规范。作为一个主体位置,她不依附于家长和丈夫,也不是由家庭角色和性功能来界定的,而是和“男青年”一样由社会角色来界定。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在社会领域的出色表现是构成优秀男女青年的基本条件,“女青年”这个主体位置所包含的对传统性别规

范的挑战是意味深长的。当然,具体的妇女的主体身份并不总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话语构成,而往往是由多种话语构成,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对具体的女青年仍会有影响,但是毕竟广大青年妇女有了不守传统妇道的合法性。如果说传统妇道维系了男性的特权,那么由国家提倡的女青年的“不守妇道”则直接地冲击了这种特权。

公有制计划经济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改变社会性别关系的作用。国家的巨大权力剥夺了家庭内男性家长在历史上享有的权力,他甚至对财产都没有支配权,更无法决定儿女的职业、教育、住房甚至婚姻等人生大事。而他的具有独立职业和经济能力的妻子则比传统社会中的女子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社会性别中权力关系的这一微妙变化是许多男性都能深切感受的,知识分子整体在国家政治上的边缘化与知识男性对权力中心的向往之间的矛盾更使许多知识男性体验到一种无能为力的处境和心境。许多知识男性把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无能之感归咎于男女平等政策,指责妇女广泛就业导致了把男子赶进厨房使他们成了“小男人”,使中国社会失去了“男子汉”。剧作家沙叶新为电视剧《海派丈夫面面观》写的主题歌“男子汉哪里有”这样发泄着男性的怨气:“小李拎菜篮,老王买煤球,妻子吼一吼,丈夫抖三抖!都说男人是顶天柱,谁知男人的酸苦最多,白天干活晚上奔波,心里苦恼嘴上还唱歌。小王拿牛奶,老赵买酱油,工资奖金全上缴,残羹剩饭归己属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民族若无阳刚气,民族怎能去奋斗。国家若无阳刚气,国家怎能震全球。男人若无阳刚气,男人怎能去追求!丈夫若无阳刚气,

我的妻儿你说是可喜还是可忧?”(王霞,1991)^④尽管许多调查证明即使在双职工家庭中,还是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多于男性,但是这不能改变许多知识男性的主观感受。与昔日同一阶层的士大夫所享受的性别特权相比,当代知识男性确实失落不少。有意思的是剧作者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来掩盖对自己的性别特权被削减的不满,似乎中国的强盛有赖于恢复男性特权和巩固社会性别等级。这样的言论并非个别,“阴盛阳衰”的感慨充斥公众话语,从80年代持续到90年代。社会学家郑也夫发表于1994年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最真实坦率地表露了当代许多男性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百年来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中的变化的无所适从和失落感。他在文中引用美国学者的话表达自己的感受:“婚姻的解体不是因为规章决定,而是因为福利水平破坏了父亲在家庭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和所处的权威地位。他在自己家里不再感到有男子气概……再没有比日益认识到他的妻子和儿女如果没有他能生活得更好更加伤害这些男性的价值了。”(郑也夫,1994)显然,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还没有深刻到改变男性对男子气概的界定,男子在男权社会中的特权和地位依然被理直气壮地认定应该是男子气的内涵。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中,对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挑战也就被不少男性看做是对自己作为男人存在的挑战。^⑤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80年代知识界对“铁姑娘”的抨击就更好理解了。由国家传媒宣传张扬的“铁姑娘”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对传统社会性别话语中“弱女子”的直接否定,也是对已经感到被阉割的男性的直接威胁。就在计划经济、男女平等

话语、“铁姑娘”们有意无意地颠覆着几千年的社会性别秩序时，许多男性知识分子踊跃地加入了对六七十年代社会性别话语的批判，并以此开始了对社会性别的重新界定和重新规范。这个重新规范的过程恰好与市场经济的起步同步进行。面对劳动力过剩，男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纷纷向政府献计献策，让妇女回家的呼声从 80 年代初期至今不绝于耳。这个呼声决不能仅仅被理解为解决就业问题的经济手段和权宜之计，它是当代中国知识男性重建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的重要运作。近 20 年来在妇女就业问题上的持续论战是当代中国不同社会性别话语较量的重要场所。^⑥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性别理论难以进入中国知识界了。虽然有少数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权主义学术思想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还有一些男性知识分子坚持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念，^⑦但是许多有话语权的男性知识精英所选择的社会立场决定了他们会排斥一种批判和解构社会性别等级制的理论。与中国 20 世纪初倡导推翻男尊女卑等级制的女权主义知识男性相比(Wang, 1999)，我们看到百年现代化的历程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把中国知识男性都现代化了，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主流在社会性别问题上向前现代的倒退。

从社会性别学术领域在国际学术界发展的历史来看，女性学者始终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和先锋力量。我们分析中国学术界男性的状况并非意味着感慨男性学者没有做学术带头人，而是指出中国女性学者在这个领域的开拓将会遭遇意料之中的阻力。事实上，十多年的妇女研究没有能在学术界教育界做出重

大突破本身已经说明了在中国进行这项事业的艰难。最大的难点不仅在于女性学者缺少学科建设的物质资源,更在于身处缺乏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的学术界要异军突起,是对女性学者自身的学术和精神力量的重大挑战。21世纪中国社会性别学创建的历程将是对男女学者共同的考验。

(二)引进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

社会性别理论作为剖析社会性别等级制、揭示社会性别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锐利工具已经在许多地区的知识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个产生于西方的理论对中国适用吗?对于这个疑问的解答并不复杂:社会性别的基本概念对一切仍保存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文化都具有批判意义;鉴于社会性别等级制的表现和社会性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因文化和历史的不同而有差异,任何地区的学者都必须在对本土的历史文化社会的具体研究中创造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分析批判。引进西方理论是为了建立对中国现实有意义的学术,而不是为了搬弄一些时髦的词句来提高个人的权威。从引进到创建这中间有一个艰辛的知识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只能由中国学者自己来完成。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实利可图,相反作为一种来自边缘的批判力量,开拓者们会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只有那些真正被激动人心的学术思想所吸引的学者,那些渴求在学术上有所创新的学者,那些对实现社会公正具有责任感的学者才可能坚持下去。可以预料,女性学者将是创建社会性别学的主要力量。这不是由女性的“本质”所决定,而是因为今日中国女性面临市场经济和知识界主流

携手建构和巩固社会性别等级制的严峻局面。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当代中国社会性别话语的生产情况。伴随着批判“男女都一样”的政策而出现的对“男女不一样”的强调演变发展成了强大的“女性味”话语。^④在这个把女性界定为由其性功能决定的本质化的女人的社会性别话语中,大量的传统社会性别符号被调动起来,女人被描述为“弱女子”、“小女人”,温良恭顺忍让牺牲的贤妻良母是有女性味的好女人,等等,等等。在上海的一个电视谈话节目中,一个男性作家大言不惭地说:“在我眼中最有魅力的女人是在我说话时一言不发仰慕地看着我的女人。”女人要自觉地把男人奉为权威和偶像顶礼膜拜才能在男人眼里具有女人味,而独立自主地发挥自己才干的女性则被打入“女强人”的另册遭到嘲弄和贬抑。这类公开提倡给妇女二等公民从属地位的男性中心言论充斥大小报刊和电视节目。与此同时,商品广告也竭力把女人作为卖点,不仅把女性作为商品的附属物来推销,还广泛地推销了带着“现代化”标签的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的社会性别观。一个有“女性味”的“现代女性”是年轻美貌,穿着时髦,富有性感,开着洗衣机,用着微波炉,善于消费,在消费各种现代化商品中实现女性的家庭角色,获得充满“女性味”的“满足”。所有这些表现着男性欲望和商业利益的关于女人的文字、语言和形象表述强有力地建立起对“女性”内涵的重新界定和对女人的行为的明确规范。(Wang, 1998)

80年代以来的大量文学作品也是制造当代社会性别话语的重要场所。正如文学批评家刘慧英所尖锐指出的:“随着种种禁欲主义的‘解冻’,许多传统的男权中心视角和观念得以蔓延

泛滥,尤其是女性形象商业化——女性作为男权中心社会中的欲望对象,被不断地强化着。许多文学作品和形象借着反禁欲主义这面旗帜,重新回到男权传统的泥沼里,或者是回到商业社会中卖‘女’为生的境地之中。”(刘慧英,2000)在众多的畅销书中,男作家恣意描绘着自己的纵欲想像,而他们笔下的女性人物则成了性发泄对象和用来证明男性性能力的性工具。女性的“性”——作为被男性把玩由男性定义描述的“女性本质”——得到空前的突现。而女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主体性——20世纪初的中国男女知识分子所高声呼唤的——却在当代男性的写作中遭到践踏。这类作品所表现的不仅是对女性形象的肆意歪曲,还表达了当代知识男性对所谓“男子气”的渴望。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废都》,我们看到的是男性对女性征服欲望的扩张和加剧,政治上失意的知识男性似乎要以对女人的征服来证明自己作为男人的存在,征服女性成了“男子气”的组成部分。旅美学者钟雪萍在分析80年代中国男性写作的《男子气被围困了吗?》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当代男性写作中的许多性描写“很少探索性的关系,而几乎全都是关于男性的痛苦、恐惧和无常之感,这一切又都夹杂着厌女倾向和重获性能力的焦虑”。她强调对当代知识男性的这种性焦虑必须放在具体的政治历史背景中来理解。(Zhong,2000)

今日中国社会性别话语的制造自然离不开西方背景。对中国女人的要求明显地表现了中国男性“洋化了”的欲望。在坚持有“女性味”的女人应该保持“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同时,男性对女人身体的要求却不再传统。“三寸金莲”早已是令人不堪回

首的历史,今天的“现代”女性美是“三围”达标,身材高挑瘦削,双眼皮高鼻梁。于是丢掉了裹脚布不久的中国女性纷纷做起美容手术。不仅是女性美要以西方为标准,男性更是在各方面要以西方人为楷模。中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弱势使得中国男性,尤其是伴随“现代化”话语而产生的知识男性在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掺杂着深深的性自卑和性焦虑。市场上铺天盖地的壮阳药并非说明今天的中国男性性无能情况比以往严重,而是反映了开放以来面对西方世界和西方男性神话,中国男性渴望和他们一样强壮。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欲望和加强性功能的欲望经常缠绕在一起,难分难解。“重振雄风”欲望的再表现在文学作品和商品广告中比比皆是。关于现代“男子汉”的语言、文字、形象同女性味话语一样在有力地建构着“男性”内涵的定义并起着规范男性行为的作用。与女性味话语不同的是,“男子汉”话语没有着力提倡“东方男性的传统美德”(如孝忠悌),而是以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过程中建构的主流男子气为楷模(如竞争性和进攻性)。简而言之,在这类社会性别规范中,女人要弱(尤其在男人面前)才显得有“女性味”(这个“弱”的内涵是从属性、依附性),男人要强(尤其在女人面前)才算是男子汉(这个“强”的内涵是权威性、支配性再加性能力),男人的强要靠女人的弱来反衬。这种社会性别规范既对女性的发展造成束缚,又对男性的身心带来过分的压力,往往男性装强比女性装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女性味”、“男子汉”话语的制造过程和对男女的实际影响是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的课题,笔者在此仅仅是提出一个初步

的描述来说明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在无意识中受到社会性别话语的塑造和规范,包括那些有话语权的社会性别话语制造者。今日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话语对男女都产生负面影响,这种社会现象需要社会性别理论来分析、批判和解构。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男女都受到“女性味”和“男子汉”话语的影响,这个话语中的权力关系始终将女性置于被动、从属、物化和他者的地位上,因此它对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的负面影响会更严重。我们今天在展望中国 21 世纪的发展时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个“人”自然应该包括妇女。任何阻碍妇女发展的因素都应该成为学者和教育者关注的对象,我们的社会性别学也只有以对妇女发展的深切关注为基点才可能具有对现实的批判力量和理论指导作用。

束缚妇女发展的机制是多样的,并因地域、阶级、民族、年龄等差异而产生不同结果。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城乡等级差别使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有很不同的社会性别经历,就如“男女平等”主流话语对农村妇女的影响远不如对城市妇女的影响一样,今天在城市由大众传媒商品经济推动的“女性味”话语也并未能散播到乡村边缘地带。在农村有另一套社会性别机制规范着男女的行为,影响着男女的人生经历。国内外许多做农村发展项目的研究人员都注意到社会性别等级制与贫困的关系,女性普遍地是社会和物质资源贫乏的群体。(马元曦等,2000;徐午等,2000)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经济水平、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差异很大,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机制是如何同各种因素交叉作用来实现把妇女置于底层的?我们可以从哪些体制改革着

手来改变社会性别等级制的各种机制,来拓宽农村妇女的发展途径?此外,今日中国的贫困妇女已经不局限在农村地区,下岗失业的城市妇女正经历着社会和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的困境。社会性别等级制在经济改革中是通过哪些机制来起作用的?除了“女性味”话语在为剥夺妇女平等的发展机会制造合法性之外,还有哪些社会过程在制造对妇女发展的障碍?当代中国社会中社会性别和阶级这两种等级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如何作用于不同的妇女群众的?“男女平等”的话语(包括政府的有关政策)在改革开放时期发生了什么变化?当代妇女可以怎样调动“男女平等”话语的社会政治资源来推进妇女的社会进步?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来巩固和发展“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话语?这类有关中国大多数妇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亟需社会性别学学者的深入研究。

在过去十多年的妇女研究发展过程中,我国学者表现出的长处是密切关注妇女的现实问题,大部分研究经费(来自国际组织或是政府部门)也是投在解决妇女现实问题的课题上。但是因为缺乏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不少研究缺乏对深层社会文化体制结构的剖析力度。在笔者同许多妇女研究学者的交流中,深切地感受到广大妇女研究者对理论和方法的强烈需求。这种状况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们还未能把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起来,这种状况的存在也正呼唤着社会性别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国际学术界已经在这个领域中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虽然绝大部分不是分析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但是了解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必然会打开我们的思路,促进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了解

国际学术发展是我们建立中国社会性别学学科的必要步骤。中国学者了解国际学术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是语言(这也是这门学科发展缓慢的一个因素),为此我们需要有大批具有翻译学术著作能力的学者投入到翻译介绍社会性别学的工作中。

社会性别学的建立不仅是为了妇女研究者能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妇女问题和社会性别制度,它作为一个新的知识领域,是在挑战、质疑、批判、解构传统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不能游离于学术界,而是要把各门学术作为自己的基本领地,一寸一寸地清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性别学学者不能仅仅是在社会上参与促进妇女发展的项目,还必须在学术领域中以自己的学术著作来颠覆和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来创造从新的观察角度和社会立场出发的新知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来是由男女共同参与的,但是作为对人类发展历史的认识在以往主要是由男性来表述的,或者说被记录下来的人类认识主要是男性的声音和男性的经历。社会性别理论启发我们去想像和开创一个包括女性的认知世界。我们不仅需要探究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经历和感受,还需要考察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中不同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制度的建构和演变以及它们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不仅要从事社会性别角度去考察社会历史,还要从社会性别角度去审视我们所继承的人类知识。在国际学术界,赋社会性别予人类知识体系的结果是产生了新的认知结构。今天我们中国学术界对这一新认知结构和新知识内容尚缺乏了解,离开创自己的新知识尚有一段距离。在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中,恐怕实现对人类社会认知结构的“现代

化”是学界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同任何学科的建立一样,社会性别学的学科建设也必须以高等教育为体制基础。高校中要有社会性别学的课程,使得对社会性别研究有兴趣的学生能获得必须的基本知识和研究训练,为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培养青年学者是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的关键,但是在今日中国高校中严重缺乏能够开设社会性别学的师资,师资培训因此成为学科建设的关键。令人欣喜的是,参与“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组的学者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从1999年以来,她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多次举办读书研讨班,对高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然这个培训也完全可以自我培训创造的过程。美国妇女学开创初期就是在高等院校里一些女教授和女学生共同就感兴趣的学术话题进行阅读讨论写作,然后逐步在各个专业领域里发展起一门门课程,最后形成了跨学科的妇女学专业。我国高等院校中已经有几十个妇女研究中心,每个中心都有不少对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如果这些中心的目标不仅是从事一些妇女研究课题,还争取课程设置,使妇女和社会性别学进入知识和教育体系,那么我们的学科建设进程可能会加快一些。

应该看到,在高校中设置社会性别学课程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学术建构,其本身对改变教育内容有重大意义。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至今还很少包括国际上从社会性别角度创造的新知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妇女研究成果也极少能进入课堂。21世纪的中国高校学生应该具有国际学界开创的新知识结构,

也应该对占人口一半的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有所了解。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新知识能够给予学生的不仅是对人类社会和自身状况更深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起学生批判的精神和独立分析的能力。在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新的文化霸权垄断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时,培养有批判分析能力和独立意识的人应该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此外,社会性别学课程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社会性别觉悟。改造社会性别等级制是长期的事业,高等教育有责任培养出具有社会性别觉悟的人才在社会各个领域有意识地从事社会变革。社会性别学的课程设置不仅可以面向高校学生也可以面向妇联干部和从事各种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研究项目的人员。未来高校的社会性别学应该成为实际问题研究人员的培训基地。

最后要对这门学科的名称做个说明。在国外,从事社会性别学教学的机构大多数称为妇女学,有一些称为社会性别学,而有一些研究机构则两者兼顾,称为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最后这个长的名称是为了声明:对人类社会研究引进社会性别视角不意味着一种中立的立场,鉴于目前在大部分文化中妇女依然处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边缘,社会性别学应该坚持对妇女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笔者完全赞同这个立场。为了追求文字简洁,为了突出“社会性别”这个新概念,本文中用了社会性别学。谨希望读者理解:社会性别学是以挑战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为核心,以高等教育领域为重要基地,以改造社会性别等级制和一切等级制并开创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为目标的一门社会立场鲜明、实践性强的学术,它欢迎男女学者的平等参与,

并追求在开创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过程中在学术界以及社会中建立起新型的社会性别关系。

注释：

- ① 笔者能查到的对妇女学最早的译介是：“争取女权运动的历史和妇女学”，作者白井厚（日本），译者何培忠，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我国研究者在这一时期的呼吁文章有：上海妇联干部李敏的“谈谈妇女学”，载《社会》，1984年第3期；社会学家邓伟志的“完善和发展妇女学问题”，《妇女指南》，1985年4月2日；“迎接妇女学的黄金时代”，《中国妇女报》，1986年1月27日；内蒙古妇联干部奚杏芳的“建议开展‘妇女学’研究”，《中国妇女》，1985年12月3日。这些呼吁文章中对西方妇女学的了解基本上建立在1982年那篇译文的内容上，都谈到妇女学是多学科的新兴学科，但是没有提到“社会性别”是妇女学的核心概念，也没有指出在国外妇女学是在高校中具有专门的教学机构和课程设置的学科。1987年河南《妇女生活》杂志社和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妇女学学科建设座谈会”，这是国内学者创建妇女学的首次集体行动，并随后出版了由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但是在这一时期国内对国外妇女学的核心概念、分析范畴、内容及各种理论方法都缺乏了解。见陶铁柱、谭深，1987。
- ② 在1986年北京的一次妇女问题讨论会上，一些关注妇女问题的男性学者依然在表达对“铁女人”和“假小子”这类形象的强烈反感，认为这是“女性的变异”。见孟晓云，1986。由于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许多学者把“男性”“女性”自然化，刻板模式化。
- ③ 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1988）和《女人的出路》（1989）较集中地表达了80年代知识女性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 ④ 但同一时期也有些知识男性对恢复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潮流做出自我感觉良好的阐释。如潘绥铭说：“1980年以来社会之所以提倡贤妻良母、和睦家庭，就是中国男性在最近三十年，尤其是‘文革’中的社会打击下，顽强地维护了家庭，保护了女性之后，对女性要求报偿。”（1987）
- ⑤ 《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1995年第1期、第3期刊登的“性别角色与社会发展笔谈”清晰地展示了90年代女性知识分子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与一些男性知识分子的认知鸿沟。市场经济的进程以及男权文化对传统社会性别观的巩固复制使得许多女性知识分子的社会性别立场日益鲜明。
- ⑥ 在关于妇女回家问题的大辩论中，从一开始，许多女性知识分子和妇联干部就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立场出发坚决维护妇女的利益，同主张恢复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男性知识分子进行了有效的话语较量。《社会》从1984年第1期到第4期刊登的“关于‘二保一’问题的讨论”以上海妇联主任谭弗云的批判“男尊女卑”传统思想的文章为结束语，就是一例。这场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斗争最近的一个突出表现围绕着在“十五”规划中是否加入“阶段就业”一条展开，全国妇联在这一个回合中又起了关键的作用。
-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邱仁宗教授在90年代率先组织了一系列女权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邓伟志教授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提倡创立妇女学，并始终对妇女回家论持批判态度（1983）；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陆震也多次撰文批判妇女回家论（1994，1995）。这些例子（坚持社会公正理念的男性当然远不止这儿提到的几位）说明在有关男女平等问题上的认知差异并非由生理差异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立场所决定。
- ⑧ 美国研究中国妇女的学者 Emily Honig 和 Gail Hershatter 发表于1988年

的 *Person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用翔实的资料呈现了 80 年代中国传媒制造女性味话语的社会景观。此书的中文译本《美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女性》删略了中国读者熟悉的中文原始资料,但保留了作者对许多现象的分析批评。

参考文献:

艾米莉·韩尼格,盖尔·贺肖(美),1999,《美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女性》,陈山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白井厚(日),1982,“争取女权运动的历史和妇女学”,何培忠译,《国外社会科学》,第 4 期。

邓伟志,1983,“‘妇女退居家庭’论质疑”,《文汇报》,6月10日;1985年,“完善和发展妇女学问题”,《妇女指南》,4月2日;1986,“迎接妇女学的黄金时代”,《中国妇女报》,1月27日;1995,《妇女学呐喊》,澳门出版社。

金天翮,1903,《女界钟》,大同书局。

李敏,1984,“谈谈妇女学”,《社会》,第 3 期。

李小红,1986,“改革与妇女”,《婚姻与家庭》,第 11 期;1988,《夏娃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女人的出路》,辽宁人民出版社。

刘伯红,1992,“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综述”,《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中国妇女出版社。

刘慧英,2000,“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化”,《中国女性文化》,第 1 期。

陆震,1994,“妇女就业问题之我见”,《妇女研究论丛》,第 3 期;1995,“热点争鸣:妇女就业问题研究”,《妇女研究在上海》,上海市妇女学学会等编,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马元曦等,2000,《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三联书店。

孟晓云,1986,“当代中国妇女面面观”,《人民日报》海外版,1月8~10日。

潘锦棠,1988,“妇女解放的实质与标志探析”,《中国妇女报》,5月27日。

潘绥铭,1987,“中国新女性面临的选择与得失”,《中国妇女报》,1月19日。

陶铁柱、谭深,1987,“男女同步时代的理论探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王霞,1991,《海派丈夫面面观》,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政、杜芳琴,1998,《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奚杏芳,1985,“建议开展‘妇女学’研究”,《中国妇女》,12月3日。

徐午等,2000,《社会性别分析:贫困与农村发展》,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晓崧,1988,“对‘男女平等’口号质疑”,《中国妇女报》,5月16日。

郑也夫,1994,“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社会学研究》,第2期。

Boxer, Marilyn Jacoby, 1998, *Whe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 Creating Women's Studies in Americ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oxer, Marilyn Jacoby, 2000, *Unruly Knowledge: Women's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Disciplinarity*, *NWSA Journal* 12, no. 2.

Boxer, Marilyn Jacoby, in press, *Women'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lio: Histoire, Femmes, Society*.

Christ, Carol T., 1999,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Women's Studies*, in *Women: Images and Realities*, eds. by Amy Kesselman et al,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Honig, Emily and Gail Hershatter, 1988,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hyllis, Andors, 1983,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of Chinese Wome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ang Zheng, 1998, *Reserch on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Guide to*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eds. by Gail Hershatter, et al,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ang Zheng, 1999,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Zhong Xueping, 2000, *Masculinity Besieged? Issues of Modernity and Male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Duke University Press.

孔雀舞与社会性别

电视上转播着 APEC 开幕式的文艺晚会,突然出现了一只优雅的白孔雀。我放下了书,凝神地注视着舞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孔雀舞是我最喜爱的民族舞蹈节目,记得最早看到的孔雀舞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舞蹈纪录片《彩蝶纷飞》中。从那时起,仅仅是那白色或绿色的孔雀裙就能把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而眼前的孔雀舞则是前所未有的精美绝伦,演员那精湛的舞技,那对孔雀姿态出神入化的摹仿表现,真让我赞叹不已。

我从小喜爱孔雀舞,也喜欢看孔雀。小时候去动物园,总要特意穿上鲜艳一点的衣服,企盼能引起大孔雀的注意,引它伸展开它那绚丽多彩的羽毛。看惯了女演员跳的孔雀舞,我下意识地把美丽的大孔雀看做是“女的”,长时间里也没有去思考过孔雀的性别问题。直到在大学里学英语时,有一天突然读到 peacock(孔雀)在拟人化的语言中是 He(他)而不是 She(她)!吃了一惊之后,心想:不对了,那孔雀舞应该是男演员去跳的。当时没有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孔雀舞是由女演员跳的?

今年十月下旬,一家人去西双版纳,在满目翠绿的曼听公园

探访孔雀园。那天游人稀少,当我和孩子走进孔雀园时,只见成群的孔雀在枝头栖息,几只在地上觅食的雄孔雀昂着精巧美丽的头,迈着优雅的步伐朝我们走来。秋季孔雀尾巴上的羽毛已经掉了不少,像凋零的花朵,不再丰满艳丽,只有两只大的雄孔雀依然拖着长长的闪闪发光的尾巴。我想看这两只大孔雀开屏,却没有任何招数,便想先买点食料,喂喂它们,讨它们的好。可是当我刚把两盆食料放到地上,一瞬间从四面八方冲过来一大群雌孔雀,争先恐后地围着两只小盆子啄食。我再看那两只刚才还离我最近的大雄孔雀,已悄悄地往围墙边退避而去。这意想不到的一幕使我发愣,我扭头问身旁的工作人员:“这雄孔雀怎么跑了?它们怎么不过来抢啊?”工作人员以司空见惯的口吻回答:“哎,孔雀一般是公的让母的。”“噢!这雄孔雀不仅外表美,还有心灵美呢!”我戏谑地评论道。

两只美丽的雄孔雀悄悄退让的情景使我难以忘怀,联想翩翩。我觉得要解释它们的“美德”并不难:种的生存繁衍的本能使许多动物会把有限的资源让给繁殖后代的主角——雌性。作为哺乳动物(繁殖后代的过程更复杂),人类在进入文明之前恐怕也是如此吧。想像着史前的男人像美丽的雄孔雀一样大度谦和,把生存的机会默默地、不加张扬地让给女人,心中不由一阵感动,同时又感慨这史前的想像与今日的文明现实反差太大。我又质问我,为什么会为雄孔雀不来抢食物而感到意外?显然,我也深受“竞争性进攻性是男性的天性”这类所谓的科学论断的影响。

我注意到,工作人员在说“孔雀一般是公的让母的”时候,她

把重音放在“孔雀”二字上,我想,无意识中,她也在把孔雀和人类做对比。是的,同男性中心文化中的人类相比,孔雀的行为是性别倒错的。既美又贤,牺牲,忍让,那是多少报刊文章小说电视剧大肆渲染的“好女人”的典范,是理想的“贤妻良母”。那么,是孔雀的行为违反了天性还是文明社会对男女的要求违反了天性?

当然,谁也无法证明史前的男性具有或不具有雄孔雀的天性。雄孔雀的存在只是提醒我们,动物的自然性与我们在男性中心文化中的人们的性别行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在雌雄孔雀面前,我们也很难认定牺牲、谦让是女性的“天然本质”。

雄孔雀的美艳更是对我们的挑战。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观赏性和装饰性同女性相连,以容貌来决定女性的价值,把女人的价值定位在容貌上,美貌在市场经济中也就有了价格,连杂志的销售量都往往取决于封面是否用了美女图。不少人会振振有词地说:女性就是美的,欣赏女性美是人的天性。我的疑问不在女性是否美,或者我们是否可以欣赏女性的美。想到雄孔雀和其他许多美丽的雄性动物,我纳闷为什么我们不突现男性的容貌形体美?你看杂志封面,女性能上去的绝大部分是因为美貌,男性能上去的绝大部分不是因为美貌,而是因为才能成就。换言之,杂志挑选男性一般不是为了让读者欣赏他们的身体。我想,即使是几千年的文明社会不强调男性的容貌价值,使得男性在外形上蜕化了(不知是否有这种说法),咱们十多亿人口中也还是一定不乏美男子。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多年,大众传媒呼风唤雨般地引出了成群的美女登场亮相,为什么就没有去

引大批的美男子做封面做广告呢？是人们爱看丑男不爱看俊男吗？不是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么？

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盯着雄孔雀看，盯着美女看，但要让男性成为观赏对象却不那么容易。西方对社会性别的研究发现，把女性作为被观看者正是男性观看者的权力体现。“在一个男性被定义为强壮、主动、拥有注视的权力，而女性被定义为软弱、被动、被注视的社会中，让男性身体屈从于凝视的控制——这当然是指男性的观看——虽然并非不可能，但显然大有问题，因为这就表示‘女性化’，亦即屈服于男性的权力之下。”^①

我们只好埋没了成千上万个像雄孔雀一般美丽的俊男了。

我不知道孔雀舞由女演员跳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但是这个舞蹈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性别观念是毫无疑问的。雄孔雀的美是我们定义的“女性美”，“他”内在娴静、温柔、谦和，外表艳丽夺目，花枝招展。不是没有男演员能够表现这样的美，而是我们认为这样的美应该由女性来体现才合适。

雄孔雀若了解我们人类的故事，一定会很困惑：人类呀，你们怎么会和我们倒了个儿？为什么我这个男儿身就不能有你们所说的“女性美”？为什么你们要如此费劲地定义表彰“女性美”？谁在制造这类规范并且把它们自然化？这样做究竟对谁有利？

也许雄孔雀会中止费力的思考，转身对着身边走过的雌孔雀“嗖”的开了个满屏。它知道自己很美，并庆幸自己有充分表现自我的自由。

注释:

- ① 引自:《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Liesber van Zoonen 著, 张锦华、刘容玫译, 远流出版公司, 2001年, 138页。

高等教育中的妇女学 中美比较

——在“社会性别与教育”读书研讨班上的发言

王政：昨天刚从昆明赶过来，本来想拿着在杭州的讲话稿给大家讲一讲，后来新蓉说，不要重复讲，要讲新的题目。所以，我昨天晚上又想了想，觉得也有必要另外讲一个话题，因为在座的都是教育领域中的，跟杭州的对象确实很不相同，所以今天就改了个话题，“高等教育中的妇女学中美比较”。我就集中一下，比较美国，因为我对美国比较熟悉。

我想讲三个部分，但是最后一部分可能需要大家讨论。第一部分，讲词语的界定。“妇女学”这个词，可能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早就听说过了。那“妇女学”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大家在说这个词的时候，每个人脑子里对它内涵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所以我想先把这个词说明一下，要不然，我们用同一个词表示着不同的内容，那就造成混淆了，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妇女学”这个词，或者说“women's studies”，我是先听到了“women's studies”，然后再听到“妇女学”，因为我是1985年去美国的，在这之前我

没有听到过“妇女学”，当然也没有听到过“women's studies”。然后到了美国，听到了“women's studies”，而且我所学的也属于“women's studies”的一个内容。我去学美国史，为了写一本书，即《女性的崛起》，就是美国的妇女运动，所以我就选修了《美国妇女史》。后来知道《美国妇女史》也属于学校里妇女学的课程内容，这样呢，我就和 women's studies 有了一种间接的关系。但我没有专门修过 women's studies program（我们现在翻译成“妇女学中心”）设置的课程。美国很多大学都有妇女学本科专业、研究生专业，你可以拿结业证书，或者学位。现在美国就有 6 所大学可以拿妇女学博士学位，还有许多大学有联合博士学位，即妇女学专业和别的专业联合授予博士学位。在 1989 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当时叫“妇女学小组”，才 7 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这批在美国的中国女研究生，已经比较明确地看到，“妇女学”（women's studies）作为在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学科领域，在中国还没有建立，所以我们希望推进，当时我们是这样想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和国内的学者联手起来做事情，所以跟国内的妇女研究界有很多联系，做过一些事情。当然在关注中国的过程中，对于中国妇女学的发展过程也有了了解，这个词其实在中国是 1982 年就出现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的英文文章，杜老师今年找人翻译了，就印在“绿皮书”（指《赋知识以社会性别》一书）里面，我在那篇文章里对“妇女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专门对这个词做了追踪。

这个词最早出现时是作为介绍西方“women's studies”的一

个对应的翻译词。当时的介绍是很不全面的,我们在国内关注妇女学的学者往往根据我们本土的经验来想像妇女学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正是我们国内妇女研究兴起的时候,很多的女学者,高校的、社科院的,也包括妇联的女干部,都投入了妇女研究,那么突然来了“妇女学”这个词,觉得非常好,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想像激发出来了,觉得这是门学科了。当时就有很多讨论。在全国妇联第二次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就产生了关于妇女学的讨论,就是中国要不要建设妇女学的问题。上海的社会学家邓伟志,很早就提倡发展妇女学,他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他当时在情报资料研究所,他可以看到很多资料,国外学术信息很多。

妇联对妇女学也非常感兴趣,也是出于提高妇联干部的理论水平的需要。因为“文革”中断了妇联工作那么多年,现在妇联恢复起来了,要研究妇女方面的问题,要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所以也对“妇女学”这个词非常感兴趣,全国各地很快成立了许多妇女学协会,比如上海的妇女学会就是在上海妇联领导下设立的,全国各地还有很多。

这个词当时在使用中并没有统一,有的说是“妇女学”,有的说是“妇女研究”,但是大家说“妇女学”这个词的时候,其实还是指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和关注,主要侧重点在这个方面,所以我认为,那段时间大家做的主要工作是对现实层面妇女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妇女研究”应该是对这种状况描述的一个比较确切的词。这中间也有些学者在学术上做过一些探索,包括李小江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的一套书,即包括杜芳琴老师那本《中国女性观念的衍变》的那套丛书,它不只是对今天妇女问题的调查研

究,而且是在学术层面思考一些问题。但是这样的研究,即以学科为背景的在学术层面上做思考的这种研究,并没有发展继续,这方面成果不多。这与其他很多问题都有关系,比如说资金,这些女学者要在学术层面做研究,资金哪里来?我们国家过去这十多年的妇女研究能蓬蓬勃勃兴起,还是跟各种渠道资助的资金有关系,很多基金会资助你研究当代社会中出现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的妇女研究多数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多数是在学术和教育界之外展开的。

但是无论是在学术层面做努力和探讨,还是大量的现实问题的研究,对于“妇女学”和“妇女研究”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讨论。这两个词经常是互换使用的,所以后来全国妇联的妇女研究所的名字翻译成英文是“institute for women's studies”或“women studies institute”,它翻译成这个了,所以海外很多 women's studies program 一瞧,说哟,你们也有 women's studies,妇女学了,而且要搞对口访问交流,就要和全国妇联对口交流去,这就造成了误解。她们那边也有她们的想像,我们这边有我们的想像,你要到全国妇联去交流的话,你看到的就和美国高等院校的教学机构的妇女学不是一回事,大家关注的不是相同的问题,因为全国妇联的妇女研究所并不是一个教学单位,她们做的妇女研究也不是以清理学科和知识体系为目标的。所以现在 we 这个项目(福特基金会赞助的项目)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叫“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我想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说清楚。

在国际上,妇女学是非常明确的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学术领域和教学机构,这两个概念是互相缠绕在一块儿的。它既是一

个学术领域,也是一个教学机构,是一个实体,在教育体制中是一个实体,有机构,有人员,有办公室,有一套教材,有一批学生,有学位,有学分,一套东西在那里。对这个状况咱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在这方面做非常有意识的努力和推动。当然在过去十多年中,在妇女研究这么蓬勃发展的这十多年中,也有不少的高等院校的女教师在自己的学校里开了课,近期以来还出现了硕士学位点,比如北大有硕士学位,东北师大现在也刚刚争取到了,中华女子学院现在也在争取。这是近几年的情况。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间,妇女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和教育体制中的一个机构的概念对许多做妇女研究的学者来说不是很明确。在这儿我要说明的是,如果咱们用“妇女学”作为英文词“women's studies”的对应词的话,那它跟咱们所熟悉的“妇女研究”是有区别的。

第二点,我要强调的就是,“women's studies”,一开始就是立场非常鲜明的,它是 feminist scholarship (女权主义学术)。feminist 或者 feminism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译法。我是研究“五四”的,在“五四”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候,人们把它翻译成“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子主义”、“妇女主义”、“弗灭涅土姆”(大家:笑),音译,他就给你音译了,因为他觉得任何其他中文词都不能准确表达 feminism 这个英文词的含义,所以他就译成“弗灭涅土姆”。今天我们国内主要有两个译法,一个是“女性主义”,用的比较多,一个是“女权主义”。今天我就没有时间多讲为什么我们会在改革开放以后采用了“女性主义”,而没有推广“女权主义”这个词,对这个现象的分析,我在“绿皮书”里的一篇

文章里说到,今天就不多展开讲了,那也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产生的情况。

feminist scholarship 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就是女权主义的学术。对不起,我爱用“女权主义”,因为,我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特别是研究中国女权运动史的,我用惯了“女权”,因为当 feminism 引进来的时候,我们是把“女权”和“人权”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的,男性学者是这样引进的,所以当时的女权运动中有“女权运动同盟会”,有“女权运动高潮”、“伸张女权”等等一类的词,都是这样,我的历史研究使我习惯于这个词。我觉得这段历史是今天我们 21 世纪女性很获益的一个遗产,有前人包括大批妇女创立的这份遗产,我觉得我与它有一种继承关系,所以我不想改口,还是称“女权主义”。

西方的女权主义兴起,先是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参与者中有很多是女大学生和女教师,所以这场运动很快就进入高等院校,在她们所在的学校里来研究男女平等的问题。她们不光是在社会领域中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要审视学术领域和教育体制中的男女不平等,就像我们上午讨论涉及到的那些问题。这样的讨论在美国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产生的。女教师、女学生坐在一块儿来看:我们的课堂上有什么不平等,教科书中有什么不平等,反映在哪些方面?接着就是女权主义学术的发展,就是大量的探讨啊,写作啊,激发起新的学术研究啊,对以往的人类知识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西方的以白人男性为中心创立的这个知识体系,就是 60 年代西方教育界所推行的这样一种知识内容,女权主义学者开始了梳理工作,重新清理,而且是在非常清醒的、

自觉的意识层面上进行清理的。她们看到了人类知识体系,或者说西方的知识,她们所学到的这些东西,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在历史的过程中给传承下来的。而女性的声音呢,在历史中的或者现实中的女性声音,就非常少了。为什么在女权主义学术开始的时候,妇女史就特别发达?因为最早的推动者就是想发现历史上女性的声音。好多女学生说:“呀,这个社会,传媒把妇女搞成这种样子,我们没有榜样的力量,看不到一个坚强的女性,女性都是非常柔弱的、性感的,都是给男性作为工具、客体来用的。”为什么没有榜样?历史上有没有坚强的女性,有没有很有贡献、有作为的女性?打开历史书,看不见!所以,历史学家就说,那么,我们要发现妇女,要找妇女对历史的贡献和发现她的声音。历史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发生的历史,那是一个概念。另一个是写下来的历史,写下来的文字。毋庸置疑,这些关于历史的文字主要是男性来写的,由他记录,他的眼睛去看,他来表述他的观点,他写下了历史。他觉得女人,一群婆婆妈妈,无关历史重大意义的,所以他不会来记载你,由他写的历史就很少表现女性。

从历史学开始发展起来,其他的一门门学科也很快开始了对整个知识体系进行清理和质疑的工作,因为学者们看到了以往以男性为中心的、以男性的角度去观察的知识是偏颇的。这种知识并不像学术权威所声称的:是公正的、客观的、中立的。完全不是那回事,因为任何一个学者都是有一个观察角度的,他都是有他的社会位置、社会立场的,没有人是上帝,假如有上帝的话。没有人能从非常全面的角度来看,包括女权主义者,她

们从来不声称:我所看到的是绝对真理,我穷尽了人类的真理。没有一个女权主义学者是这样来认识的,她们都会坦诚地说:我是从哪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我今天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状况,我肯定我自己是会有局限性的。这个,就是女权主义学者对学术所持的不同态度。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高等院校,特别是高等院校中的女学生、女教师,首先是从对课本的不满意开始,便开始重新编写教材了。

建立妇女学过程中最早开始的学术活动就是重新编写教学和阅读材料,在各个学科领域,文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她们都开始编写教材,自己开出新课,给学生讲,以后越来越多的学术著作便不断产生了。到今天,要说一个数字的话,美国高校的妇女学中心和妇女学系加到一块儿,前年有六百多所高校,最近的统计,已经有七百多所高等院校,就是比较有点规模的大学大部分都有妇女学作为一个教学机构;全美高校妇女学教学机构(中心或系)每年总共要向学生开设三万多门课程。全美国,有12%以上的高校学生获得妇女学课程的学分,美国大学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课程中修学分,那么12%的学生都是修过妇女学课程的。有6所高校是有妇女学博士学位的,还有许多是联合授予博士学位的。到1995年的统计,在各个学科中,以妇女和社会性别为专题来获取博士学位的,就是写这方面的论文获取博士学位的,有10,278人。这个统计是1995年,也包括我吧,因为我那年完成的论文是写中国的女权运动,我没有拿妇女学的任何学位和证书什么的,但是我的论文是从社会性别角度来做的历史研究,所以包括在这里头。那么这类研究在各个领域

中有一万多项,这只是博士论文,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发展就此也可见一斑了。

我前面强调了,从一开始,妇女学的角度和立场就非常明确,这表现在“社会性别”这个词的发展上。“gender”这个词在60年代并没有产生现在这个含义,70年初才产生了这个核心概念,而且很快就作为一个学术范畴,大量的著述围绕着这个核心概念产生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女学者都在探讨:为什么我们能这样普遍地看到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呢?马克思揭示了阶级之间的差别、阶级间的不平等,从研究商品开始,看到资本主义商品流通中发生了阶级。但是马克思没有阐释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虽然恩格斯看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阐释清楚。恩格斯只讲到了私有制作为性别不平等的起源,但这个阐释不足以说明那么多的问题。当代学者就开始从各个领域探讨,为什么会有这个性别的不平等,想从学术的层面上,从各个学科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的探讨过程中就产生了“gender”这个概念。

“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的发展同马克思发展“阶级”的概念有类似的地方。阶级是在经济生产活动中发生的一种等级制,那么,gender呢?最早的一篇比较明确地讲gender和性的关系的论文收在我跟杜老师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中,题目为“女人交易”。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因为在这之前虽然也有人用gender这个词,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制度性的东西,没有这样去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非常明确地指出:社会性别是一种制度,就像人类社会中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样,还

有社会性别制度。作者认为人类活动不光是经济活动,任何人类社会最起码的要对人的性的活动进行组织、规范,那么对性的活动的组织、规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观念、习俗、法律,甚至包括婚姻的形式、家庭的形式,都是跟性的活动的组织有关系的,这就是社会性别制度。这篇文章使学者们在认识论上产生了比较大的飞跃,看到人类社会中对根本的性的问题也是有组织的,并且在这个组织过程中产生了在大多数文化中都有的一种性别的等级制。

“社会性别制度”是一个中性词,它可以是非等级制的。今天我们这儿有几位参加过杭州的研讨会,在那个会上放了周华山在摩梭拍的录像,他做了个访谈录像,看了那个录像以后,大家觉得非常震惊,因为摩梭的那个社会性别制度跟我们是很不是一样的。它的社会性别制度不一样,所以摩梭人对所谓男人、女人的概念也和我们不一样。社会性别制度里就包括了对男、女两性的界定,因为你要组织这个性活动嘛,就是男人扮演什么角色,女人扮演什么角色,越是角色规范严厉的、严格的、分明的,对男女两性的束缚就越大,并且在这种社会性别制度中等级就越森严。

周华山拍的摩梭人的生活所反映的那个社会性别制度,对性的组织,对男女的规范,就跟咱们不一样,它是非常宽松的。举个例子跟大家讲,访谈对象中有个女性,是个妇女队长吧,她那天在家里生孩子,生下孩子后,她很痛啊,她妈妈扶她上了床,然后就给她做吃的什么的,在忙活。这时她有个同事打电话来了:“哎呀,生了吗?”她接电话:“生了,生了。”她妈妈就把孩子抱

到旁边房间去了。那个同事是汉族,她就问:“你生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哎呦,我还没注意呢,不知道。”就问她妈:“妈,那是男的还是女的?”她妈说:“我还没顾得上看呢,我就光顾看了手和脚,我去看一下吧!”(大家:笑)。这说明什么?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那位摩梭妇女说的时候很自然的,她就在那样说,她觉得何必呢,真的,手和脚可能更要紧,对劳动来说,手和脚比性器官更重要,性器官的差异对她们来说不重要,所以,她看不见,她不关注!

我们今天谈到很多差异的问题。人跟人有很多很多差异,男人和女人有差异,男人之间有差异,女人之间也有差异,但是很多差异我们是视而不见的,比如肩膀的宽窄,每个人的肩膀都不一样,要不然,你做衣服时干嘛要裁缝来量,但谁去关注那东西,有谁来关注它?因为你没有赋予它文化意义,只有那种赋予文化意义的差异才成为真正有意义的差异。在我们汉文化中或者是大多数文化中,性别变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差异,整个的社会围绕这个差异组织起来并不断制造这个差异的文化意义,就是社会性别制度。我们要研究的就是特定的社会性别制度是什么样的,而且要看它跟特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今天上午有位男同学在发言中说:“经济的、政治的方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平等,为什么你们要讲性别的问题?”他显然还不了解关于社会性别制度国外已经有大量的学术著作、理论阐释了,国外大量研究已经用实例说明,人类社会这个最基本的社会性别制度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是有密切联系的,都是相互交叉的。现在任何一种研究,你都不能光去孤立地看男

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而是要看社会性别在经济、政治活动中,在历史的活动中怎么交叉地起来运作,也就是多种等级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我讲了这么多社会性别的问题,是为了说明:多年以来,女权主义学术的发展和妇女学的发展是围绕这个核心概念的。但并不是说它只讨论这个概念,而是说看到社会性别等级制度,以对此的关注作为核心内容,在研究中也发现它跟其他等级制度有非常复杂的交叉关系,互相联系的关系:阶级的等级,种族的等级,族裔的等级,还有年龄上的等级。在美国,特别有年龄的等级,中国也有,但我们没有研究。在中国还有城乡的等级,地域的差别,内地的,沿海的等等,多种等级制。所以在妇女学的教学中,在社会性别的研究领域中,在女权主义学术界,所要做的研究是非常复杂的。21世纪今天的研究是非常复杂化的,要分析社会性别等级和其他种种等级的交叉以及这些等级关系是怎么表现的,怎么维持的等等。

但是这个关注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取消等级制,所以说女权主义学术的另一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是非常强的,包括在妇女学的教学领域中,有专门为学生设置的实践课。作为具体的教学机构,妇女学的课程设置,有专门探讨理论的,女权主义理论发展,社会性别导论课,然后是妇女史,还有其他的如妇女与社会——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的,有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文学等等。除了从社会性别角度考察各个学术领域的课程之外,还有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如妇女与发展的课题、妇女参与社区的问题,社会工作或者妇女健康——怎么来建立地方上的妇女诊所、

反对家庭暴力等等大量的实践性问题。所以说,妇女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因为它最终的目标和最初的动因都是希望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你要解决这个不平等,你不光是理清知识体系上的不平等,男性中心造成的缺失、偏颇,你还必须看这个知识怎么来影响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怎么限制了妇女的发展,怎么来巩固了这种偏颇的知识,怎么巩固和加强了这种社会性别等级制度,要从这些层面上来看。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改变它,我们创造的女权主义的新的学术怎么来改变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妇女学课程设置中的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说了这么一大通,是要说明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妇女研究,开始时并没有社会性别这样一种理论和分析范畴,对此,国内的妇女研究界是不了解的,对这一整套社会性别理论、分析方法、学术观点,咱们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引进,没有什么介绍。能够读英文的,当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读到,80 年代开放以后,有很多西方的学者进来,也做了讲座和交流,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介绍工作,所以我们国内的一些研究者还是可以感受到国外妇女学的一些内容。但是从整体上说,咱们并没有非常清晰地把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来分析中国的妇女状况,或者说,没有非常清晰地看到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新的分析范畴,是可以用来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做一些重新的阐释和分析的,这方面的努力不是非常明确的。应该说,是从'95 世妇会以后,“gender”这个词大量地引进了,不少相关的学术著作也介绍进来了,局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咱们这个项目,就是妇女与社会性别

学学科建设项目,就希望在这方面,在学科建设方面做一些推动。

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在英文这个词上,现在又有一些新的变化。从80年代开始吧,“gender”这个词不光是在妇女学界用,就是在整个的人文社会学科中大家都用了,成了西方学术界的常识,男男女女都会说这个词,不会说成了怪事了,就是这样的(大家:笑)。因为就像“阶级”,常识啊,对吧。你要分析社会,那么阶级、种族、gender,这些基本范畴就缺不了。我1985年去美国念书的时候,美国史教科书上已经都体现了这些基本范畴,全是:gender, class, race 或者说 race, gender, class, 当然,后来还有一个 ethnicity, 族裔。这些概念大家都会用,而且很多男学者也非常感兴趣。为什么这些女学者在建立学科的时候,她们大多用“women's studies”这个词呢?(也有的不用,像我们斯坦福大学,一开始就用“feminist studies”,觉得那是最准确的,它的立场就非常鲜明了。)women's studies 其实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当时大家关注的是:在知识的创建中妇女的缺失,妇女在知识创建中没有成为一个主体,在历史上没有成为主体,今天我们要成为主体,而且关注对象是妇女。所以,绝大多数的教学机构就用了“妇女学”这个词。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就发现,其实我们要谈的不光是一个女人个人或这个群体的问题,还是一个 gender system 的问题,是社会性别制度的问题,所以后来的研究就讲 gender, 讲 gender system, 讲 gender discourse, 社会性别的话语是怎么回事,讲 gender relations, 讲社会性别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讲的越来越多的是 gender 的问题,很多的研究都探讨这个问

题,哪怕你是 women's studies 里面的,其实你上课讲的是 gender 问题,是讲整个的制度性的、结构性的、社会关系性的问题,而不光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当然你还是在关注妇女的经历,在这样一个体制结构中妇女的经历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的中心关注点。所以有些地方就叫自己是 gender studies,不用 women's studies,有的研究机构也叫 gender studies。包括很多男性,他们也更愿意是 gender studies,很多女学者也开始用 gender studies,因为这个听上去更学科性,好像更不偏颇,不然的话,好像就你们女人怎么怎么样,不讲男人怎么怎么样(杨海燕:我们学校用的是 women/gender studies)。对,我所在的斯坦福的研究所也是用“妇女与社会性别”。但是大部分的学校直到现在还是坚持用“women's studies”,为什么呢?也非常有道理,因为到今天为止,尽管 gender 作为一个学术理论已经进入了学术的主流,但是你要讲学术界,你从资源来讲也好,妇女的参与也好,学术界的状况,或者扩大到整个社会中,妇女还是弱势群体,还是这样一个状况。为了表示我们这个学科对妇女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我们不能在今天说:“啊,平等也关怀两性,不显示偏颇,我们两性都来研究。”那么这里面很要紧的是资源问题,你如果说非常公平的,我们两性都要非常公平地发展,做平等的学术研究,那么在资源的分配上,男学者获得机会也就更多了,如果你不突出说我们要关注弱势群体,给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怀的话,那很快资源分配就会倾斜,比如说这些研究基金,那我研究男性嘛,也是 gender system 的问题,那么跟研究女的也一样,拿 50% 给他,50% 给你,那就造成了对弱势群体的不利了。要知道在这个领域之外

的绝大部分的研究资源都是给男性的,在做男性所关注的课题,所以,很多学校的妇女学坚持说,为了表示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我们还是叫 women's studies。那像我们研究所为了既表示对妇女的关注,也表示我们是研究整个 gender system 的,研究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关系的,所以就叫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gender,就是“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第一部分,我想在这里打住。可能还要加一句(其实加不加意思也不大,大家应该都看出来),就是妇女学创立的核心或者说是本质,就是它的批判性了。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是为了批判而创立的,是为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而创立的。它是为了创建一种新的、主张平等公正的知识而建立的,它的批判意识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也成为妇女学教学中的一个核心思想。我培养学生,不是说我传授给你传统的思想理论,绝对不是,而是培养我的学生 critical thinking,就是批判意识,就是说,一定要有批判思维、批判意识,这是妇女学教学的精髓。每一个你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能用批判质疑的眼光去看她周围的任何东西,不盲目接受,不接受你的权威,不管什么人,你是什么什么教授,什么什么学术权威,我不会就因为你的社会身份接受你的权威,认为你讲的就是客观的、真理的、绝对的、正确的,绝对不会。我要通过我自己的思考来问一下:你说的东西是怎么建构起来的?是为了什么利益建构起来的?是为了谁的利益建构起来的?是谁在建构,谁获利了?谁又受损了?妇女学中心出来的每个学生都会问这一连串的问题,对任何理论性的、观点性的东西她都会问这些问题,就是说批判分析精神是它的

精髓。在这方面我想做一点比较。这些年经常在国内跟妇女研究界一起,也和一些高校里开课的老师交往,我非常关注高校里已经开了多少课。我经常在问:“你开了多少课?开了什么课啊?”人家若说:“妇女学课,我们也开了。”那么,接下来我就会问:“这方面开了什么课啊?”有的回答是:“女性心理学课,我们就是讲两性的心理差异啊,让女学生看到因为我们生理的不同,所以我们就有这些差异啊,需要理解自己的心理差异啊,接受这些状况啊。”这一类的还有很多,还有一些课是有规范性的,女性要有什么样的仪表,要有什么健美的体形。1999年夏天在中华女子学院的那个会上,有个女子学校的男教师来参加这个妇女学学科建设会议,对了,他是一所女校的负责人。他也特别关注妇女学,他说:“妇女学学科建设,我非常感兴趣啊。我们也在搞妇女学学科建设,也在教女学生,开妇女学的课。”然后他说,要讲健美啊,教女学生要有健美的身体啊。大家问为什么?“现在要招工啊,都要看女人身材好嘛,你大腿很粗,那人家就不要你了嘛。”(大家:笑)哎呀,我觉得悲哀极了。这种状况不是一个两个,韩贺南是吧?韩老师做了很多调查,在不少女子学校教所谓妇女学,教女性心理学的,结果你仔细去问她的时候,你会看到她教的是在维护现有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社会性别规范,她是在维护、巩固、加强现在的社会性别规范,而不是向它挑战。她更进一步地把男学生、女学生束缚在现有的社会性别话语中,束缚在主流话语所限定的所谓什么是男性、什么是女性这个内涵里边,她更进一步把这个框框套在每个男生女生身上,强化这样的教育。其实这种课程起了一个巩固、强化这种社会性别等

级制度的作用,很多人还打着非常时髦的旗号,说:“我是做女性研究,妇女研究的。”他不讲社会性别,“女性研究”“妇女研究”“妇女学”他只打着这些旗号。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非得把这些概念说清楚,我说的妇女学是怎么一回事,我实在不想把自己和那些人混在一块儿讨论,那实在不是一回事。

好了,这个问题就到此打住了。因为在座的都是教育界的专业人士,老师是已经在教育体系中运作了,还有学生将来也是要在教育界中运作的,所以我想得把妇女学在美国的体制中的发展状况介绍一下,这只是一个参照,因为两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政治都是相当不同的,教育体制也是极其不同的。至于妇女学,作为一个教学的内容,如何进入到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中去,这个事情要在座的各位去开创了,我现在只能介绍一下,就是美国这30年的历程,她们走了三十多年了。最早女学生说:“我们要想了解妇女在历史上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教历史的那些女教师们就觉得:“哎呀,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历史书呢。”找吧,做研究吧,在史料中去找,然后写文章。很多时候是一个学校里各个系中的女教师集中到一块儿,那就很像我们大部分的妇女研究中心了,高校的妇女研究中心就是这个状况,咱们妇女研究中心很多是来自各系的老师在一块儿,可能哪儿有什么项目,咱们一块儿参加来做做。有研究基金嘛,咱们一块儿来做做。她们当时聚起来是因为教学中的问题,或者教材不够的问题,那就成了一个联合体了,大家联合起来。最开始的教材编写是一个人一篇论文,社会学来一篇,历史学来一篇,人类学来一篇,文学来一篇,编一个集子,然后用它到各个学科中去教,

大家都去教去。所以,妇女学一开始就是跨学科的,它打破了西方非常僵化地把学科划分界限的这种做法,是突破了学科界限来做的。

当然开始时只是多学科的综合起来。那么怎么把学科的界限真正打破,这方面有意识的努力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比较多一些。这样做起来以后就开课了。开课以后,学生非常感兴趣,要听的人特别多,你一两个讲座根本满足不了,要开一学期的课,然后一学期的课也不够,因为历史系你光一门课不行,我还要你多开一点课。比如说,你光讲美国殖民地时期,不行,你要讲到今天,那它就必须有更多的人来开课了,不久这些教师就成立了妇女学中心——一个制定妇女学课程大纲,协调全校妇女学课程的教学机构。学校当然也注意了这方面的发展。美国的那个教育体制中,教授的自主权是很大的,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我要开什么课和用什么教材”,可以和系里边商榷,教几门系里规定的课之外,可以设计新的课。你自己把这课设立出来,把教学提纲写清楚了:我这个课的宗旨是什么,教学内容是什么,我要学生阅读多少书,课时是怎么样,打分怎么打,你搞出这个课程提纲,然后印出来,整个学校各系有关的课程都印出来,印个大厚本,每学期一个大厚本(现在是上网了),学生入学后就去看,对哪门课感兴趣就去哪儿注册,报名注册那门课。在我以前的学校只要有7个学生报名注册一门课就行了,你就可以开这个课了。研究生呢只要有3个就行了,研究生研讨班,3个就行了,然后这门课就可以教了,非常灵活的。每门课的人数是有限制的,因为教授要考虑到教学效果。若是大课,可以是

60人或更多,若是小课,讨论班,只能有25人。到时一报名,不得了,25人的小课报了60人,报了100人。既然那么多学生愿意上妇女学的课,当然就开了好多课了。这样一来呢,校方也注意到了,因为每个学校还有竞争嘛,学校都希望有更多的学生来自己这儿上课,你这个学校的妇女学学科吸引了那么多学生,校方就主动跟你说了,是否可以挖掘潜力再多开点这方面的课呀?需要的话学校也可以拨经费再聘几位妇女学的教授等等。

(提问“报名的人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女生多,到现在为止还是女生多。我教过美国妇女史,也教过中国妇女史,很长一段时间教美国妇女史。来的也有男学生,我就问他们,也是调查:“你们为什么会选这门课的?”他们就笑了:“我们听听吧。”女学生马上就起来说了:“他们是因为这儿的女生多嘛,他们来找朋友嘛。”(大家:笑)那两个男孩也没有否认。确实,想起来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啊,你接触的全都是女生,那么多女生,有的大课一百多人。在加州大学的桑塔克鲁斯分校,他们的妇女学很有名,有一些很有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在那儿,在理论上非常有建树的,教学也非常好的,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去那儿上课。其实大学里有很多不是妇女学专业的人也来听课,所以她们的课,都是几百人的大课堂,要拿着个话筒讲课的。校方拨款的时候,说系里能招收多少教授,那要看你开多少课,你的课有多少人感兴趣。这样一来,妇女学开的课越好,那校方可能就让你聘更多的人。学生来我这儿上课了,我没有教课怎么办,所以非得要专职的教师来了。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兼职的,最早的时候甚至连兼职的都没有。比如说,你是历史系的女教师,是文学系的女教

师,那你开一门关于妇女学方面的,她也开一门关于妇女学方面的。现在妇女学已经有一个机构了,在力量最弱的学校中起码也有个女秘书在那里,她把各个系的女教师开的有关社会性别的或者妇女的全部课程表列出来,供学生到这儿来选课。那么强的妇女学中心或者系怎么样呢?它就向校方要钱了,你非得给我一个固定的位置,50%也行。就是说这个教师她有50%的时间在我这儿上课了,比如说,一学期我教两门课,那我一门在妇女学中心教,一门在历史系教,就这样,所以叫50%,50%兼职的。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的妇女学机构都是这样的。也有100%专职教妇女学的,校方同意了嘛,因为你实在学生很多啊,要选这门课的人多,那你自然就需要专职的教师在这儿教书。上次在马里兰大学开会,我们问了一下,她们有五个专职教授教妇女学,就是100%的工资都是在妇女学系拿的。

这个过程中,初期主要是由学生推动的,学生提出的。美国最强的妇女学系或者中心,都是在公立大学。那些私立的名牌,像哈佛啊,斯坦福啊,妇女学教学机构都比较小。这为什么呢?这个跟阶级有关。因为在这些大学里面,学生的阶级背景大部分是有钱的,进了名牌大学,她的感受就不一样,她就觉得很顺,已经是精英层了,她不太会感到有什么不平等,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感觉也不会太多。她觉得靠个人努力可以实现她的目标,不太觉得有必要来听你这个课,不太关注,选妇女学课的人就相对地少。所以在这些大学里头妇女学的力量就比较小,不能像公立大学那样发达,发展那么快。

最初是学生的推动,那么第二阶段的推动呢,就是体制内的

运作了。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下半期,美国教育体制中就不光是妇女学了。今天上午的讨论我也听到了这个说法,咱们光说妇女,其实还有其他的不平等。确实如此,在美国教育体系中,现在一般的大学里都有非洲裔美国人学,叫“African American studies”,有族裔学“Ethnic studies”,还有同性恋学,我以前读书的学校还有土著美洲人学“native American studies”。前面我所说的几种等级制,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凡是在各种各样的等级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都进入了高等院校的教育体制。到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在美国社会很流行的词“multiculturalism”,就是多元文化,就是看到多种族的、多族裔之间的文化是很不相同的,有差异。这个差异也表现在等级权力结构上,我们要消除这些等级结构,而这种消除不是说:好,让大家都变成白人,都去接受白人文化价值,都向白人的文化靠拢,而是说要尊重不同文化各自的价值,要警觉和抵制强权主流文化压制其他边缘文化。

多元文化要表达的理念同 gender 要表达的相似。一般社会中也都是以男人的行为模式为标准,他就是最标准的,那咱们都不符合标准了,而且他的行为方式都是好的,有价值的,与他不同的就是负面的,所谓“男优女劣”。多元文化的概念和女权主义所推崇的是同样的逻辑,反对强势群体的霸权。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土著美洲人、同性恋,所有这些弱势群体都在开创关于自己族群的知识,建立起各自的学科领域,作为抵抗主流霸权文化,改变权力关系的一个阵地。目前美国许多大学要求大学本科生必须要修多少学分的多元文化的课,这个规定让妇女学又在体制上有保证了,生源也保证了,所以男学生也来得多了,他

可能对别的什么学不太感兴趣的,而 gender 呢,“我是男学生,跟我还是有关系的嘛,我还是学这个吧”。所以现在能发展得那么快。

上面已经涉及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即体制和教学机构在美国的状况。我还没有对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据我了解,有妇女学方向硕士点的也就是北大,现在东北师大也刚刚建立了硕士点。对东北师大的点我还不是很了解,在北大呢,它是争取到了硕士点,然后赶紧看看底下课程怎么能够设置起来,而不是已经有了完整的课程设置,本科的专业也有了,然后再搞一个硕士点。它不是这样。从教育部拿到了这个机会,我们赶紧来发展,这也是一个途径,所以我说,中国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做法可能是相当不一样的。还有呢,我们的教授没有那么大的自主性,所以校方领导的支持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如果校方不支持或者系主任不支持,你就别想开课,你再有觉悟,再有学术水平,晚上开个讲座还差不多。你说,今天我要开这门课,一学期的学分要让学生修下来,作为主要的课程之一,这个操作起来非常困难。那么在中国的情况底下怎么来操作,我非常希望大家在这方面会有所讨论。

可能对前面的内容大家还会问到为什么必须在中国建立这样一门学科的问题。从美国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三十年来,应该说它的影响很大,每年有七百多所高校,一年有三万多门课,你想有多少学生接受了它的教育?现在有好些地方,做发展培训的有好些人,比如陕西,昆明,北京也有很多人,在做社会性别意识培训。我刚从昆明来,碰到了陕西的高小贤,她们把西安的派

出所所长都培训了一遍,(大家:笑)法院院长都打算要培训一遍,因为好多时候法院处理案件,就是对妇女非常歧视的嘛,所以要对他们培训,我觉得非常好。那咱们教师,在教育领域中的人呢,高等院校里的教师呢,这不是你培训最好的场所吗?每年有那么多的学生从你的眼前走过,都是付了钱来上你的课的,你这个阵地是现成的,完全是现成的。在美国的妇女学就是社会性别意识培训的大课堂,而且这些年来的培训绝对是卓有成效的。今天,在美国公开的社会性别歧视的话是不敢说的,广告上不敢公开说,隐蔽的还来一些。公开的,连政客都不敢说。比如竞选的时候,从市长选到州长选到总统,他们讲话都是非常注意,不敢来半点的性别歧视。

上次有个州竞选州长。有一个候选人并不是在正式的演讲中,他是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不知怎么讲到强奸的事情,他就说:“这种事情,就像农夫遇到雨天,女的嘛,就一躺下, enjoy 嘛。”享受嘛,他说。结果这句话传媒一下子就给传开了,然后所有的女权主义组织都起来了,抗议啊,游行啊,好了,完了,这个人的政治生命就完了。(大家:笑)这是非常厉害的。还有现在所有的政府的公文,所有的文件表格,不再只是什么 Mrs(太太)或者 Miss(小姐),它都有一栏 MS(女士),MS 也就是女权主义创建起来的词啊,你为什么要用是否结婚来界定一个女人的身份呢?因为女人在西方的语言中,婚前是 Miss,婚后是 Mrs,就靠她丈夫的姓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为什么女人不能有自己的身份呢,MS 这个词就是女人自己的身份。我甚至都不必告诉你我是否结婚,因为 Miss 这个词它显示是未婚的,所以她们造

了MS这个词,婚姻不界定我嘛,结果就是现在所有的文件表格里面都有这个新词。还有一个例子呢,我儿子上二年级时,他就会说“If you want to ask him or her”,他就是这么说的,连这个二年级的小孩都会说“he or she”(他或她),那就表明这个女权主义创造的人称代词已经成为表述的规范了,他不能用“he”——男性的人称代词来指所有的人,你要泛指的话就必须包括两性都在内。包括总统演说,他都要用“he or she”,绝对不能只用一个人称代词来泛指,这些都是妇女学的影响,对美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我超过二十五分钟了,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王琨:好,下面看看谁有什么问题?

卓挺亚: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对美国的女权运动发展包括妇女学的发展已经比较熟悉了,您看我们现在各个高校都在试图建立妇女中心,现在也努力开设了一些妇女学方面的课程,从历史上看,从发展进程上看,您觉得跟当初美国妇女学学科建设是不是有一点相似之处?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非常系统化的,包括妇女研究中心,即使有这个中心,也是比较零散的,或者说不是集中的一个机制或者机构。是不是她们当时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是不是和她们的初始阶段很相似?

王政:今天国内大部分的妇女研究中心,刚才我说了,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在教,这是很不同的。在美国,一开始妇女学就绝对没有维护巩固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教学内容,这是一个不同。但是从机构上说,一开始都是非常小的,没有资金,这是完全相似的。(卓:因为我觉得力量很小,所以总是很困惑,是不是她们也是这样的?)对对,完全是,当初就是没有资金的,就是你教师

发自内心的行为,没有任何来源的。然后她们就要到处想办法去找钱哪,还要跟校方去打交道啊,有很多很多具体的斗争,具体的努力,然后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她们当时是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背景下开始的,就是说,在美国社会中的任何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场社会运动,官方的、校方的,任何人,都知道,轰轰烈烈的。当然他们知道的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很多人是通过传媒知道的,而传媒对女权运动做了极大的歪曲,否定。这种歪曲甚至传到了我们国家,我们一般人对女权感觉都是非常吓人的,那就是恨男人哪,跟男人斗哪,非常极端的哪,都是这种形象,而那种东西都是传媒制造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人们知道有这场社会运动,而且那时有多种社会运动同时在进行,整个的这场社会运动的精神是要为弱势群体争取社会公正,这是它的社会背景。在这样的大背景底下,女学者的要求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就容易得到各界的支持。

丁杰:王老师,刚才您说我们国内在开设妇女学课程的时候,往往是先有点,后设课,我特别想了解,美国开设这个妇女学也好,女性学也好,或者 women studies,不管怎样称呼它,它这个课程设置是怎么样的?

王政:课程设置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先是几个女教师凑起来讲讲课,或者是讲座式的。她有自主权,自决权。比如说,系里头说工作量你要完成的,一个学期你教两门课,比方我是教历史的,教美国史,我可以教一门《19世纪美国社会史》,然后,这学期开始我要教妇女史了,我要讲19世纪的美国妇女,那么系

里面的领导一般没有理由跟你说：“不行，你不能开这门课。”我刚才说了，只要有7个学生过来说，“我对这门课感兴趣”，符合这个程序，他就不能因为你的内容而来取消你。你只要符合程序就行。这样呢，她们就一门课，两门课，一个学科，两个学科，一个个地开出来了，比如历史系啊，社会学系啊，人类学系啊，文学系啊，那么，开多了以后，声势壮大了，也复杂起来了，有那么多的系，有那么多的女教师在开那么多的课，就需要有一个机构了。设立机构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钱，她们要向校方找钱：我已经那么多人了，开了这么多的课，你得给我一个办公室吧，你得给我一个专职的秘书来统筹安排这些活动吧。这样她们可以争取得到一批经费。到今天为止许多学校的这些机构都叫 women's studies program，不叫 department，因为美国高校里都有这样一个灵活的机制，就是除了在系里设置课程之外，还有些临时性的东西叫 program，你可以向校方申请一笔经费来主持一个 program。这个经费校方是有的，那么她们就去争取了，来搞一个 women's studies program，后来就变成永久性的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争论说还应不应叫 program，其实不光是现在，到80年代的时候，很多 program 里面的人就已经在想这个问题了，我们把 program 翻译成“中心”，妇女学中心，其实不是很精确，program 好像是一个项目，但是讲一个项目呢，中国人听起来就太临时性了，太小了，所以一般还是翻译成“中心”，但它其实是一个 program。在英文中呢，它也是显得比较临时性的，所以很多 program 里面的人就说，我们已经是完全体制化了的，在教育中完全体制化了的一个教学机构，好像不应该再叫 program 了，应该变成 department

(系)。而且很多的 program 已经比小的 department 要大了,它的专职人员,它的学生,它的硕士点,它的博士点都有,规模非常大。但是有些即使已经是那么大了,包括博士点都设立了,这个 program 还是不愿意变成系。因为 program 有 program 的灵活性,它有些方面可以不受校方对系的限制。关于妇女学课程设置的具体内容,在《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的附录部分有美国密执安大学 1996 年秋季的妇女学课程,可供大家参考。

张宏:您刚才讲的美国的情况,美国的妇女运动让学生产生一种需求,会问:“最早的女人在哪儿呢?”然后发现知识结构有问题(王政:对,对),向知识结构挑战。但是我们现在开课吧,缺少一种背景,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的课程内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您讲到妇女课程教学的精髓是 critical thinking,我觉得西方文化也有一个背景,就是这种质疑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传统,并不是从女权主义才开始的。在我们的学校,我刚才跟史老师讲,如果你告诉学生:“我不能给你一个现成的答案。”学生首先就说这个老师没什么水平,她不能给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是在西方,学生会觉得她能让我思考就是好的。

王政: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可能是妇女学要在中国创立最艰难的一点。最最艰难的不在于有多少钱,女学者资源贫乏,不在于这个,而在于重新开创一种思维方式,这是相当相当难的事情。

刘云杉:在西方非常注重批判思想、批判意识的产生,但我们平时看批判总是觉得这是个捣蛋鬼,所以我们在课程研究里面,课程社会学也是扮演这种批判者的角色。但是在新一轮的

课程改革里面,非常遗憾没有把这种课程社会学纳入在里边。那么另外有一个比较好的,值得欣慰的是批判也是一种建设,如果建设的力量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那么我们在推倒一个东西的同时也在建设一个东西,就是让你这一部分人不断地表达你的声音,让你的声音不断加大,加大到主流社会不得不倾听你的时候,或者在任何一项公共政策要出台的时候,你有一票否决权,这个时候,你的作用也就达到了。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当你可以一票否决的时候,那么你也坐在这个平台上,和男性,和别的其他阶层一样的平台上,有这种公共决策权的时候,批判意识有没有因此削减,或者说这个研究会不会赋予了一些新的内容?

王政:我在这儿强调女权主义学术的发展过程以及它的成就,但是如果你要和整个的学术主流去比的话,它还是弱的。还有,很多学科领域还是非常保守的。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它叫 Chinese studies, 中国研究,就是个非常保守的堡垒。有些学科,如果它新陈代谢快一些,那老的退下来快一些,那年轻的就有新的知识结构进去了,当年轻的占了主要位置的时候,学科表现的就是往前走得快一些,新的声音出现得就快一些。像中国研究呢,因为还是老权威在,他根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大家:笑),也不屑于听你们在说些什么,他自说自话的那一套,说了那么长时间,已经给了他很多的地位啊,权力啊,他都有了,他们不必要改变。此外呢,他还贬低你那一套,比如有所美国大学,需要一个教中国历史的教授,这个学校很保守,我们大家非常希望聘请一个在中国历史中做社会性别史的美国学者,相当好的美国学

者,中年女的,她非常棒。那些历史系的学生、老师都非常喜欢她,凡是了解她学术的人都知道这是个非常强的人,于是系里通过了。但是那学校有个规定:聘一个终身教授,要通过人文学院院长那一层,把候选人的材料送到12个权威人士手里,全美国此领域——中国学的12个权威人士手里,由院长看这些人的评论意见做决定。这12个权威人士中就有不少是那些老头,结果有两个老头说了不好的话,她就没有拿到这个位置,所以这种状况还没有结束。这些有权力的机构中主要还是男性,女权主义学术还是在改变自己弱势状态的过程中。咱们中国这种状况就更严重了,我开设妇女学课程或者写了妇女学的文章,我这文章在哪儿发表?评职称的时候,如果核心期刊不让我发表这篇文章,我这文章就没有价值可言。我开的这门课你们不承认,那就不能算是我的工作量,那我以后评教授、副教授的时候不就受影响了吗?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许杰英:在制度层面,观念层面,美国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处理一些很实际的问题之外,我们真正要在中国建立妇女学或者说培养学生的这种社会性别意识,为了达到我们这个研究的变革目的,它和社会民主化进程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是一个保障,还是本身就是个目的。

王政:社会性别的民主也是一种政治的民主。从中国的状况来看,这么多年来大批的妇女研究界人士自觉地参与推动妇女的发展,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这就是说,什么事情不会再等待权威来告诉我怎么做,政府

来告诉我怎么做,而是认识到,我,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主体,可以起来做什么事情,自觉地起来做一些事情,这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是政治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妇女学的推广、创立和发展也是推动政治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但同时它也肯定会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在这方面我们就要用现在的许多学者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 negotiation,我们翻译成“磋商、较量”,这是一个磋商、较量的过程,这中间涉及到很多很多技巧。我知道在过去十多年中,参加妇女研究或者妇女发展的这些人中,有很多很多巧妙的做法,一步一步地在推进。

王琨: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背景,现在我们很多人做妇女学科的建设,总想有一些支持,光是我们在这儿自说自话,总是有限制的。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丁杰还说我们要借鉴什么学科。所以我就想,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学术背景。

王政:我刚才想说的是妇女学在美国发展的一个学术背景。刚才张老师也说了,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思维方式和我们很不相同的就是它的批判性一直比较强,而且它整个学术界中的人群,特别是人文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界,功能和咱们从中国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功能是很不一样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西方整个的学术体系,不光是女权主义,整个学术体系的主流是左派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在左派的社会运动中产生的。那么所谓左派的是指什么呢,就是主张社会公正,它要批判一切的等级和垄断、控制、不公正,或者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反霸权,它反对种族间的霸权、阶级间的霸权、民族的霸

权、文化的霸权,那么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女权主义反对男性的霸权是符合这个学术主流的逻辑性的。这些反霸权的运动有关注底层人、关注弱势群体的那一面。那么在这样一个左派主流的推动下,在过去三十年里出现的一些主要思潮都是很有意思的,中国学术界都引进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都是左派思潮,而且很多是从毛泽东思想里面吸取了养料的,因为毛泽东时代有对工农兵大众的关怀,对权威的批判,这些东西转而让西方的知识界吸收了。西方的那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关注和推动社会的公正,关注弱势群体,反省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的发展,殖民主义的过程,完全来批判自己了。你看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都是西方知识分子(也包括在西方的来自前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历史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对西方霸权的批判,这整个的批判精神的背景是咱们当前所没有的。我在杭州演讲时讲的主要就是分析咱们这三十年里,学术界的背景是以“反左”为主要内容的。当然咱们说的“左”和西方人说的“左”又不一样,中间当然也意味着对极权的批判,但也把那些坚持社会公正理念的东西反掉了,包括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是坚持社会公正理念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知识界把这个也作为“反左”内容给反掉了,所以才会在20世纪80年代一开始就有“妇女回家”的提倡,经济学家跳出来,社会学家也跳出来了,大言不惭地说那些话,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在大众传媒中宣传,没有任何惭愧,而是理所当然,堂而皇之的。这个大背景是相当相当不同的,所以对我们中国的学者来说,要创建这样的学科真是逆水行舟,咱们面临的阻碍、困难

和艰难要比西方学者所经历的大得多,这也是对参与这项事业的男女学者的共同考验。男学者,你是阻挠还是支持;女学者,你有多大的学术力量、人格力量和精神力量来投入这项事业?所以这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希望年轻的学者里面有更多的人有勇气和力量来做这项事业。这件事确实还需要有学术力量来做,因为是在做学术,确实需要学术。女权主义学术到今天能够使它的基本理论范畴、概念进入学术主流,不是因为女权主义那么厉害,恨男人,男人就让给你了,是因为它的学术本身有力量,有分析力,所以能让男性学者去接受,能承认。那么咱们要想也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拿出非常有力量的学术成果来,不是说靠几个“形象丑陋”的女权主义者张牙舞爪地对着男人大骂一通(大家:笑),就能够产生今天西方这样的结果了,这绝对不可能的。

张东娇: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您讲的这个妇女学是比较原汁原味的,那么它经过中国文化的削减之后,变成一种本土性的东西,和你理想中的有多远,那么怎样达到这种原汁原味?如果不能实现的话,中国的妇女学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王政:首先我要说的就是妇女学和其他一切男性的学科是不同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权威,而是要反权威,不是要建立固定的结构,把你打倒,把我竖起来,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点上我们可能不会再重蹈覆辙,这是从事妇女学学术的每个人都非常清醒认识到的。但是理论上非常清醒,并不是说在行动上就清醒,都能够自觉地去,行为上还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在理论上,就是凡是男性在创建权威知识体系的过程中犯的错

误,我们尽量避免。但首先我要知道他犯了哪些错误,要把他的错误给理出来,这个事情西方的女权主义学者做得很好了,非常清楚。先把他的错误理出来,看看是什么导致他的错误,我们怎么来避免他的错误,所以女权主义学术整个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自我批判的过程。我们对这个过程比较难把握,为什么?因为它学术流派太多了,大家不仅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建立的东西,而且不断地在批判自己,我写的东西,她写的东西,即使都是女学者写的东西,大家也可以相互批判,就永远保持一种自省、自觉,不把这些东西当做权威来建构,不认为“我是在建立一种绝对真理体系”。如果说这句话,其实你就是在说男权的话了,男权文化结晶的东西你接受了,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女权主义学者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把自己的身份界定清楚,把自己的局限性讲清楚,不声称权威,不声称我占有真理。为什么这样做?这个就是等于在学术机制上有个保障,就是不要重蹈覆辙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有希望的保障。

为什么我说你提的问题非常好呢?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传统的男权文化建构起来的,那么,很可能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按照这种文化模式来的,那么这样一群人怎么来创建起一种不同的东西来,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今天这样在男权文化中建构起来的人怎么创立起这样一种美好的学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批判精神,必须在你解构别的东西的时候,先把自己解构,非常清醒地解构一番:我身上有多少东西是男权文化的表现?我今天写的这篇文章里面,我说的这些观点里面有

多少是男权文化的表现？每一步都要做自我反省、自我剖析、自我批判，只有以这样一种自我批判为前提，才可能往前迈一步，不然的话，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完全变了样的，变了味的，不过是像男权那样，造出一个所谓的了不起的现代性学科，然后用这个为自己谋取某种权力或者好处，谋私利而已，不过如此。

杨海燕：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吧，咱们这个标题是“社会性别与教育”。今天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里头都有妇女研究中心或者系开的课，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强调的是社会性别意识渗透，是跨学科的，和各种教育联系，和各个学科联系，我就想，如果在我的外语课堂上，社会性别意识如何渗透。我要是会做了，我会告诉好多人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我没搞清概念，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美国那些妇女研究中心所开的课程有它的历史背景，就是它的教授有自主权，咱们中国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是所有的高校老师都有这种性别意识了，觉醒了，然后把这个性别视角渗透到课堂上，最后再进入主流。王政老师，希望你在这儿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最急着做这件事情。

王政：其实在美国也不是只有在妇女学的课堂上才讲这些事情，因为女权主义学术的发展，不光是开课，还有办刊物，办刊物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很多的刊物，专门的女权主义刊物，还有其他的刊物，研究成果在那些刊物上发表也是打入主流的一个途径。那么上课呢，有好多课程不列入妇女学的课程，但可以从社会性别视角渗透这些课程。

杨海燕：对，就是这个角度，性别视角怎么能渗透进我的课堂，如果我仅仅是从语言上，我注意，man 代替人类，我不用了，

“he or she”用得多一点,但是这些都是些表面的东西。

王政:对,那么你要重新设置课程了,如果你真的要让性别视角进入课堂的话,就要重新设置课程,你也可以在同样的课程设置底下做,但是内容要变了。美国的女教师有这样的做法,在妇女学以外教其他的课程时,可以选择教材,比如我是教美国通史的,以前的教材都是讲男性学者的东西,或者讲白人男性的经历,那么现在呢,我可以选一些讲妇女的东西,一些与这内容相冲突或者是批判性的材料进来。把这些材料引进来,不是光比较一下就完了,还要启发学生思考,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角度产生两种不同的学术成果,让学生来对照,来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教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关键是你教师自己要有这样一种角度,有了这种角度,你就可以不抛弃老教材的内容,相反可以把它作为批判的材料来用,引导学生思考、分析这些材料。你在教英文的时候,每一篇都是有内容的,它的这些内容都是从哪些立场出来的?它说出了哪种人的声音?它可能掩盖了谁人的声音,这种妇女学课堂中的教学方法在任何的讲课中都可以用的,任何的课程中也都能用。我们还可以想,如果今天这篇小说中,这个主人公说了一大段非常垄断性的,好像有普遍意义的话,但是如果他不是这种身份,是另外一个人,他会怎么样?如果小说中表述的那个人没有多少声音,没有多少地位,是被歧视的,比如说她是一个黑人女性,那么你就可以启发学生,如果你是那个女孩,你会怎么想?这就是说可以用一个解构性的、颠覆性的教学方法,什么材料都可以用。

(本文是2002年12月23日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性别与教育”
读书研讨班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整理)

突破单一的“地位” 分析框架

王政：从昨天几位老师对妇女研究综述的内容来看，妇女地位是妇女史研究的关注点。我对此想提出疑问。讲妇女地位，历史源远流长，因我刚思考这个问题，没做实证调查和史料整理，仅从我的印象来说，有两个背景：一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背景，从 20 世纪末可追溯到傅立叶，认为妇女地位是一个衡量文明的标志。在这主导思想下，出现了大量妇女研究，包括 80 年代妇女研究的兴起，妇女地位也是一个驱动力；还包括全国妇联搞的“全国妇女地位大调查”，各地有各地的妇女地位调查。史学界做史学研究，有唐代妇女地位、宋代妇女地位研究。另一个是学术背景。从学术背景来看，妇女地位和社会史有关，就是看一个群体在某个时期的社会地位怎样。这个学术关注点引出了不少研究，使我们对妇女不同时期的状况有个大概的印象。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在妇女史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如果关注点仍聚焦在妇女地位这个问题上，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什么这样说呢？依我看，它起码在两个方面有限制性：

一个是它有个假设,即妇女是个整体,不然,你难说地位问题,你怎么统计妇女地位怎样?你总是说,这个时期妇女地位怎样,雅典的妇女地位怎样,你的假设,就是设定妇女是一个整体。但是咱们深入讨论,就发现妇女不是一个整体,她们中间还有很多差异。怎样来表现差异,从社会性别角度考虑,还要看到种族的、族裔的、阶级的、地域的差异等等。如果笼统地把你的研究设定在妇女地位怎样,就很难把这种差异引进来,也很难关注这种差异。也就是说,关注妇女地位会限制你对妇女群体中差异的关注。

其次,不容易把你的研究设计得复杂化,而是比较单一。地位总是高和低的问题。关注点在什么东西表现高,什么东西表现低,这样的研究设计可能线条较粗、较简单,很多问题你就不会去问。比如,社会性别制度在那个特定时期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它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观念性的东西也好,体制性的东西也好,实践性的东西也好,怎么制造的?在哪个场所怎么制造出来的?社会性别的制度,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同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关系和其他社会形态的关系如何?因为你只是看一些指标、找一些迹象来说明高和低,就很难深入探究其他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你用地位高低来做分析范畴,就可能遮蔽了很多值得问的问题,也遮蔽了其他一些范畴,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比如,它可能限定我们从文化意义上探讨。前天高彦颐介绍了她研究缠足史,她的研究有一个理论背景,是文化史关注的那些方面。“地位”问题是社会学背景,是考察一个群体的状况、

地位情况。社会史关注社会的群体和阶层,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还有体制的关系,较少关注这个群体内部的情况如何。现在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大家在认识上产生了新的看法、新的角度,人作为群体来说不是那么单一,仅是由经济地位来决定的;人是怎么构造的,按后结构主义理论来说,“话语”就很重要,大量带有文化意义的语言、符号、仪式等象征的意义。一个人一生出来无处不接触到的种种象征性、礼仪上、仪式上的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是不能用经济状况界定的。这些东西与构成一个人或社会群体的主体身份、历史有相当大的关系。现在文化史更多地考虑这些文化象征意义,语言也好,话语也好,物质文化也好,对单个人,对群体的含义是什么?如单纯地问社会地位的问题,对这些文化的东西就很难包容进去,很难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妇女史虽然刚起步不久,但因为已经有了很多学术研究,特别是国外的研究,可借鉴很多有效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历史问题。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方法,咱们就大可不必拘泥于一两个范畴。不是说“地位”问题不能说,人在社会中总要有个“地位”问题,但如果把妇女地位作为单一的关注点,就比较狭隘,束缚性较大。我简单地讲到这儿,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较突出。今天我希望有更多问题提出来,更多的分析范畴可以用,更多的领域可以考虑。接下去在对教材的讨论中,可结合这些问题思考一下,讨论一下。我希望我们的教材能对迄今为止的国内妇女史研究有所突破,在主题上、在方法上、在研究的领域上,都应该有所突破。这个突破怎样实现,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就这

个问题大家认真讨论一下。

杜芳琴：到现在为止，中国妇女史研究主要的概念范畴有三个，地位、生活与贡献（作用）。1995年，臧健老师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了一篇中国史研究综述，提到的文章题目主要是“地位”——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法律地位、政治地位（妇女参政）、经济地位，“地位”中还提到压迫—反抗模式。多数研究者总是在说母权时代妇女地位高，父权时代妇女地位低，有些专著是特别专业的教授写的，描述母权社会的妇女，说她们特别有地位，受尊宠；男的像受气包一样接受妇女的指挥。这种“妇女地位”论在历史学界及社会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核心的概念。和地位相关的是“贡献”，贡献和地位有关，现在总谈“以贡献求地位”，还是围绕着地位说。其他范畴，还有生活类——物质生活，服饰礼仪，宫廷妇女，劳动生活，家庭生活，青楼生活？不是地位，就是生活，生活也是以地位贯穿其中的。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唯物主义史观做指导时，就常把地位做重要的分析范畴；如果用社会性别进一步把差异复杂性考虑进去，对我们的研究一定能打开很多新的思路。

臧健：自1995年以来，这种集中关注在妇女史研究中有所改变，如果现在我再写综述的话，“地位”的概念会相当少了，即使谈地位，也不是简单地升降，而是涉及到它方方面面的影响。

王政：有篇文章也是谈“地位”，是从家庭和私人生活看雅典妇女的地位，所用的史料很多，它若是不被“地位”概念局限，文章可能做得更好。地位成了束缚性的东西，而不能帮助研究深入，在某个阶段这个概念可激发人们看很多资料，看妇女情况，

推动这个研究,但到了一定时候,就会觉得以它来深入有问题。从作者引用的材料看,我可以做不同的解读,材料已经反映出古希腊妇女的不同状况、不同情况,但是因为被“地位”概念束缚,觉得有责任去衡量它的高和低,就把它的复杂面掩盖了。其实各种情况都有,但因为大框框套在那就把它掩盖了。和“地位低”有关的,被压迫者、牺牲品、受害者的这种刻板模式又出来了,你就很难表现妇女的另一面,你找的例子就是受压迫、受剥削、受迫害,这样不利于表现妇女的复杂状况。在历史上,哪怕有社会性别等级制,也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处于被牺牲的被动处境。怎样来表现主动性、能动性、多样性?你只讲地位低就很难讲这一方面的东西,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范畴可能会有束缚性。

蔡一平:我想到我自己,作为课题研究不是因历史上有妇女地位这个话题,我们客观地去研究,而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找这个问题来研究。“地位”的问题是学者提出来的。我在本科毕业时做汉代和宋代后妃参政的比较,研究生做的是中国古代女主。我为什么做这个题目?我当时很想做宋代宗教,妇女参加宗教活动,我看了很多资料、笔记,后来,我自己和老师都觉得我把握不了。我们历史系有个传统就是研究政治史,因为我找的是一个与政治有关的题目,就比较容易获得支持。本来我想做宗教的课题,但史料中获得的资源和现实的处境,只能支持我去研究政治史,所以研究了女主参政的问题。去年我又关注到徽州,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我的老师说:有机会去看看徽州牌坊,在我的心目中,这是妇女地位低、受压迫的象征物。我本想

去看看妇女怎样受压迫,怎样树贞节牌坊,但去后,到当地的感觉不一样,这东西并不是妇女的牌坊,也不简单是妇女的地位低的象征。它是家族的荣耀,家族花了钱给官府、皇帝,贿赂了才允许给这种荣耀,忠孝节义,全得有。如果这家花了钱,有忠的牌坊,有孝的牌坊,还没有义的牌坊,再捐很多钱得一个义的牌坊,就完满了。后来我和舒芜先生谈,他是徽州人,“五四”时代很关注妇女的知识分子。我和他谈徽州的牌坊,他说,我小时候害怕去那个地方,长辈说,晚上,每个牌坊上都坐着一个女鬼在哭!这是多么恐怖,多么压抑人的封建礼教!当时我说,是这样的。现在想一想舒芜先生是“五四”文化孕育的人,他关注的是这个,他就这样解读。我的眼界如果打开一点,解读就复杂多了。去年我翻译了一篇文章——《从妇女史到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从中很得益,其中讲到社会性别史是什么,说社会性别史,是妇女的历史,是男人的历史,是男女关系的历史,是社会的历史,是文化的历史。如果我们抛弃了某种模式的概念,视野可开阔很多,更容易把这个东西放到历史里来阐释。历史并不是阐释后就完成了,因为我们在这过程中不断地阐释它;这个过程我们也要去分析。还有苏珊曼那篇《亚洲妇女神话》就是从大历史到社会性别史,看怎样对妇女的不断建构过程。

杜芳琴:“妇女地位”的概念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学术层面,一个政治层面。当我们说“地位”时,即使是学术研究,也更多地受政治话语影响。无论是马克思妇女观,还是20世纪那些文化人(思想家、学者)做的妇女研究,都是从改变中国的落后状

况,从现代性考虑提到这个问题,陈东原那本《中国妇女生活史》就是典型的“压迫-反抗”模式。最近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是批判陈东原“地位”论的。文章不同意中国妇女受压迫,名字却叫“古代关于礼教中妇女地位述评”,一开始就批判,其实是用“地位”批判“地位”。从陈东原开始,从社会的角度,从改造中国社会及改变妇女受压迫地位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压迫-解放模式,这个模式对我们现在还是很有影响的。至于妇联在妇女解放层面、政治力量的代表和联合国的妇女地位的指标,可以归结为政治层面。作为学术,每个时代,妇女史研究都有各自的背景,但围绕“地位”问题研究都是相同的。

邓小南:在当代不可能只用“地位”来概括中国妇女,古代也困难:一个是资料不足,在一个大的历史变迁中,情况非常复杂,你怎么能够用现代人那种理性的量化指标来衡量古人?比如本书中说唐宋两代的妇女有一个变迁,主要就是说女性与国家的关系有一个断裂,唐朝女性户主是可以受田的,宋朝的妇女就没有这种关系了。事实情况不是如此,宋朝的时候很多女性是可以拥有田产的,但是唐朝时在均田制背景下,女性受田掩盖了很多事实。这种简单的划分就很值得怀疑。再一个就是指标的问题,确定了指标以后,就会对“地位”这个概念产生上升或下降的一种假设。这中间还涉及到一个妇女史的分期问题,如果认识到妇女在历史上的多样性,用这种上升或下降就不能来概括,特别是关于妇女文化方面的特征,就很有局限性。

高彦颐:我们现在对“妇女地位”这个词有不自觉的认同,并在这个词的前提下搞研究。妇女地位是个很复杂的词,有必要

探究这个词背后的东西,它是怎么样产生的?由谁提出来的?我没有作过研究,但我觉得很可能是男性提出来的,是不是无意中男性做了代言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词最好少用。历史很复杂,差异很大,在研究时,做某个点,在考察它的具体情况,最好不要一下子做结论。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知道对不对。

许曼:能否这样看,“妇女地位”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它的真正内涵,像王老师说的,忽视了它的差异性。“地位”讲的是相对性问题,它的内涵很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但是在我们文章里看到的東西,主要在政治、经济方面。妇女地位包罗这些东西,每个都需要研究,但目前我们的研究程度没到那种地步,没有到这个水平,不是妇女地位这个话题能不能成立的问题,而是对它的认识把握存在误区的问题。

高世瑜:我有两个担心,第一,我们还有没有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比如说,有时我们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但历史上的妇女有她的心理感受,我们现在说守节很痛苦,但是当时她可能就觉得很高兴,也很自愿。再比如说,我们认为妇女参政是妇女地位的一个标准,但是很多妇女不愿参政,她的心理感受是参政我才累。所以我就担心,现在对这个东西还有没有标准?第二,妇女群体会不会被瓦解?我在1998年北大会上,提交的论文中第一次提出“差异”问题,在这之前是把妇女作为整体提出的。我从五个方面提出妇女的差异,这篇文章将在“中国社会史论”上发表,我把差异具体分析为时间、空间、地域、民族、阶层、文化各个方面。后来我看了我们的书,包括这两天讨论的问题,现在

我发现差异划分太多了,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每个女性都是一个个体,最后又没有了一个性别总体。妇女还是不是一个共同利益整体?这会颠覆整个妇女史或性别史。我就有这两个疑问,还没有定论。

高彦颐: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总体,还是要有一个历史化的时间变迁的观念,不然的话,妇女史就写不出来。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怎么样处理这个脉络问题?我接着一平的观点讲。我是学明清史的,从开始就要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明清被看成对妇女的残害最厉害的时期。但是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唐、宋时期的才女很少有在自己有生之年出版自己的文集,而明清时期女性出版的文集有两千多,其中有大量的诗文集。这怎么解释?不是说地位不能看,也不是说地位不能比,我觉得地位高低、变好了变坏了,最后还是要总结,不然将来我们的研究要往哪里走?上面大家也谈了,看地位不能光看上层建筑、法律地位,把《大清律例》里头男女地位比较一下,或者说《列女传》里妇女越多,妇女地位越低。对我有启发的是,不讲地位,而讲社会性别,因为地位定得很死,如认为明清妇女地位明显下降。我们从具体的社会生活层面看一个女人,比如说我研究沈宜修一家三个才女,从法律地位上看沈宜修,她们一家在吴江,肯定和宋朝的上层社会家庭是比不上的;可是你看具体的生活,一个女人同时可担任各种角色,如沈宜修,她为人妻,同时是八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姑姑,别人的朋友。其实一个女人同时有很多社会角色、位置,这个位置,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一生中不断地改变角色,一个女人不是说就只是“妇女”。假如太过分地去用差异

把妇女划分太多,就无法研究,妇女史就不成立。我觉得应先整理差异,先认识到一个人同时可演不同角色,不同角色有不同的权力,有些角色让她有一定权力,有些角色将她永远压在下面。这样比较整理后,再用妇女总体概念涵盖,这可能会兼顾差异与妇女整体,妇女整体的利益和统一性,这个不会有矛盾,可共存。

鲍晓兰: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第一,是话语形成,“地位”这个词后面有很多话语形成,现在我们要“地位”了,实际上后面有没有话语形成?也有的,随着时间不断推进,以后的人也会说我们不要“地位”,也是一种话语的形成。还有一个,我对“地位”不感兴趣,社会性别的形成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为什么我们总是对“地位”感兴趣?我看了一篇文章,解释说是因为我们总想着变化,它比较振奋人心。而这种变化是形式还是质的变化?实际上如果从质变看,社会性别的关系或用父权或男权性质看的话,没有很大变化,但形式在变。这需要从不同角度研究,政治的、文化的。另外还要研究妇女的不同,这不仅要研究不同群体妇女的不同,还要研究相同妇女群体里的不同,还有同一个妇女在她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另外一点,我们总是用社会身份来看妇女的不同,其实不同妇女的主观意识是不一样的,她们有时不被其社会身份决定,而有自己的选择。而且,每个人有很多社会身份变化,所以一个妇女可以采取不同的身份,看在什么情况下。另外,她有主观选择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研究没有允许她有主观选择的机会。这些都很复杂,很有意思。一想到这些复杂性,就有一个断代的问题。

王政:联合国做世界各国妇女地位统计有很多指标,提出一

些以前我们忽视的问题,把我们国家放在 136 位,我不能接受;而中国妇联想把我们放在第一位,也不现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高、低就可以表述的。现在有人问“改革开放后中国妇女的地位是否提高了”?这种问法就不对,你假设了一个整体,忽而高了,又忽而降低了。没有那回事!你必须看是哪个妇女,哪群妇女。再者,妇联经常提“改革给我们妇女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却不问对谁提出了挑战,对谁提供了机遇。所以,这种提法就把我们限制住了。如果具体看,就讲今天,从社会性别看,有很多性别观念是倒退了,但不能光看观念层面的东西,不能说 80 年代后,社会有很多陈腐的东西出现,中国妇女的地位就下降了,不能这么说!因为还有其他种种因素确实使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而且使她们做了很多事情。从历史上看,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量化本身是一个应该质疑的问题,它不能概括活生生的现实。

杜芳琴:我也很疑惑,都分开了,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要写多少种历史?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变换一下概念,除了社会性别角色,还要有多重身份。当你没有“社会性别”视角的时候,把社会性别从阶级、伦理系统中分离出来,是一种进步;当我们有了“社会性别”时,再把“差异”找出来,又是一种进步;有了差异后,再综合,是流动多元的一种思维方式,这又是一种进步。这是人类认识深化的结果。在具体操作时,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分析她们的具体情况,作为社会性别以及多重的社会身份角色,把这群妇女放到她们的生活背景、情境以及各种复杂的关系中,把这种关系、过程的复杂性揭示出来,我们的妇女史也就完

成任务。我们不是判断地位高与低,这个东西摆在那儿,按历史线索递延下去,把途径和画面给读者揭示出来,这本身就在搞清楚了。

高世瑜:对“地位”这个问题的分析我同意,但我们现在还需要不需要价值判断?这必须是个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写东西没有价值,例如缠足,我们现在认为是对妇女的严重摧残,而当时她的心理感受却是很愉快,因为这件事会让她嫁个好男人。那么我们是以她的心理感受去判断,还是以我们的观点去判断?我很困惑。

杜芳琴:她为什么会嫁个好男人?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还是家庭阶级地位高,或是她运气好等等,把这个过程揭示出来,也就可以让人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嫁个好男人。另外,“好男人”又是十分复杂的社会性别构造。

高彦颐:是这样,如以缠足为例,你可以描述它非常详细的过程,但后来,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后写了一个完全描述的过程,而无法进行任何价值判断,这也比较麻烦。就是说,我们对缠足这个问题,只能用中性的词,而不能用任何带有判断性的语句。

吕美颐:我讲缠足,实际上有价值判断,我觉得是:第一步,现代的观念是,缠足很丑,很痛,我们现在怕痛,而过去的人没有办法,她们觉得很美,是身份的象征。我现在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明朝会出现这种审美观念?为什么在明朝女人只靠婚姻才能往上爬?这个性别分析看到男女不平等。男人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通过科举,而女人只能靠男人,这就可看出我们的判

断。可当时她们没有感觉,所以女人都觉得缠足很美:我把脚缠得很小,我就有价值。这个我们要批判,批判的是她们的无可奈何,在那种性别、权力分配非常不平等的情况下,只能用无可奈何的手段来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王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就会一概称之为“愚昧”“素质差”。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评判,就要把她们当时的社会结构、历史背景、文化和她的感受都挖掘出来。我可以理解这些,但我不一定认同。今天也一样,许多女人还是通过外形的美改变自己的社会生活地位,所以你对当时的理解更透了,今天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也是它的反映,包括我们的价值观,让你理解这种社会性别制度还是延续下来了。你甚至可以看到今天,并不是我们今天就解放彻底了。这种社会性别制度的延续性可以被揭示得很清楚。

杜芳琴:这是更狡猾的价值判断。其实在选题时就有判断了。

王政:我现在接着晓兰讲的“地位”是建构起来的,咱们今天来批判地位中心又是一个新的话语,一点都不错。为什么我提出“地位”的概念有问题?因为学术界近些年来新发展起来的分析范畴,更能帮助我们认识到很多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对比中才能看出,“地位”作为一个世纪以来的范畴确实有些不管用,新的分析武器产生了,这种新的武器比较好使一些。我们每个认识发展后面都是有话语的东西,学术界的这种话语,理论界的这种构建,我们完全是清醒的,越清醒越好,清醒才知道现在的东西也不是绝对真理,不过在现阶段你觉得它对你的认识有帮助,

但是现在这种认识范畴也是有局限的,必然会有局限,那你这种清醒的认识必然会帮助我们去探索,更好地去认识理论范畴的东西。

杜芳琴:这样,对理论的权威迷信就给打破了,谁也不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绝对权威。

王政:对,也不可能掌握终极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高彦颐:不是经济解放,你参加工作了,有了收入了,地位就提高了。公与私、内与外,这两对词如何引用到中国历史,帮助我们解读史料? 妇女、家庭、家族制度具体的历史意义,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不仅是我的观点。在明末清初,从皇帝眼里看家庭、家族,还是属于私的领域,不大去干扰;可是到了乾隆年代,很明显把家庭当做最公共的领域,所有政治、天下大事,如果要改革的话,先从改革家庭开始,先要注意女教,母亲的道德修养及她的教育。所以,家庭本身是公还是私,它代表的文化意义是什么,它究竟是内是外,都会因时空而变化,也不能笼统地谈中国家庭就是私,前近代是公,到了近代就成了公私分明,变成了私,没这么简单,越讲越复杂。在国外开了5到10年的会,都是讲公和私与现代性的关系,牵扯到公民社会一大堆。

杜芳琴:“女主内,男主外”最早是在哪个文献里出现的? 宋儒,先秦诸子,易经都没有明确记载。这是个空间概念,不完全是性别分工的话语。“主中馈,无攸遂”,“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可从文献上探索,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

定宜庄:“女主内,男主外”,这是个事实。我前几年做调查,

在××镇做了访谈,有一个被划为地主的媳妇,就在1949年到1950年,她对门就是镇街道,可是她不经公婆同意是不准出门的。若迈出去,你就别吃饭。可见在乡镇里对妇女束缚得就很厉害。我又访问了镇上卖蒸馍的妇女和卖土布的妇女,她们一年到头在镇上抛头露面,可见情况是不一样的。

杜芳琴:“礼失存诸野。”上层很乱,下面还执行着呢。又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从制定到执行有个过程,这个问题挺矛盾复杂,也是个变化过程。

郑永福:听了王政老师讲“地位”问题,对我启发很大。我的理解是不能光谈“地位”,但“地位”还是要谈的。不平等就是“地位”问题。以往“地位”用“臭”了,我建议用“位置”,这样,空间就会大,不只是高低。我们习惯了一种思维的路子,那样写省事,省脑子,而且有现成的套数。比如,写到抗日战争,写到国统区,脑子就想“地位低”,于是围绕“低”找材料,如女工失业了等等,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好写呀!谁能说错?例子没问题,但没有展现妇女的真实面貌,没有解决问题。如果有了社会性别视角,就会有新发现。历史研究常新,凸现新的就是价值。去年我还很不接受,沉思后觉得很有道理,不是固定的反对还是接受的问题。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就冷静得多了,比如研究服饰,妇女服饰有什么变化?比如由蒙袍变成了旗袍,由妓女的旗袍变成饭店的旗袍。扩大眼界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重审我们走过的路。至于还有无客观的评价指标,写书没有标准,不成了“一地鸡毛”了?

定宜庄:咱们也得把鸡毛串成掸子呀!

郑永福:鸡毛每根都有价值,串起掸子有了系统;定老师还发展说:掸子是死的,咱们得让它成为鸡呀!

定宜庄:写历史总是带着现在理解的标准。满族入关过分强调贞节,就是为了避免别人说他们是夷狄,老例儿更多,也是向汉人学的。

高世瑜:这两天讨论加上看书,明白了许多,但不要走上另一个极端,太现代,解构,无所适从,完全没有价值判断。我们作为主体,还要有一个标准。另一点,不要太细化了,应有一个总体评价。

蔡一平:历史具有复杂性,但要防止把复杂性简化到只有“复杂性”了。

臧健:将“地位”作为惟一的标准,仅限于政治、经济地位,从我综述的文章看,一个是婚姻,一个是财产,别的视角就没有了。应看到以往“地位”的不足——大而空,从上而下;先有“地位”的概念,再找材料。90年代以来,谈“地位”的文章减少,说明人们已不满足谈空而简单的了。高世瑜刚才谈到没有地位来衡量是否就缺少了标准?实际上有,总会在棋盘上有一个与男性相对的位置。现在研究的视角宽了,从不同的方面看地位,从生育、服饰、居住、绘画、诗词各个方面看,不是单一的政治、经济的,而是一种综合的。比如我研究家法,结论是宋代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确实比明清地位高。

杜芳琴:不能“地位中心”论,也不能将“地位”视为新“禁区”。社会性别不是只写妇女,也应写男性气质的建构,如科举制如何改变了男人,历史上男性如何发女性的声音。不是男人

压抑妇女,在社会性别制度下,男女都受到不同的压抑。

吕美颐:说实在的,只有在这次会上我才有点信服用性别视角分析问题及其意义。以往在理论上能接受,但实际中很难运用,且没有合适的范例。这次高彦颐老师的讲座对我触动很大。我研究缠足很长时间了,但是很浅,深入不下去,为什么?因为视角太单一,只是“妇女解放”的视角,简单地把妇女缠足视为各方面对妇女的压迫,放足就是解放。高老师的研究则是在妇女解放之外从文化视角和更多的视角来看。我们将要写的书也应使学生看到妇女在历史上还有这么多的活动,正如赵老师说的,使隐在历史背后的东西浮现出来。还要使学生知道看妇女不止是一个地位高低的问题,还有更丰富的内涵。王政提出的问题切中要害,我是沿着“地位”的旧路走过来的,只用这一个范畴来分析妇女,走入死胡同并僵化了。从近代妇女史研究看,一二十年来,文章很多,没有新意,有走投无路之感,不仅是没有史料的突破,主要是没有方法的更新。同样的议题材料,高老师看到了更多的本质。确实应该有一个高远目标,有这个追求;不然就更达不到了。

(本文是作者2000年6月13日在妇女史研讨班上的讨论稿,由王文霞、李光华、杜芳琴根据录音整理而成)

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

这一题目是我在美国给研究生上课的课程名称,这门课要上近四个月,在这一小时的讲座中我只能挑一些概念来谈一下。我想把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概念问题化(Problematize),首先我想对中国现代性的概念做一个界定。我在这儿说的现代性(Modernity)是指自19世纪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遭遇之后产生的一种历史观、世界观,也指中国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后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它不仅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变化,也体现在物质生活中。这儿我主要谈前者,看历史观的变化及其文化意义。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是一种循环的历史观,而现代性的历史观却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的、直线性的进化史观。知识的生产有其特定的历史政治背景,进化史观是使西方帝国主义殖民行为合法化的一种观念。这种进化史观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欧洲为中心、为历史发展的准绳,来界定文化间的等级差异,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国是“先进文明”,而与此模式不符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则是“不开化的野蛮”国家,殖民行为被解释成“文明”对“野蛮”的驯

化。除了“文明与野蛮”、“高级与低级”的等级性界定,进化论也是一种文化普遍论,各国各民族多样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形态被抹去,以欧洲的社会发展历程作为惟一合理的发展模式,即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进化史观被不断介绍引进中国,对近代中国人的历史观、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近代以来产生的大量文本中可以发现,无数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梦想就是要达到欧美模式所界定的“高级”或“先进”文明形态。这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而且被社会精英付诸实践,改变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形态。那么这一过程与社会性别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对现代性的讨论有很多著述,却很少有人从社会性别角度探讨。在做这样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因为它对中国的学术界还是个很陌生的概念。

“社会性别”(Gender)是在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出现的一个分析范畴。女权主义学者在探索将妇女的从属地位理论化时,曾借鉴过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但显然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阶级与性别的问题有许多不同之处。女权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展了“社会性别”的概念,提出社会性别是人类组织性活动的一种制度,同任何文化中都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样,任何文化中也都有自己的社会性别制度,即种种的社会体制习俗把人组织到规范好的“男性”“女性”的活动中去,社会性别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组织方式,也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内容。也可以说,人的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过程。社会性别的规范无处不在,其内涵也不断在变化。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同一文化中不同历

史时期社会性别的具体规范也会发生变化。尽管在大部分文化中社会性别被用来界定性别的等级,如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就是男尊女卑,但是也有的文化中性别间的等级差异很小。当然在中国的等级秩序中除了性别还有辈份年龄等等因素在交叉起作用,这意味着在同等社会阶层中女性并非总是处于卑者的位置上。但是在文化层面,社会性别的等级含义会不断被调动起来,被各种文化或知识生产者复制,从而不断巩固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观念;而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性别文化观念、语言、符号又时时在有力地参与对人的主体身份的塑造,构成人们对下述问题的基本认识和认同:自己要做什么样的男人或女人?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应该是怎样的?对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的人持何种态度?人们对社会性别文化对自己的规范和塑造一般没有理性和意识层面的认识,但任何人都被某种或几种社会性别话语所构造,人的主体是社会性别化的,并可能具有不同社会性别话语所造成的矛盾性、多面性。社会性别文化观念也经常体现在人们所作的各种选择和决定中,包括政府或各种权力机构的决策。在当代女权主义学术发展了三十多年的西方,“社会性别”已经与“阶级”、“种族”一样成为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分析范畴,在各个人文社科学术领域被广泛运用。因为中国学术界对这一概念了解很少,今天也借此机会将这一概念介绍一下。下面我对中国现代性做一个社会性别的分析。

自七八十年代以后,现代性的问题一直讨论得非常热烈,而对社会性别的讨论却很少。但是现代性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应该引起学者的关注。一直

有一种说法：中国妇女的解放是由男性提出的，中国妇女是被动地由男性解放的，这体现了中国两性自古以来的“阴阳合和”。对近代以来的社会性别关系，我要做个不同的阐释。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会知道，“阴阳合和”是一种理想，而“男尊女卑”则是由一套社会体制和规范维系的社会现实。那么如何理解近代知识男性率先提出妇女问题这个现象呢？古代中国，家国同构，“家”为“国”之基础，“女”在“家”中的重要作用也因此历来为士大夫所注意，从周易开始，就强调“女正，家正”。而要“女正”须先“正女”，这“正女”的任务就由士大夫主动承担，诸多的家训、家规以及士大夫家书中都包含了大量的“正女”内容。换言之，中国的士大夫们有着悠久的、持之以恒的“正女”传统。到了近代，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在国家危亡之际，男性知识精英又因对“国家”的关注而把焦点集中到女性身上。比如，将中国的软弱归结于中国的“种气”不强，进而归因于女性身体的软弱（“小脚”），因此要改善女性身体来实现“强种保国”。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废缠足运动便由此产生。再如，梁启超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弱于欧洲，是因为“二万万女子为食利者”，二万万男子生的利，让另一半不劳而获的人口给分了，这个国家怎么会强呢？所以要兴办女学，让女子也有一个生利的技能，成为国家发展的人力资源。对妇女在历史上的经济作用持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知道费孝通早年在《江村经济》中明白地报告过，妇女在家庭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长期的农业经济中女性的劳动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非常关注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作用。美国学者曼素恩所著的《珍贵的记录》一

书中研究了清政府对女工的关注,指出妇女所从事的家庭纺织业是清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总之,梁启超在提倡女学时否定妇女的历史作用和贡献是有失偏颇的。这并非特殊例子,因为女性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女子既被说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又被再表现为民族落后的象征。男性提出妇女问题(妇女是“问题”),是为了寻找一条强国的途径。妇女是载体,是手段,强国是目标。

国家民族主义的产生与社会性别密切相连,在当时以及以后的历史过程中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从康、梁到新文化运动时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对妇女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新青年》第一期就开始谈妇女解放问题,到了“五四”时期,谈论妇女解放更是成为一种时尚。在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讨论中,有一条线索是来自欧洲的人权思想,认为在现代文明中,人权应该包括女权。但是也有很多男性所强调的是“改造妇女”(而非“解放!”),文章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厌女”、“仇女”的倾向,贬低妇女的词语更是随处可见。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成为攻击的对象,作为三纲五常之一的“夫为妻纲”以及“男尊女卑”观念都成为重点抨击的问题,与妇女相关的缠足、包办婚姻、童养媳、不让女子受教育等问题都被作为儒家“吃人”礼教的典范,被提出来批判,进而达到摧毁儒家传统的目的。对妇女问题的大讨论确实揭示了中国社会中的社会性别等级和歧视束缚妇女的种种弊病,但是这个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大讨论也有其缺陷:男性精英们居高临下地看妇女,把妇女视为素质差的群体,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抹杀了妇女在中国 5000 年文明中的作用与

贡献,对妇女做出一种非历史的界定。当时大部分参与讨论的知识男性缺乏一种自省,不能反思要改变社会性别关系,男性需要对自己的特权位置做什么样的挑战和调整。而同时,20世纪初正是西方女权运动高涨的时期,女权运动被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看成是西方先进文明的一种象征,这也促使以西方文明为追求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竭力鼓吹女权,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视为现代性的鲜明标志,促使那一时期的女权“声浪高涨”。当时的女权主义话语中也有女性的声音,《妇女杂志》等刊物上都曾发表了那一时期女性的声音,也有许多女学生自己创立刊物,成立女权运动组织。但是因为当时妇女在文化程度和社会资源方面的限制,能够发出妇女自己声音的刊物并不是很多。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妇女的解放是被动的,近代自秋瑾以来的众多女性为追求自身的解放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经受了无数的挫折与磨难。在我撰写《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一书时,采访了“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对20世纪初期以来妇女的不懈追求和抗争有深切的体会。可以这么说,若没有20世纪初几代妇女勇敢地突破种种性别藩篱、为女性开辟出各种社会空间,20世纪下半叶中国妇女在社会上的发展会是难以想像的。连“五四”时期鼓吹女权的新文化男性知识分子也明白,若没有妇女自己的身体力行,妇女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

20世纪初的女权呼声中,有多种多样的声音。清末革命者金天翮在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一书中对女子作了重新界定,其实是对“新女性”提出的规范,成为一代人的行为准则。他反对把女子培养成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提出教育应把女子培养

成革命的新人。他呼吁受教育的女性应成为：一、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总之，在金天翻对 20 世纪新女性的展望中，打破了儒家传统中贤妻良母的规范，着力提倡女性应该像男性一样进入公共领域，发挥“女国民”作用，成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力军。他所鼓吹的女界革命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也很有震撼力，对当时一些希望打破社会性别藩篱的女子有相当大的激励。但是由此而开始的以男性为模式为准则的妇女解放也是有问题的。周作人在 20 年代曾经提出了批评，他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阐述妇女解放问题，他说：“现在的大谬误是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赞扬女性之被动，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实为有失尊严，连女子自己也都不肯承认了。”这种以男性为标准的妇女解放一直延续着，“不爱红装爱武装”实际上包含了秋瑾的“影子”，它表达了 20 世纪初那几代革命者的一种理想。“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但是没有人问“女同志能办到的事情，男同志能做吗？”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其结果是，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社会资源和权力也依然由男性掌控，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从“五四”时期的女学生到“不爱红装爱武装”，女装的变化也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想像。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时髦的内涵常常表达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和规范，但是其内容是变化的、不固定的，今天的时髦反映了我们今天现代性的想像与追求。今天的社会对女性要求有“女人味”，做“贤妻良母”又成为“女人味”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有权势的男性特别热衷于鼓吹让妇女回家承担“相夫教子”的角色。此外，在许多所谓“成功”的男性在变相地实行多妻制的同时，男性对女性的贞操却念念不忘，这实际上是对“五四”时期女权话语的一种反动，也是当代一些男性力图巩固自己性别特权的一种运作。我们在指出“五四”女权话语有以男性为准则的偏颇的同时，也要看到今天“女性味”话语对儒家传统性别规范的回归的负面意义，这种回归在社会经济文化都已经变化了的当代中国显得尤其具有讽刺意义。当代中国女性既被要求参与创造现代性的国家，又被赋予传承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重任”，即保留和体现“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我们需要思考：现在传媒中所表现的作为现代性符号的“现代女性”有何问题？是如何制造出来的？这种再表现符合哪些人的利益，又损害哪些人的利益，对女性群体而言又有何影响？社会性别话语在制造对女性的规范的同时也在制造对男性的规范。所不同的是，对男性来说，近代以前以孝、忠、悌为衡量男性的标准，而现在，知识男性不提保存“东方男性的传统美德”，追求“西方的男性气质”却成为中国男性的目标。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过程中产生的对男性的进攻性、竞争性的推崇成为当代中国人界定男子气概的标准。如果说“女性味”的社

会性别规范会束缚女性的发展,那么以西方男子气为标准也会使中国男性产生焦虑和感到压抑。壮阳药的巨大市场就是一种表症,反映的是当代文化制造出来的男性性焦虑。确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对现代性的想像中充满了社会性别含义,表达了在全球权力等级结构中处于劣势的中国男性精英的内涵复杂的焦虑感。

今天介绍“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是希望我们在看问题时能够多一种视角和分析范畴。文化,包括社会性别文化是人的建构,它同时又塑造了文化中的人。多一种分析文化建构的工具,将有助于我们增强抵抗强势文化控制的能力。

(本文是2002年12月9日作者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讲座摘要,原载《文汇报》2003年1月12日)

关于 gender 的翻译

昨天有位老师告诉我说,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性别”这个翻译法是多余的,没有必要,中国的“性别”本身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引入“社会性别”结果把我们搅混了,把我们对中国的本土认识搅混了,因为我们中国的“性别”和西方的“性别”是不一样的,所以用西方的社会性别理论多余。她问我对这样的观点怎么看。当时我们在路上说话,没有时间充分讨论。其实她的问题非常有意思,值得认真探讨。

把 gender 翻译成“社会性别”,我们海外中华妇女学会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的。在我们之前,国内一般把 gender 翻译成“性别”,包括世妇会,官方的文件翻译也是如此。而在我们翻译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我们一直是译成“社会性别”。在中国介绍和推广“社会性别”这个理论上我们学会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所以我想从翻译介绍者的角度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在《“女性意识”与“社会性别意识”辨异》中对“社会性别”这个词有较多的解释,此文发表在 1997 年第一期的《妇女研究论丛》上。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背景下,我们知道语言的重要性,人的主体建构

和语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个语言是广义的。在我们的学科背景下,我们对每个词非常慎重。对关键词的翻译,更不是信手拈来,而是反复考虑的。

为什么用“社会性别”来翻译 gender 呢?首先,我们关注到英语世界学者对 sex 和 gender 的讨论过程。为什么她们要开创出一个新的词 gender,而不用以前的 sex role?在早期的时候西方学者较多地用 sex role,社会学领域中 sex role 用得很普遍。但是到后来为什么觉得 sex role 还是不能说明问题,要用 gender 这个词?正是因为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表达一种新的认识。盖尔·卢宾在她的 *Traffic in Women* 《女人交易》中,已经把前期讨论的认识提高一步了。她看到不光是“我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sex role 讲的还是女人、男人扮演什么角色),而是看到在人类社会中有的一套组织人类性的活动的方式和机制。她这种认识是受了马克思的启发而产生的。马克思是讲人类的经济活动,他对商品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的流通、对劳动的组织、劳动力作为商品、剩余价值的产生等等过程做了细致分析,从中阐明阶级的产生过程。在他的分析之前,没有人这样用阶级的概念,但不等于说这之前没有阶级。他分析之后,学者们认为阶级作为一个分析范畴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时期中,阶级关系以及表现形态不尽相似。

女权主义学者对人类社会的性的活动和组织做了分析,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就看到以前我们没有一个词来界定人类对性的活动的组织,而且在这个组织中间怎么就把人规范成男人、女

人,有一整套体制,婚姻制度也好,性的制度也好,家庭制度,性别的劳动分工等等,都涉及到把人怎么规范起来、组织起来。人类活动不光是吃饭,咱们老祖宗早就说“食色”,不光是“食”的问题,“食”是一个经济活动的问题,还有“色”的问题,就是性活动。人类性活动是很丰富的,内涵也是非常多的。在各个社会中它如何被组织,在女权主义学说之前没有谁做过系统的理论探讨,当然有很多的记载,小说、叙述都有,那太多了,这是人们的基本活动,有太多的描述,文字的或视觉的、实物的。但是作为理论的阐释,把这一套活动和社会造就男人女人的关系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学术之前是没有的,所以当代学者就用 gender 这个词来标识这一大套的理论认识,标识社会把人区分为男性、女性的各种机制和过程。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中都那么明显地规范男性、女性的界限,更不是所有的文化或历史时期都对男性女性做出相同的规范。但是不是说因为规范不同就不存在社会性别机制?不是。不同内容的规范其实是表达了不同的社会性别机制。各个学科领域的大量研究都是努力探究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时期中,从对男女的不同规范要求表现出的不同的社会性别关系,或不同的社会性别机制,或这些关系和机制在社会经济政治变迁中的变动状态。当一些社会形态不是卢宾所研究的那种亲属社会文化(女人被直接交易来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时,男性女性的规范是通过什么机制来维持和巩固的?对男女的规范和界定作为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对社会经济政治各个层面产生作用的?在卢宾之前和之后都有大量的研究。今天在国际上“社会性别”不仅是理论概念的标记,也已经是一个学术领域了。

我们在翻译中觉得,如果我们用“性别”这个词,就不能表达出这一大套的理论和那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所做的探索,不能把背后蕴藏的理论含义表达出来,我们非得也创造一个新词。英语国家的学者创造一个新词也不是凭白无故的,她们是希望能够表达一套新的理论概念,所以我们觉得,“社会性别”可能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词,它既跟性别有关,又与我们汉语中所理解的“性别”有很不同的含义。

另外还要强调一点。用“社会性别”这个中文词来翻 gender,我们觉得是不满意的。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也谈到,因为强调的还是性别,而不是社会文化机制。这就是翻译中无可避免的问题,翻译一般难以做到非常贴切,特别是当一种概念在另一种文化中没有对应物的时候。比如他有面包,我也用烤箱做个面包,他那个 bread 我们就翻成“面包”,那还比较贴切,双方对同一个东西的理解没有什么误差。但比如我们的饺子,英文就比较难翻,他们没有饺子,用意大利的 dumpling 总归是不对头。两个文化中不同的现象出现,你不能找到对应,硬造一个词出来套,总归有距离。这种文化的隔阂是非常难完全跨越的,不要说概念性的东西,就是食物有差异也难翻译。这是翻译上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只是希望用一个词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个新的词,代表一种新的理论、新的概念。

那么是否中国的“性别”二字已经具有“社会性别”的含义,所以就不需要用“社会性别”这个词了呢。这里有两层意思需要辨清。第一,“性别”二字并不包含“社会性别”所指代的新的理论探索和成果,起码是在我们开始翻译介绍 gender 这个理论概

念的时候,“性别”一词不包含对社会性别制度和机制的认识。今天有些学者说“性别理论”,可能他们是指 gender 理论,也可能指和 gender 理论没有太大关系的论述。也就是说,gender 理论的引进造成了“性别”这个词的内涵的不固定,这是一个新现象。中国学界至今对社会性别理论还了解甚少,在短期内难以改造“性别”一词使其具有社会性别的理论含义。第二,“性别”(sex)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含义是不一样的,这点我赞同。近代以来在西方 sex 被视为 gender 的基础,男人女人的异性恋活动是界定男女的基础。而在中国近代以前,男人女人不纯粹是由其性倾向来界定的。近代以前中国人 sex 的观念跟西方近代以来对性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同性恋”一词,近代以前我们中国有同性恋行为吗?有很多,光《红楼梦》就有多处描写。而且男同性恋不回避、不隐晦,也不受歧视,从小说中看,在明清似乎颇为流行(近代以前对于女同性恋的描述很少,这个我们可以作为研究课题去考虑)。为什么近代以前我们有同性恋的行为,但没有标识性的词“同性恋”把它作为一种身份来界定?已经有一些研究关注到这个现象,并指出传统中国对男女的界定并非与性倾向相关,也就是说,性不是界定社会性别的惟一基础。

美国对性的活动,还有很多禁忌,甚至今天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即使对婚姻中的性行为也有具体的规定,这在中国近代以前是没有的。但很遗憾,近代以来我们确实从西方引进了一些概念,包括“同性恋”这个词把身份界定出来,就是用性倾向来界定人。现在国外很多搞酷儿理论的也反对这种界定,说我是不是同性恋,不应该成为界定我的身份的基础,我这个人不是完全由

性的活动来决定的,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不应该以性来界定。而近代以前的中国性文化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我们搞古代史的就比较清楚了,咱们关注的是传宗接代,男人的性活动怎样没关系,只要你能娶老婆、生儿子,能够传宗接代、延续下去就行了,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至于你用什么性的方式,跟男的还是女的有关系,用什么姿势,这都不属于禁忌之内。应该说中国男性在历史上是享受比较宽泛的性文化的。

性文化的差异和社会性别理论有关系。当代西方对性的讨论、对性的关注,确实是建筑在它自己本土历史之上的。正因为它的历史上对性有那么多禁忌,也才有福柯写《性史》。他本人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感到压抑,感到这种压迫,《性史》才能由他写出来,也才有那么多对性的探索与探讨。如果他们把性作为人的根本来界定,那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重新界定这个问题,就是对人有个重新的界定,当代的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有大量的理论探讨。在他们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个大问题,必须投入很大的精力去解构批判。

而在我们的背景下,在近代以前,起码对男人来说,性不是个大问题。这可能不光是在中国,还有亚洲文化圈。2000年我们跟韩国的学者一起讨论时,她们借用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强制性的异性恋》(Compulsary Heterosexuality,是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写的,批判西方的异性恋制度和同性恋禁忌),开玩笑说她们认为西方是 compulsory sexuality,因为西方学者花很大的理论精力来讨论性的问题。韩国学者认为西方不仅异性恋是强制性

的,而且性的问题也是强制性的,笼罩一切的。她们的提法把我们都逗笑了,亚洲人好像在这方面有同感。

我想这说明咱们的性文化背景跟西方有所不同,所以感受就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上,男人是同性恋也没关系,只要你做好儿子,孝顺,做好丈夫、父亲,你就是男人。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符合道德规范的角色你都扮演好,你就是男人。在西方,你是同性恋,就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对这个差异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如果西方的很多理论是在性跟社会性别的紧密联系中探讨发展的,如果我们的性不是界定社会性别的一个最根本的要素,那么我们是依据什么来界定社会性别的?中国社会性别的等级制是怎么形成的?这是可以探讨的一个理论话题。那么是否因为中国近代以前的性文化跟西方的不同,中国对男女的界定基于人伦关系中的名分而不是生理的性,所以“社会性别”所标识的理论概念就不适用了?甚至会混淆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我想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对社会性别理论的理解。中国对男女性别的界定不具有西方那种本质主义的认识,并不等于这个“性别”认识已经包含了对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探究和批判,而这是 gender 这个词的核心。社会性别理论向本质主义和生物决定论挑战,但并非仅限于此。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全方位地考察社会性别等级制的建立和巩固以及社会性别等级制同其他等级制之间的交叉关系,推动了这个学术领域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地大量的学术研究对我们发展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都是有启迪意义的。我们这个具有非本质主义“性别”观的文化毕竟建起了男尊女卑的等级制,这是批判等级制的理论与

我们的“本土”相关的社会文化基础。更何况,近代以来,在介绍西方所谓的“科学理论”的同时,我们早已引进了本质主义的生物决定论的认识论,当代中国的社会性别观早已是受了西方“污染”的,与古人对男女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别。“女性”这个具有生理含义的词就是伴随介绍西方“性学”在近代中国出现的。在中国经历了百年西化的历史以后,要在西方和中国之间划清文化界限是很困难的。

在这儿谈的不是哪个中文译词较准确的问题,这个话题的背后是如何看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问题,这里面很复杂。国内有学者把女权主义理论说成是霸权的话语,我不知道这样评论的依据是什么。从我们这个研讨班上大家的发言看,女权主义在中国显然不是霸权话语,我们妇女学学者还是非常边缘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霸权的看法?这与谁在介绍这些理论有关。女权主义在中国是非常边缘的,但是由我们学会成员来介绍就会使人感觉不同。因为在今天全球的权力结构中,各地区之间是等级关系。在这个等级关系中,我们这些在美国工作的人来介绍女权主义,确实有一种权力关系在里面,特别是对国内学者来说。这是我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我追求的是一种平等的理念,另一方面我所处的地域和所获的学位使我在国内有种特殊身份,有种无形的特权。这种状况会使国内一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学者感觉不好,甚至会使有些人因对我们特殊身份的反感而产生对我们所介绍的理论的抵触。如果运用福柯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的论述来看,我们的女权主义知识也可能成为一种权力,尽管我们本人不追求权力,但这种由知识造成的权力会使

有些人感到压抑,这我完全能够理解。这是我个人无法摆脱的困境。在这个情况下,本土化的口号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是非常有赋权意义的,empowerment。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女权主义能给妇女 empowerment,处在不同位置上的各类人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实现 empowerment,我们也应该允许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找到 empowerment。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妇女如果在社会创造当中觉得什么有力量,什么分析武器能让你觉得有能动性,有更大的创造性,你就去用。我们从事的决不是一种宗教,没有必要叫人家一定要相信。我们不过是介绍一种分析工具,你愿意用就用;如果觉得不好使,就不用;如果觉得别的工具更好使,你就用别的。我们自己愿意用,是因为觉得它还挺管用的,用这种分析工具能够看透一些现象,希望其他人也能用来看一看,看透了,识破了,被控制的可能性就小些。

但在用这个分析工具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论怎么跟我们的实际联系。我觉得这中间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在翻译介绍很多东西,包括办我们这个班,译介的东西比较多一点。译介的文本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这是好的地方,但是它的弱点是,毕竟这些东西是人家研究人家本土的东西,跟我们的不那么贴切。每一个理论都是本土的,都是针对它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产生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人类没有共通的地方。比如我为什么觉得社会性别理论是可以共通的?因为只要人类都有组织性的活动,都有对男性女性的界定,那在这个层面上就是共通的。但是不同的社会又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在各个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规范,几千年历史,更是变化多端。中国那

么大,上海和山西同不同啊?那就很不相同,更别说中国和美国
的差异了。差异是很多的,我们拿那些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作品跨文化来讲,必然有隔膜的感觉。所以我们做老师的、做学
者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做自己的研究,要不然,光是翻译别人
的,讲别国的研究,而没有自己的创造性成果,就失去了引进理
论的意义。关键是要做自己的研究,不光是本土的,是本乡本土
的,每一个地区都要去研究,这是无穷无尽的学术课题,有无穷
无尽的事情可以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用这些概念范畴
看看我们怎么研究自己,在研究自己的历史和现状的过程中怎
样提出有创造性的见解来,深化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归根到底就
是要做这些工作。

(本文是作者2002年12月在中山大学女性主义教学法研讨班上的发
言,由吴海玲根据录音整理,作者本人校对)

妇女学的全球化与 “本土化”

妇女学(women's studies)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高等院校出现,如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这个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已被纳入美国教育体制,在七百多所高等学校建立起妇女学教学机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不断增加。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美国女权主义挑战本土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实践活动,很快跨越国界,成为世界各地女权主义学者的实践。进入21世纪,妇女学不仅不再是美国的特产,也不局限在欧洲、北美洲、大洋洲,还遍及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于妇女学全球化的现状无需多做论证,读者只要上一两个网站便可对其概貌一览无余。^①本文要讨论的是妇女学全球化的含义,并以全球化的妇女学为背景,来探讨中国的妇女学发展前景。

为什么妇女学会成为跨文化跨国界的女权主义在学术和教育体制内的实践?原因可以大致概括如下:一,在20世纪下半叶它随着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很快波及北美和欧洲女权运动高涨的国家;二,全球化过程中东西南北的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减

少了知识沟通障碍；三，东西方或南北方之间依然存在的权力和资源不等关系有助于任何西方或北方的“发明”流向东方或南方，而反方向运动则远为艰难；四，女权主义学术的宗旨——以纳入边缘人群的经验 and 知识来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对任何尚存男性知识霸权的地方都具有实际意义；五，女权主义学术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所要分析的是以往任何一个学说都忽略的问题，即社会性别的等级制度；对于社会性别制度在各个文化中的产生、表现、发展、变化及其与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与其他等级如阶级、种族、族裔、性倾向等的交叉关系等等，这类议题是可以在各个国家各种文化中针对自己的情况来深入具体研究的，即，社会性别这个分析范畴可以跨越国界，如同阶级种族等分析范畴一样，被各国学者用于本土的研究；六，各地女权主义学者的学术活动所产生的新知识不仅要通过出版物来传播，还要通过教育体制来达到传承和发展，进而改变教育内容、改造知识生产、改变人的认知，最终改变社会文化的目的。总而言之，产生于美国的妇女学在过去 30 年里变成了全球的现象，不仅在于美国以及英语在世界的霸权地位，更主要的是这个新兴学科所体现的理念是反霸权争取公正和正义，所提供的分析工具和教学手段有助于这个理念的实现。来自霸权国家边缘人群的批判理论和方法显然对世界各地有同样追求的人们有所启发。

在美国本土，“妇女学全球化”具有另一层意思，即，改造现有的妇女学教学内容，突破妇女学对美国本土关注的局限，使之包容全球妇女的活动和经验，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做出反应。虽

然美国妇女学课程从一开始就包含多学科女学者从各个学科领域出发对妇女和社会性别的研究,虽然妇女学学者始终追求突破传统学科的界限,创造新的跨学科知识,但是任何知识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都有“本土”的限制。“妇女学”的外延小于“女权主义学术”,妇女学中心或系有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女权主义学者任教,妇女学课程包含多学科的内容,但女权主义学者并非仅仅在妇女学中心任教。从绝对人数上说,更多的学者在其他传统学科领域里从事有关妇女与社会性别的教学和研究,比如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对其他国别历史文化的研究。妇女学作为一个教学机构,它的对象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中,它的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生关注问题的制约。妇女学有大量课程供全校学生选修,而只有学生感兴趣的选修课程才可能持续开设下去。同当代中国青年迫切面向西方、急于“同世界接轨”的心态截然不同,处于世界权力中心的美国人往往认为自己就是“世界”。在资本主义生存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在个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中,在当前保守政治势力上升、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一般青年关注更多的是自己的谋生和前程。当许多美国大公司在全球追逐廉价劳动力和高额利润时,当美国取代大英帝国成为向全球扩张的新帝国时,一般美国人则缺乏对“全球”的概念和关注。在这样的文化限定下,美国妇女学课程内容过去主要是针对美国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结构所限定的妇女状况以及大学生在当代美国文化中面对的问题来设置的。美国妇女学是美国本土化的妇女学。

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对美国妇女学表现的美国政治文化的局

限性有许多探讨,并有突破局限的种种努力。在 80 年代,这种突破局限的努力主要表现在把美国白人妇女之外的其他种族妇女的经历和议题纳入妇女学。妇女学多元化的探索受到教育体制内外在资金上的支持。福特基金会于 1988 年发起了“把少数族裔妇女学主流化”的项目,赞助了美国各地 13 所高校妇女研究人员尤其是少数族裔女学者参与的妇女学课程发展活动。90 年代,柏林墙倒塌后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急剧扩张的新局势以及以'95 世界妇女大会为标志的全球女权运动的发展,使得“全球化”成为美国妇女学界日益关注的重要议题。如何把世界各地的妇女生活和社会性别状况融入妇女学教学内容,如何从全球的角度考察一个特定地区包括美国的妇女生活和社会性别状况,这两点成为突破美国妇女学局限的学科发展具体内容。1995 年,福特基金会协同全国妇女研究委员会(一个非政府组织)发起了一个新项目——“综合妇女学、国别学、国际学课程项目”,来推动美国妇女学发展全球化课程内容,要求妇女学联合学校里从事国别研究和国际研究的学者开设新课程,尤其是鼓励妇女学开设关于非西方妇女和社会性别的课程。全美 13 所大学获得赞助参加妇女学课程内容的改革和发展。美国各地妇女学课程发展如今依然在朝这个全球化的方向努力,一些规模较大的妇女学中心或系不断开展各项研究和实践的课题,推动课程改革。如笔者所在的密歇根大学正在开展一项全球女权主义口述项目,联合了其他 3 个国家的妇女学者对本国的女权主义活动分子进行访谈,所得访谈录像录音将纳入四个国家的妇女学教学内容,以此来形象地向学生展示和比较全球各地多样

的女权主义议题和行动。再如,马里兰大学联合了其他5个国家的妇女学机构共同研讨妇女学课程全球化的具体措施和内容,包括各国教师和学生的互访交流。这些国际项目都特别关注与非西方国家妇女学者的合作。^②

美国妇女学全球化的努力所体现的是女权主义学者对美国在全球权力结构中所处的霸权地位的警觉。美国的霸权地位影响到美国人的经验,影响到美国人的主体身份的建构。处于全球权力结构中不同位置上的民族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经历,如何理解各国妇女不同的社会性别经历?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差异背后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引进非西方妇女的经历时避免不要仅仅是“添加”非西方妇女,而是真正改变西方中心的立场,在美国的课堂上突现非西方妇女的立场观点和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的批判视角?选择什么样的教材才能在提高美国学生对殖民关系的认识的同时不再复制这种殖民关系?这些是美国妇女学学者清醒地意识到的具有挑战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此外,她们还特别关注急剧发展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给各国妇女带来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商品全球化、消费文化和文化生产等过程与社会性别的关系,包括伴随倾销西方商品而建立的西方男性中心对女性的垄断审美观对全球各地妇女身体的掌控和摧残。女权主义学者在批判其他全球化理论的社会性别盲点的同时,强调在全球化研究中关注阶级、种族、族裔和社会性别的交叉关系。一些反映非西方底层妇女的生活和斗争的视觉和文字材料被妇女学教师用于课堂教学,如记录片《全球流水线》,表现的是跨国公司对亚洲诸国底层妇女的剥削和女工们的反抗。类似的

纪录片和阅读材料以形象的例子帮助美国学生认识在全球的等级结构和新殖民主义关系中,非西方的有色人种妇女是跨国资本攫取高额利润所寻求的最廉价的劳动力,并促使学生思考行动方案。美国妇女学学生参与反抗跨国资本对非西方妇女的剥夺的一个例子是,90年代中期美国女权主义团体通过媒体暴露了一些接受耐克公司订单的厂家在亚洲地区对当地女工的残酷剥削,美国各大学的妇女学学生和妇女团体组织起全国范围的校园抵制耐克产品的活动,迫使耐克公司采取行动正视亚洲女工的权益问题。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各国女权主义如何结成联盟形成一支有力的全球批判抵抗力量也是妇女学课程关注的议题。^③

妇女学全球化的课程发展在美国尚处于初期阶段,其反对西方中心的实质使妇女学保持了批判美国主流文化的前沿地位。这种学科中的开拓性行动自然会遭遇先行者的困难和障碍,不仅有前面提到的理论性和智性工作的挑战,还有具体物质限制,包括对新课程教师的聘用和新教材的生产(对全球化研究项目的经费支持等)。可以想像,这个课程改革在各高校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取决于各个学校的妇女学师资力量,也与各个学校的政治文化氛围密切相关。总之,美国妇女学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其教学内容决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美国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妇女学学者认识的变化而不断推陈出新。对课程内容“全球化”的追求正处在当前的“出新”过程中。

美国妇女学全球化课程发展对我们正在进行妇女学学科建设的中国学者有什么意义呢?由于中国妇女学的建设是在改革

开放后出现的,从一开始就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女权主义实践的启发,并引进了不少美国女权主义学者的理论著述,中美妇女学者也有许多直接的交流,可以说我们这个正在崛起的新领域与美国妇女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既可以是推动我们发展妇女学的力量,也可能对我们的学科发展形成一定的局限性。美国妇女学的长期实践和女权主义学术的丰硕成果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和资源,这无疑是已经发生和会继续下去的情况。但是如果它成为我们借鉴的惟一来源,那就可能限制我们的视野。如前所述,美国妇女学是本土化的妇女学,它要解决的问题与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我们在许多方面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情况相似,但是受语言和资源的限制,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妇女学学者却很少有交流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同美国女权主义学术的密切关系本身就是全球权力结构的一个表现。那么,身处现存的权力结构中,我们如何在保持这个密切关系的同时在我们的新兴学术领域中不去复制或巩固西方中心主义?美国妇女学全球化行动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和警觉。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自己在全球化背景中出现的妇女学课程如何面对全球化?显然,在中国主流话语中,“全球化”这个词同美国妇女学的全球化有很不同的含义。搞清这个词义的差别是继续讨论的前提。“全球化”包含着复杂的内涵,处于不同地理位置和阶级位置的男女在“全球化”中有不同的经历;“全球化”过程既包含资本的扩张、殖民关系的延续发展,也包含全球抵抗力量的跨国界行动和效应;这个过程中的经

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对各社会群体的效应是复杂和矛盾的,并非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态度所能概括。在此笔者无意对“全球化”做一个全面的界定,而是希望突现中国主流话语中的“全球化”意义中的问题。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大众传媒和官方语言对全球化做了铺天盖地的正面宣传,很少有人关注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中阶级、社会性别、种族等等社会等级制度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如在英文杂志《标志》组织的对全球化和性别性的专题讨论中,一位中国女学者以中国妇女代言人的身份,强调国际上对全球化的批评与中国的“本土”情况不符,她声称:“从本土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即,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妇女的生活和地位改善了……对中国妇女来说,全球化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使每个女人都会有机会超越家庭、社会、民族和国家,最终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去做一个人。无论全球化产生多少新问题,还有什么能比选择更重要?”^①

这儿表述的并非个别人一厢情愿的想像,而是我们在中国当代主流话语中司空见惯的全球化神话。它遮蔽了权力和等级关系,无视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而出现的社会性别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它以抽象的“中国妇女”一词掩盖了中国处在地理或社会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那无数没有话语权、无望获得发展机会的最底层的各类各族女性。有趣的是,这个所谓的“本土视角”表达的却是对非本土价值观不假思索的认同。

拥抱主流话语中的“全球化”神话,甚至冠之“本土视角”来抵制国际间的批评理论,而不是运用各种批评武器去分析解构这神话形成的社会历史政治过程以及其所遮蔽的社会复杂现实

和权力关系,这种现象值得引起我们妇女学者的警觉。我们从事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学者可以说都是处在有话语权的精英地位,我们如何在自己所处的享有特权的位置上开创一门表达边缘弱势群体的声音和经历的知识?我们的精英地位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知识创造活动?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我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立场不为自己的精英地位所腐蚀?对这类问题的认真思考和采取对策恐怕是我们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学术领域的前提,也是我们清醒地解构“全球化”神话的前提。

对于“全球化”与“本土”的关系,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学者有许多思考。虽然每个本土的具体情况都不尽相同,但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使得非西方国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在探讨中国妇女学的本土化时,倾听和了解其他非西方学者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的思考。印度学者斯皮瓦克是把女权主义议题引入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人物,她始终关注东西方南北方之间的殖民关系,关注这种权力关系在“全球化”中的运作。在这种关注中,她对自己的精英地位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并不断以批判解构的声音来提醒其他处于精英地位的女权主义者。2001年她接受另一位印度学者杰倪·夏珀的访谈时,对自己作为一名非西方的女权主义学者在全球化中的立场和观点有很清晰生动的阐释,所涉及的议题同本文讨论的主题有关,在此做个简要的介绍。

当国际学者对全球化的讨论较多关注在人口流动和迁移国外侨居人群的问题上时,斯皮瓦克提醒人们不要把全球化仅仅理解为都市化,而要密切关注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在农村中的效

应。她揭露跨国公司的种种垄断策略是如何直接影响了南亚农民的生活,如对种子做基因处理使农民无法按常规留种而不得不依赖跨国公司,救灾的小额贷款附加农民必须用基因种子的条件,专利权把非西方的农民在几千年里积累起来的农业知识和技术攫为己有,化肥作为奖励形式已经成了农民生命周期的一部分等等。西方资本对东方或南方农村的侵入不仅占领了许多传统中属于妇女的知识和技术领域,更重要的是把农业社会的一切重新编码,作为抽象的数据处理,这个过程对底层农民生活的意义尚未引起学者的关注。针对那种认为电子技术使第三世界妇女有了走向全球市场的渠道的论点,斯皮瓦克明确地指出,表面上这种观点说的是事实,但是说这些话的人没有去想究竟是哪些人有了这种渠道?“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人群没有上网的渠道,她们甚至不知道英特网是什么。这是地球南部最大的人群。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结构而提上网渠道是不会导向一个公正的社会的。”^⑤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斯皮瓦克始终从“下属群体”(subaltern)的角度来看问题。^⑥ 从这个角度看,她不仅时时警惕跨国资本的权力,也关切全球的活动分子包括女权主义活动分子的行动成效。她批评在社会性别培训中以上层女权主义者作为农村贫穷妇女的榜样,她质疑在全球层面的激动人心的女权主义活动——包括动用大量资源的世界妇女大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最底层妇女所处的社会基础结构?她犀利地指出:“人们没有看到,即使那些组织活动的自封活动家的欢欣鼓舞在那些被招集到这个场合的下属群体妇女中也表现出来了,但这还是那些更幸运的妇女所以为的

意思。这种欢欣鼓舞仅属于这个场合,而不是长远的结果。”她提醒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去思考究竟是自己还是底层妇女从自己从事的活动中获益更多?这些活动和底层妇女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不仅要清醒地看到活动分子和底层妇女的社会位置差异造成的认识角度差别,还要注意“以妇女为中心的慈善事业和参与民主教学,这两件事之间是有区别的”。她此刻最关切的是后者,即知识精英如何同“下属群体”一起参与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结构的变革。作为热切关注“下属群体能否说话”的精英学者,斯皮瓦克提出“田野工作”的方式作为“参与民主教学”的途径。知识精英只有深入“下属群体”的社会,获得她们的信任,才可能真正了解“下属群体”。这种“田野工作”不是急功近利为了自己发表作品搜集材料而去, (“那种类似廉价购进高价售出的商业资本主义行为”)那样会把精力放在处理信息上,而不能真正学到新东西。这种“田野工作”对知识精英来说是一种重新学习,是解构自己以前知识的过程(精英学者无意识中内化了的殖民主义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用在“下属群体”中有意义的语言进行交流。“我们必须能够区分那些对我们是一种编码方式而对她们是另一种编码方式的事物……普遍性在社会性别培训中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在谈到文化差异时,斯皮瓦克强调她当前更注意的是国族内的文化差异,即阶级的文化差异,而不是按国界来区分的文化差异。在往常的阶级形成的机制之外,在同一文化中还有内部的文化差异。国族内的阶级的文化差异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有相互作用,它同新的全球化的经营管理和金融文化的形成有关。

在谁能获得上网的途径、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中都可以看到阶级的文化差异。对阶级的文化差异的探讨表达了一位亚洲精英学者对自己和“下属群体”之间的阶级差异的深刻认识和进一步理论化的努力。

虽然斯皮瓦克的思考是一个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面对全球化的探索,具有深厚的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批评理论背景,与当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差异很大,但了解早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实践的读者会看到一个相似之处,即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和清晰的阶级分析视角。在此笔者无意论证斯皮瓦克思想的渊源,而是想说明:如果我们认为斯皮瓦克这样的非西方的女权主义者的思考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也不妨把搜寻理论资源的视线拓宽到自己曾经的革命历史,看看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同底层人民沟通的过程中有哪些理论和实践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或调动的。

斯皮瓦克对印度“本土”表达了深切的关注,但是这个“本土”从来不是抽象的、本质化的、非历史的固体,而是非常具体的社会性别、阶级、族裔在依然存在殖民关系的全球化过程中的变动的相互关系和生存状态。各个社会群体的人有不同的“本土”经历和需求,作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她要倾听的是“下属群体”尤其是其中女性的声音,了解这些无法在主流政治文化思想话语中发声的人们的生存状况,而决不把自己作为“本土”的权威代表。相反,她那把不妥协的解构之利刃也被用于对自己精英地位所蕴含的问题的剖析。斯皮瓦克对“本土”的态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方法论意义的示范,即,把立足点放在本土的底

层社会,沉下去通过“田野工作”来获得对本土的知识,寻求同“下属群体”一起改变本土“社会基础结构”的实际途径,而不是从自己所处的精英位置出发来“代表”本土。知识精英的“代表”往往是一种“再表现”,是一种话语权力的运作,所表现的是知识精英本身的各种需求和欲望。

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知识生产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不仅体制性的知识生产机构集中在中心城市地区,所生产的知识内容也远离乡土向西方靠拢。这个过程既塑造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也是由他们参与的,更确切地说,主要由男性知识精英设计和推动的。若要在中国研究“阶级的文化差异”的形成和意义,恐怕不能不关注这个“现代化”的知识生产与中国现存阶级差异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妇女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怎样才能避免步男性知识精英之后尘?如何真正以底层阶级的大多数——妇女——的经历来重新建构知识?如何使新知识的生产和新知识分子的培养产生缩小而不是扩大各种等级差别的效应?如何把处于中心城市地区的妇女学学科发展工作同边缘的妇女相连、同改变社会基础结构相关?在我们确立起妇女学是从边缘位置向中心挑战的基本立场之后,还需要花大力气探索这一类实践性的问题,以寻求切实可行的具体途径和措施。也只有这种坚持从边缘的妇女立场出发、不断寻求缩小差异的具体措施的每日本土实践,才可能消除仅仅属于知识精英的“本土性”焦虑。

注释：

- ① <http://research.umbc.edu/korenman/wrnst/programs.html> 该网站搜集了七百多个世界各地妇女学机构的网址(包括美国)。<http://www.artemisguide.com> 该网站提供美国各妇女学机构网址。
- ② 关于美国妇女学全球化的实践,参见美国女权主义出版社出版的《妇女学季刊》1998年第三、四期。(*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Vol. XXVI, No. 3&4, 1998.) 密歇根大学和马里兰大学项目的联合对象中都包括中国的妇女学教学机构。
- ③ 20世纪80年代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批评西方女权主义的旅美印度妇女学学者莫汗蒂最近撰文,申明她的“在西方人的眼中”一文是针对当时西方女权主义对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殖民关系,但她并非把“西方”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做截然对立的界定,也不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可能结成联盟,相反她是在“一个团结和分享共同价值的框架之中”进行批评的。文中她呼吁女权主义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见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 Revisited: Feminist Solidarity through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8, No. 2, 2003, pp. 499 ~ 535。
- ④ Li Xiaojiang, *From "Moder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Where Are Chinese Women?* in *Signs*, 2001, Vol. 26, No. 4, pp.1277 ~ 1278. 引文为笔者翻译。
- ⑤ 在此及以下对斯皮瓦克的引用均见: Jenny Sharpe,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onversation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Politics and the Imagination*, *Signs*, 2002, Vol. 28, No. 2, pp. 609 ~ 624. 引文为笔者翻译。
- ⑥ The Subaltern (下属群体)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20世纪30年代在狱中写作时用的词,指从属的社会群体,他们缺乏那些有权势的

群体的组织力量。80年代,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家借用这个词来指处于低等级的社会群体,这个下属群体在印度的社会背景中比葛兰西所指的30年代的欧洲工人阶级更缺乏通向政治权力的渠道。斯皮瓦克在这儿界定为“无法加入向上社会流动运动的人群”。她最有影响的文章题为“下属群体能说话吗?”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rry Grossberg, 271 ~ 31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针对一些读者将她误读为悲观地认为下属群体不能够表达自己,此访谈说明她那个问句的文章标题是表达自己对下属群体无法发声的愤慨。

面对女权主义学术

当代女权主义学术在国际上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这三十多年里,女权主义学术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交融,成为对传统知识体系批判、解构和创建新知识的前沿阵地。女权主义学术内涵极其丰富,并涉及到人文社科各个领域,包含着产生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以及它们在跨学科流动中的交融和变化。本文将概述学术规模和内容两个方面。对规模的讨论将集中在妇女学在全球的发展上。而以笔者有限的学术背景,实难以对女权主义学术浩瀚的内容做甚至粗略的综述,故在此仅捡拾沧海一粟,集中讨论女权主义基本概念“社会性别”(gender)在美国史学界的应用发展,以作为女权主义学术在各个学科领域渗透的一个例子。

一、当代女权主义学术在国际上的发展规模

当代女权主义学术在全球各地有不同的起源和发展轨迹,然而因通讯技术的便利和国际交流的频繁,在过去 30 年里迅速发展成多样而又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的、跨学科多学科新兴学术

领域。女权主义学术不同的起源可以美国和印度为例。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女权运动产生于民权运动、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在女权主义运动高潮中,学界的女权主义者发出要了解妇女自己的历史、要由妇女自己书写妇女的呼声,因为当时教育界所传授的知识几乎都是以白人男性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和研究对象的。女性在文学艺术中大量存在,但是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再表现(representation)正是置女性于从属地位的权力关系和社会文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能赋予妇女力量的文化资源。身处教育界和学界的美国女权主义者们清醒地开始着手做知识的解构和重构工作,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包括研究和教学两个方面。初期由美国女学者联合进行的研究项目中,有一项突出的集体成果是女权主义的妇女健康读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这本书打破了白人男性对医学的垄断,挑战了美国医学界对妇女健康的漠视,批判了束缚女性身体的社会文化观念,倡导了以妇女为中心的健康概念。这个读本成为美国妇女的健康知识经典,连年再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这本开创性的医学著作成为一个新学术领域的奠基石,到 80 年代妇女健康已经成为跨学科的一个专门领域。此为女权主义研究众多建树中的一例。^①

美国的女学者在 60 年代末开始教授妇女学课程,作为对教育体制和内容改造的一个实践。在女权运动的高潮中,这个教学实践迅速在诸多高等院校开展。据统计,全美国在 1969 年到 1970 年有 17 门关于妇女的课程,到 1973 年已经有 2000 门课程,并且有八十多所高校建起了负责发展妇女学教学的跨系科

的妇女学中心。到1980年,美国各地妇女学中心增加到350个,开设的课程达2万门。虽然在八十年代后期美国保守的政治局势中女权运动处于低潮,用于妇女发展的各种资源被削减,而妇女学在高等学校发展的势头却不减。今天全美有七百多所高校有妇女学中心或妇女学系,每年开设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程达三万多门,全美有12%以上的高校学生获得妇女学课程的学分,有十多所高校授予妇女学博士学位,培养跨学科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专家。许多学校授予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硕士学位以及和其他领域的联合博士学位。妇女学课程内容还渗透到各个传统学科领域,到1995年,在各个学科中以写妇女和社会性别专题论文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达10,278。^②妇女学在渗透各学科的同时也在吸收各种新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当今的妇女学包含了对种族、族裔、阶级、性倾向等多种等级制的分析,社会性别作为诸多等级制中的一种,被放在同其他等级制和社会身份的交叉关系中来分析。妇女学既不是孤立地讲妇女,也不把社会性别作为惟一分析范畴。

印度的女权运动产生于反殖民主义的独立运动中。在1947年独立以前,大批的妇女活动分子不仅积极参与民族独立运动,也坚定地提出妇女权利和改善底层妇女生存状况的要求,并把底层妇女受严重剥削的现状同殖民压迫联系起来,提醒民族独立运动男性领袖对妇女议题的关注。印度独立后,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女权主义学者继续对底层妇女的调查研究,并以干预性研究为主要内容,以社会改造为目标,把学界的研究同政府政策的改变和基层社会活动结合起来。印度妇女学先驱之

一的社会学家奈拉·迪塞(Neera Desai)对印度妇女现状所做的女权主义调查研究《现代印度妇女》在1954年便出版了。1972年印度政府在联合国要求下,任命一些印度女权主义学者组成印度妇女地位委员会,起草一份印度妇女地位调查报告。委员会在政治学教授维那·玛祖姆达(Vina Mazumdar)领导下进行广泛的调查,她们走访了全印度各个地区,会见和访问了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妇女一万多人,在充分掌握占妇女大多数的底层妇女生活状况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起草了题为《走向平等》的印度妇女研究报告。这份报告通过联合国机构以及197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1976年的国际妇女与发展大会在国际上传播,使第三世界妇女的议题和视角进入了国际女权运动。这份报告也为印度妇女学的诞生奠定了社会和学术基础。参与报告调查和写作的精英知识妇女为底层妇女的生活状况所震惊,并反省学界缺乏对印度大部分妇女的知识的原因。从印度乡土社会妇女生活实践中寻求和创造新知识成为印度女权主义学者的努力目标。^③

印度高等院校中第一个妇女学研究中心成立于1974年,其宗旨是从事妇女研究和改善底层妇女生存状态的行动。有女权主义学者参与的印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在1976年把推动妇女学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活动,并明确提出三个目标:1. 辨识必须改变的政策并为改变政策服务;2. 要求社会科学领域重新审视自己的方法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调查和分析为什么妇女的角色和处境被整个社科领域的调查研究排斥在外;3. 恢复在民族独立运动后沉寂下去的关于妇女问题的社会讨论。在这个阶

段,印度妇女学主要是妇女研究和干预政策,但是其主要力量来自学界,并且对学界本身有干预性行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坚持妇女学对下层妇女的社会责任。把学术与下层妇女的生活紧密相连是这个时期印度妇女学的特点。80年代中叶以后印度妇女学在高等院校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并且从初期的研究和政策干预行动扩大到教学,到90年代妇女学已经作为一个教学机构在很多大学建立起来。如何使已经纳入教育体制的妇女学同改变下层妇女的处境联系起来?这依然是印度妇女学者深为关切的问题。^④

如印度和美国妇女学不同发展轨迹所显示,妇女学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出现具有各不相同的政治历史背景,其内容也因此各具本土特色。我们能看到的共同点是,已经遍及五大洲的妇女学教学实践和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的渗透。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已经有了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博士学位,东欧各国在1989年之后也纷纷加入创建妇女学的国际潮流,仅波兰一国就有6所大学设置社会性别学研究生班,匈牙利的中欧大学授予社会性别学博士学位。亚洲除印度率先创立妇女学外,泰国、日本、韩国等妇女学发展也很迅速,有多所高校授予妇女学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韩国的梨花女子大学不仅有近二十年的妇女学发展历史,还成立了亚洲妇女学中心,开展各种学术活动,联络亚洲妇女学者,积极推动亚洲妇女学的发展,并将是2005年国际妇女学大会的东道主。笔者最近在马里兰大学主持的一个国际妇女学学术研讨会上了解到,拉美和非洲虽然缺乏资源,但是从牙买加到乌干达许多中小国家都已有

较长时间的妇女学发展。如牙买加的西印度群岛大学在10年前便开始授予社会性别学硕士学位。在乌干达的麦克里尔大学,修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的一千多名本科生中百分之六十是男性。据介绍,这是因为在乌干达的各种国际组织重视社会性别分析方法,选择妇女与社会性别的课程对学生毕业后求职有帮助。除了教学单位的建立,世界各地还建立了各种妇女与社会性别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置于高校内外,有地方性的,有国际性的,有跨学科综合研究机构,也有从事某个方面专门研究的。^⑤

除了妇女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设立,另一项能够说明女权主义学术发展的指标是出版。女权主义学术在各个学科领域的专著浩如烟海,调查清楚全貌非笔者力所能及。如不少美国女权主义学者经常叹息:70年代初创妇女学课程时,没有教材,只好集体写作,白手起家;而现在若想读完所有出版社寄来的关于妇女学出版信息都不易,更别说阅读每本专著,只能是望洋兴叹。在此笔者仅就网上能够搜寻到的世界各地定期的通讯和杂志做了个不完全的粗略统计。世界各地以妇女和社会性别为主题的期刊(主要是拉丁和罗马语系的)达三百多种,其中英文占三分之二。在二百多种英文期刊中,成为世界各地各学科女权主义学者不可或缺的交流场所的英文核心学术刊物是四十多种,有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电影、美术、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地理学、文化研究、同性恋研究、理工科中的妇女研究等分领域的刊物,也有跨学科综合性刊物,如《标志》(Signs)《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妇女学季

刊》(Women's Studies Quarterly)、《妇女学国际论丛》(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等。另外还有关于妇女健康的期刊177种(多种语言)。^⑥这些统计数字没有包括所有语言的妇女学期刊,如下列中文期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辑的妇女研究学术刊物《妇女研究论丛》,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和台湾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组编辑的跨学科刊物《女学学志:妇女与性别研究》和《妇研纵横》都没有在英文检索中出现。可想而知若要包括拉丁和罗马语系之外的女权主义期刊,这个数字还要庞大。从70年代初的几份通讯发展到今天如此繁花似锦的学术刊物园地,世界各地女权主义学者的知识生产能力由此可见一斑。妇女学期刊的繁荣使它已经成为图书管理的一个专门领域,不少美国大学图书馆有妇女学期刊的专职图书馆员,这些图书馆员也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探讨女权主义学术刊物与妇女学学科发展的关系,研究如何在网络时代使妇女学学者和学生更便利地运用期刊资料以及如何加强对日益发展的世界各地妇女学期刊的了解和使用等议题。^⑦

女权主义学术发展除了表现在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妇女学以及创建自己的学术出版园地外,还表现在对传统学科领域的渗透和改造。世界各地的妇女学学者绝大部分是从传统学科领域中训练出来的(鉴于妇女学博士学位的建立历史尚不久),一般是同时在传统系科和妇女学中任教。这个体制设计也是女权主义学者有意识地改造高等院校课程的一个方面。可想而知,一位给妇女学学生开设女权主义理论课的教授,在给文学系学生讲授英美文学作品时,必然不会被动地沿用该学科中的传

统材料和分析角度。学生上过女权主义教授的课,带着满脑子新鲜的理论概念和分析范畴,去听别的传统的课程,很可能产生不满足,这些不满的学生会以提问的方式向老师挑战,逼迫一些本来对女权主义学术毫无兴趣的教授去学习了解,并对自己的教学内容做出相应改变。研究美国妇女学发展历程的学者都注意到,学生是在校园内传播女权主义的常识性概念的重要媒介,是女权主义学术发展的一个推动力量。大学课程内容的变化因素很多,各国情况也不尽相同。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女权主义对课程的改造与对学术领域的改造相辅相成。当某个领域中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生选择妇女与社会性别主题做论文时,当这类博士论文成为专著不断出版时,可以说女权主义学术对这个领域的渗透已见成效。这个成效也表现在主流期刊的变化上。传统学术领域中的学术刊物在初期普遍对女权主义学术采取漠视态度,似乎凡与妇女相关的议题就缺乏“学术性”。今天这种状况在许多学科领域中有了相当大的改观。当新一代的男性学者也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基本分析范畴来运用时,主流学术刊物必然会对学术界的这种大趋势做出反应。“社会性别”连同“阶级”、“种族”在80年代就进入各个学科,成为“三大”分析范畴,今天许多主流学术刊物登载这类研究成果也已成常态。

女权主义学术在全球的发展尽管迅猛却不平衡。^⑧从上面概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课程发展上,以美国为最广泛;在学术出版上,以英语为强势。虽然女权主义学者在美国和欧洲是作为边缘弱势群体崛起的,但是身处发达国家,其资源的优势是不发达国家中甚至处于主流的学者所不具有的。从这个角度

看可以说,女权主义学术发展在东西和南北之间的不平衡,是全球权力结构的反映。但是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亚洲,则会发现女权主义学术发展状况并不完全取决于某个国家在国际地理政治中的位置。印度不是发达国家,却有繁荣的女权主义学术,有专门从事女权主义学术出版的出版社,有提供妇女学教学 and 研究的影像资料库,更出了众多国际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如盖雅提·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钱德拉·莫汗蒂(Chandra Mohanty)等。当然,在与国际学界交流方面印度有个明显的有利条件:印度学者一般不需体验国际学术界中英语霸权的苦恼,她们的著述如果是英语写作也很快能在国际学界传播,即,这个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女权主义学者在国际学界能发出响亮的声音。如果语言是学者与国际女权主义学术交流的一大障碍的话,那么韩国是儒家文化圈中的非英语国家,但是如前所述,韩国妇女学的建立已有近二十年历史,早已培养出大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并且是推动亚洲妇女学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社会性别与女权主义学术

毋庸置疑,即使在英语的强势影响下,全球各地女权主义学术还是在特定情景中生产出来的知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本土”会有不同的机制制约知识生产,也会有不同的政治需求影响学界的关注点和问题的提出,更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左右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选择。那么,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领域靠什么来标识?在女权主义学术已经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理论、多种分析范畴和研究方法的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社会性别”是其最基本的理论概念和学术研究对象,只是这个基本概念在过去30年里也随着女权主义学术经历了发展变化,并且已经进入国际学术主流,也成为国际机构组织中流通的概念。关注社会性别关系是各地多样的女权主义学术的共同点。在这个共同的关注中,女权主义学者并非把关于社会性别的理论作为凝固不变的教条,而是充分认识到这些学术理论也是特定历史时刻的产物,必然有具体时空中的局限,学者的任务是如何不断开拓对于社会性别的新认识,不断反思既存理论的局限和偏颇。在过去几十年理论的流动变化和论争中,有一些认识已经成为女权主义学者的共识,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前提。如,社会性别是人类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原则;在大部分社会中这种把人组织到男女不同的劳动分工、社会活动和性活动中的安排具有等级含义;社会性别等级制是构造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一整套机制来实现的;这套机制(包括文化再表现)不仅维持了性别的分工,男女有别的行为方式,也制造了差异性的主体身份,即男女不同的具有等级含义的社会性别身份;在多种等级制并存的社会中,社会性别等级是在同其他等级机制的交叉中发生作用,而不是孤立地起作用;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对不同社会群体中具有多重身份的人来说,多种等级制的交叉作用是多样和不固定的,而非始终围绕一个不变的中心等等。

对社会性别的理论探讨并非身处象牙塔中的学者的智力游戏,而是同女权主义政治目标紧密相连。从理论上阐释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出发点是寻求改变这种关系的途径。女权主

义学者对制造和巩固社会性别等级关系的各种机制的揭示在国际社会和许多地区影响了政策制定和社会干预性行动。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就是一例,这两份文件体现了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的分析和改变社会性别关系的策略与要求。让“社会性别进入决策主流”这个国际女权运动的口号通过各种国际机构和组织已经渗透到许多国家的政府决策过程,要求决策者在政策制定中考虑对资源和权力的占有都处于弱势的妇女群体,要求政策体现“社会性别公正”。

在学术层面,对社会性别的理论探讨为女权主义学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在女权主义之前虽然有男性学者对男女差异表现过研究兴趣(其中著名的如弗洛伊德),而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建构起来的却是女权主义的独创。这个理论的建构同女权主义学者从各个学科背景出发对社会性别各方面的具体研究相辅相成。如果社会性别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那么缺乏对这个同政治经济制度相关的社会性别制度的认识显然是人文社科领域中的一大缺失。女权主义学者所作的不仅是“填补空白”,提出前人没有提过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女权主义学者提出的新问题往往颠覆了旧知识所声称的“客观真理性”,从而有力地改变了当代学界的认知结构。如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对话语权力的认识等等中国学界已经熟悉的当代西方学界的话题,并非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首创或独创,女权主义学者撰写的妇女史就是有意地挑战白人男性声称具有普适性的“宏大叙事”;文学、人类学和心理学领域中的女权主义学者很早就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社

会性别差异并非自然而而是话语的建构,是权力关系的表现;女权主义的名言“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更是明确针对传统“政治”的狭窄定义,提出政治(权力关系)不局限在国家、政府和政党,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权主义学者不仅用社会性别理论挑战启蒙运动以来的白人男性中心的西方知识传统,也以此棱镜检视当代各种批判性理论中的社会性别盲点。当然,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文化研究的崛起也为女权主义学术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学术空间。^⑨

社会性别理论对各个学科发展的推动可以史学在美国的变化为例来具体说明。女权主义史学家所作的妇女史是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框架的,即考察身处社会性别等级制(早期较多用“男权制”一词)中妇女的各种活动。具体的研究五花八门,按研究对象来说,有传记(各个阶层的妇女都可以入传),有写妇女群体的(如女工、售货员、社区义工、妓女等等被主流叙述所忽略的群体),有写妇女组织活动的(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组织,包括女权组织),有研究与妇女相关的一切领域的,如婚姻、家庭、劳动、性活动、情欲、爱情、生育、育儿、身体、家务、教育、职业、政治参与、宗教、艺术、思想、话语等等。和社会史相同,妇女史要把以往的政治经济史所排斥的人群及其活动放到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和社会史不同,研究人类一半的妇女史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也就是说,妇女史学家的研究不仅是挖掘被淹没的妇女,也同时是从社会性别视角与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同行的对话,力图拓宽传统史学的内容。当然这个对话也包括吸取各种研究方法,

如人类学和文学研究方法。概括地说,妇女史研究本身已经表现为跨领域跨学科性,其丰硕学术成果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许多禁区,它同少数族裔历史一起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历史画面。在80年代,美国通史就不再仅仅是白人男性的历史,也不能从所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种欧洲殖民主义的角度开始历史叙述。女权主义妇女史给史学带来的不仅是“发现妇女”,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史学界主流反思历史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思考以往的历史叙述遮蔽了什么?造成遮蔽淹没的机制是什么?是什么特定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关系造成了这种遮蔽?史学家本身的社会立场意味着什么样的局限?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批评探讨有效地揭去了所谓史学是“客观、中立、科学”的“非政治性学术”的面具,并把自觉反省能力提升为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

美国史学的变化意味着社会群体间权力关系的变化。笔者可以亲眼目睹的一个场景来说明这一点。1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比较历史课程的一门历史理论研讨班上,教授要求研究生们围绕阅读材料来讨论美国历史写作的变化。一位白人男性学生开始抱怨说,如今的美国史显得乱七八糟,让人无从把握;真不如他在高中时学的美国史,条理清楚,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华盛顿领导的独立革命,国父们对美国宪法的奠定等等,有一条历史脉络贯穿下来,把重要的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得很有连贯性。这位白人学生的话音未落,一位黑人男性学生立即发言反驳道,你说的所谓连贯和条理清晰的客观历史也是我在中学时读的历史,可那时我对这样的历史根本无法认同,因为那说的与我无关,那不

是我的历史！而现在我们终于在美国史里看到了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的历史。我们需要质问历史是谁的历史？谁有权力界定什么是重要的可以被写进历史的事件？对谁是重要的？这种界定权力是从哪儿来的？接着其他族裔以及女学生也都就历史知识生产和权力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人也对所谓美国历史学者是客观地写历史提出不同意见，举的例子是：中国五四时期对妇女问题的讨论铺天盖地，提倡女权主义是新文化人士活动的一大内容。可是美国学者写的多种关于“五四”或新文化人士的专著中，都不提这个历史场面，也不涉及那些文化名人在这方面的活动，更不去探究它的社会性别意义或对中国现代性的意义。鉴于关于这方面的史料俯拾皆是，很显然这些史学家把妇女议题从“五四”研究中抹去不是因为缺少材料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不重要，这种抹去的行为是需要他们在看史料时把涌到眼前的妇女问题讨论资料推到一边去。所以那些声称客观的学术其实是依主观价值判断对材料的取舍而产生的。

这堂课的讨论把历史生产的社会立场鲜明具体地展示出来。不仅如此，从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对当今美国史多元化叙述的截然不同反应中，我们也可看出历史知识不但在生产过程中牵涉到权力关系，其产品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以前被美国白人男性主流叙事所遮蔽的社会群体毫不含糊地要求发声权，因为表达她/他们的历史记忆关涉到这些群体今天的主体身份的构造。当一个美国黑人学生在美国史课堂上找不到自己的历史时，或听到有限的关于黑人的表述也是来自白人统治者的角度，这种历史就在潜移默化中巩固着他所处的边缘地位和

他的边缘身份。在历史中被边缘化的女性也有相同的经历。正因为这种共同的边缘处境,妇女史和少数族裔史形成同盟,从边缘向中心挑战,使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宏大历史叙述难以为继。这个过程也在美国妇女史中出现。早期的美国妇女史主要集中在白人妇女,并有以白人妇女经历为妇女普遍经历的倾向。黑人女学者很快起来挑战这种对男性中心文化无意识的再制,并提出人的主体身份是在社会性别等级制和种族、阶级等级制的交叉中形成的理论认识。^⑩这种批评提醒白人女权主义者反省自己相对于其他种族妇女的特权地位,也激励女权主义学界寻求更复杂的理论框架来阐释复杂多样的历史与现实。

美国妇女史在 80 年代初已经硕果累累,但依然遭遇主流学界的阻抗。这种阻抗的形式之一是把妇女史作为与主流历史分离的历史,即,可以承认女权主义者所发现的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反对把家庭、性活动、家务、育儿等也作为史学的内容,却不认为这类历史足以改变传统史学对政治经济的叙述和理解;妇女史被理解为仅在原先的历史画面上“添加妇女”,而不是对历史的重绘和改写。自然,这种“添加”再繁荣,也还是难以改变其相对主流历史的边缘状况。不少女权主义者认识到需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才可能实现对主流史学的改造。基于学者的大量理论探讨,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Scott)对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学术分析范畴做了重要的理论阐释。她的题为“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的文章于 1986 年发表在美国史学主流刊物《美国史学评论》上,在史学和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尤其为社会性别史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⑪

斯科特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在文章的标题中就表达得很清晰,她不满足于“发现妇女”,而是要进一步把各个学科女权主义学者已经丰富起来的社会性别理论上升为人文社科领域中一个分析范畴。作为一个史学家,她的首要关注点自然是如何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历史理论来用于历史研究,而不仅是用于对妇女的研究。社会性别既然是一种社会关系,要对它进行研究牵涉到的就不只是妇女,应该包括男性,也应该包括建构起这个特定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斯科特就是在对“方方面面”的思考中深化丰富了女权主义理论。她借助后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指出以往女权主义理论流派的局限。女权主义的男权制理论强调人类的再生产和男性在性活动中将女性物化是性别不平等的基础,这样的理论对性别不平等在多方面的表现有深入的观察。但是这类分析都是以生理差异为基础,而没有去分析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形成的历史过程,“它假设人的身体具有永恒的内在意义,游离于社会与文化的建构,从而把社会性别本身理解为非历史性的了”。^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分析注重历史性,但是未能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框架限制,社会性别关系始终被当做变动的经济结构的副产品,社会性别在这个经济决定论中没有自己作为独立的分析范畴的地位。基于心理分析学的女权主义理论都关注主体身份的构成,尤其关注儿童发展的早期阶段对社会性别身份形成的影响。其中客体—关系理论把社会性别身份的形成集中在家庭经历。斯科特指出这样的理论让历史学者难以把个人同政治经济制度联系起来,也没有考虑意义体系对主体身份形成的关系。以拉康为主要的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学

派把语言作为主体形成的核心,把“男”“女”作为需要研究的问题来对待,提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非内在特点而是主体的构成表现,并且,主体是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斯科特认为这个理论指出语言是分析的适宜对象,为阐释意识和无意识欲望提供了系统的方法。但是她同时批评这个理论对个人主体的执著关注,以及把男性女性对立的主体性作为社会性别中心事实的倾向。这样的理论虽然强调主体是“建构”起来的,但同时又把男女这两个类别和之间的关系都普遍化了,而没有给历史的具体性和多样性留有余地,其结果还是回到了那种固定的、非历史的、男女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

怎样来突破以往理论的局限,使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充分利用后结构主义同盟开辟的空间成为一个学术分析范畴?斯科特认为,首先,不能去寻找单一的根源来解释社会性别等级关系,而必须设想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不去追求普遍的一般的因果关系而是去寻求对事物意义的阐释。要解释意义,就必须既研究个人主体又研究社会组织体系,说明两者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因为两者对理解社会性别如何发生作用、变化是如何产生的都至关重要。此外,还需要改变把社会权力看作统一、连贯、集中的观念,而代之以福柯的权力概念,即,权力是在社会力量领域中由话语构成的、弥散分布的不平等关系。在这些过程和结构中,探究人的能动性以及语言对人的限制和提供的磋商较量、抵抗和重新阐释的可能性。为了更明晰地表述可以如何去思考社会性别在社会体制关系中的效应,斯科特对社会性别做了如下界定:社会性别是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分子,是

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之上的;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作为社会关系的一分子,社会性别涉及到四个互相关联的方面:1.具有多种再表现形式的文化象征;2.对象征意义作出解释的规范性概念(在宗教、教育、科学、法律、政治理论中表达);3.政治和社会机构组织;4.主体身份的历史构成。作为表达权力的一个基本场所或途径,社会性别同权力的观念和权力的构成牵连在一起,因为权力的分配(对物质资源和象征意义资源的控制和支配)经常以社会性别观念为参照。考察社会性别观念如何构成和合理一些社会关系,便能够看到社会性别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看到在特定的情况下政治是怎样构成社会性别的,社会性别又是怎样构成政治的。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考察的含义是:像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一样,它的形成涉及到社会文化各个部分,对它的考察必须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能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本质主义的。

为了阐明社会性别是表达权力的一个基本途径,同时针对传统政治史对妇女与社会性别议题的抵制,斯科特在文中旁征博引从欧洲政治史中举例说明,社会性别和传统政治权力既有明确的直接联系(如国家对妇女劳动、生育、性活动、服饰等等的控制),也有通过象征意义表达的联系(如把殖民与被殖民国家之间的关系表述为男性女性关系、把男子气同国家力量联系等等)。她犀利地指出,尽管传统政治史学家总是用战争、外交和上层政治来质疑社会性别概念的用处,但“上层政治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概念,因为它之所以能建立起自己的无上重要性和对公众的权力、建立起自己具有最高权威性的理由和这个

事实,恰恰就在于它把妇女从这套运作中排挤出去了”。^③由于斯科特对后结构主义方法的坚实把握,她的整篇文章在着力丰富社会性别这个分析范畴的同时,也致力于解构现存的理论概念,拒绝把任何概念当做天然的真理来接受,而是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她对传统政治史的剖析展示了社会性别关系在这个学术领域中的表现,更揭示了政治领域中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换言之,文章本身就是以社会性别为范畴对史学和政治学进行分析的范文。

斯科特对后结构主义的运用是彻底的,10年后她又发表了“对社会性别和政治的进一步思考”一文,对10年前提出的概念进行一些修正,并强调任何学术概念都受到时空限制,指出:“必须对我们研究对象的范畴(包括社会性别)以及我们在分析中使用的范畴提出问题,并且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我们的话语建构跟别的时间地点中话语建构之间的区别,对自己在这个建构中的利害关系和意图做出一定的反省(包括让欲望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④在这篇文章中她同时做两件事:修正自己对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认识;把社会性别同任何范畴一样置于具体时空中去问题化。她对自己10年前提出的概念的补充修正主要是两点:一、明确反对把“性别”作为同“社会性别”对照的自然范畴,提出性别差异是妇女受排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指具有文化意义的差异,即人们关注到的差异,都是社会文化的建构);二、强调社会性别是多种范畴中的一个,其有效性依具体时空而定,女权主义者需要不断自我反省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斯科特在这儿对

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的拓宽努力主要表现在对性和无意识领域的关注,她重述盖尔·卢宾在70年代提出的重要观点,即性本身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内容,需要把人类对性的组织活动与对经济、政治活动的组织安排放在一起研究。^⑬

斯科特80年代中叶的文章发表后,社会性别成为美国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曾有过对于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之间关系的许多争辩。学者们普遍看到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对拓宽历史研究范围的意义,但是一些女权主义学者也担心社会性别史包括对男性的研究会冲淡对女性的关注,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会转移对妇女人生经历的重视,甚至形成对妇女史的冲击。不过十多年后的今天,从实际的研究成果看并没有出现这种非此即彼的现象。虽然有了两个各有侧重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妇女史学刊》(*A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和《社会性别与历史》(*Gender and History*),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并没有形成两个分离的领域,甚至要清晰地界定这两类历史研究都显得困难。因为妇女史离不开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史则是基于妇女史的理论方法,即使是以男性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性别史,也是在女权主义理论框架下阐释的,如关注男性气质和男性主体身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构。如果要区分两类历史著述的话,一些以男性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性别史是惟一不能同时归入妇女史的著述,对社会性别象征意义在政治文化中再表现的研究、对社会性别话语变迁的研究、以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历史建构和意义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可以比较明确地算社会性别史,其他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著述,无论是在女性和男性相互关系中研究妇

女或是研究妇女活动对传统男性领域的影响,或是把妇女个人经历置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大的体系变化中的研究等等都模棱两可地既算妇女史又属社会性别史。事实上,已经出现的一个词——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就意味着这两种历史研究领域界限不明的情况。正如《妇女史学刊》所声明的:“关于妇女的著述,凡是关注到影响了妇女经历并被妇女经历所影响的社会性别的特定历史建构,就可以并已经在跨越‘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的区分。”^⑥在不明确界定的情况下,也可把社会性别史理解为对妇女史研究领域的拓宽,所以“妇女史”这个词目前在实际使用中往往也包含了社会性别史。

显然,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在各种理论的推动下,美国妇女史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初期的以包容主要是白人妇女的经历和声音来改变主流史学的目标,转向考察妇女在阶级、种族、社会性别交叉关系中的多样经历对主流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过程的意义,妇女史不仅仅是妇女在被边缘化的“妇女领域”中的活动历史,也是各族各阶层妇女以各种方式参与和影响各种历史过程的历史。这样的妇女史不仅以妇女这一半人口的经历来扩大史学的范围,也以社会性别理论和新的史料对主流历史的重大主题作出重新阐释。比如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妇女与社会性别史改变了集中在白人男性经历上的叙述,把这个政治历史过程置于社会性别、种族、阶级关系的变动中来研究,这类研究往往模糊了以往的“公共”“私人”领域界限,也往往跨越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家庭史等界限,展现了多样的社会群体在各种场景中的复杂冲突和较量及其同美国政治形态演变的关系。

系,使“政治文化”“公民权”等等重要概念获得了新的含义。正因为 90 年代以来妇女史的重心移向对主流历史重大议题的重新阐释,并把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方法和角度引进了主流史学关注的领域,美国妇女史学家杜博伊(Ellen DuBois)声称:“如果妇女史是新社会史的孩子,她可能是新政治史的母亲。”妇女史学家斯克勒(Kathryn Kish Sklar)则预言:“美国妇女史将成为美国史学主流的新河床。”美国妇女史前辈史学家格德·勒纳(Gerda Lerner)对美国妇女史生产情况做了一个统计:在 1998 年至 2000 年之间,发表的论文 290 篇,出版的专著 150 部,完成的博士论文 280 篇。这个生产规模似乎可以从智性劳动的资源方面为斯克勒预言的有效性提供实证。^①

妇女与社会性别历史的发展不限于美国历史,在美国的中国史领域中也有长足进展。在美国作为一个国别史,中国史规模不能同美国史相提并论,并因为中国研究在美国诞生的保守历史背景(冷战的产物),该领域的知识生产活动与美国史领域有很大区别。但女权主义学者还是在中国研究领域中有众多建树,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各个学科领域中从社会性别角度做的中国研究可说硕果累累。在中国历史领域,妇女与社会性别史极大地拓宽了海外对中国历史研究范围,审视的领域包括妇女社会活动与组织、经济生产、技术、法律、医学、革命、政党、政治运动、婚姻、家庭、性文化、生育、身体、服饰、体育、文学艺术、劳动就业(包括性服务业)、社会性别话语等等。从社会性别角度做的历史研究不仅涉略的面是前所未有的宽,采用的多种方法也使历史研究得以把对历史复杂多样过程的把握和个体主体身份

的探究结合,在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地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的同时,鞭辟入里地阐释新的历史见解。在近代史领域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由于海外文学领域对话语的历史建构的重视,一些文学评论和比较文学学者生产出相当精彩的历史著述,选取的主题往往是史学界尚未涉及到的。如桑梓兰的近作《女同性爱的浮现:现代中国女性的同性欲望》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探讨“女同性恋”这个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产生和演变。^⑧鉴于海外文学领域对理论的重视,文学学者的跨学科努力将会对中国近代史领域产生积极作用。

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成果本可成为国内学界流通的知识的一部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限制,尤其是资源的限制,国内对海外的成果尚颇为隔膜。所幸的是,海内外有一批学者非常投入而有成效地在做学术交流工作,由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就是一例。《丛书》包括对中国妇女研究的系列,与以往国内出版的女权主义学术理论译介不同,这些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专著将作为实例,展现英语世界(不仅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便于国内学者了解女权主义理论与各学科领域中具体研究的关系,更可具体体会海外中国研究领域近年来的深刻变化。这套系列中已经出版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就是一部开创性的社会性别史,作者用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多种理论提供的视角和方法来考察娼妓话语在中国的变迁,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把社会性别研究嵌入对中国现代性的审视中。^⑨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 2002 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女性气质, 中国的男性气质》, 也较突出地体现了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对社会性别研究日益增长的关注。^⑩这本选自多学科领域的论文集包括了男性学者从社会性别角度对男性的研究, 主编之一也是男性。显然, 海外中国研究领域新一代男性学者已经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 女权主义理论也被他们中的不少人所掌握和运用。可以想像, 在男女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社会性别研究将会有更加繁荣的景象。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发展与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各种理论方法的发展密切相关, 脱离了这些理论方法, 就不可能凭空出现这个新的史学研究领域。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社会性别史专著在我国学界尚未出现。^⑪中国学术界各个领域对国际学术理论动态反应不一, 其中史学界因为重考证而轻理论(此现象并非中国独有), 所以学者一般对过去 30 年国际学界多变多样的理论发展反应迟缓。当国际学界丰硕的新成果终于点点滴滴地渗透进中国学界时, 有些学者往往由于不了解这些学术产生的背景而感到迷茫不解, 甚至由焦虑而产生抵触。^⑫这种状况也并非中国独有。即使是在这些学术理论发源的欧洲和北美学界, 也远非所有的学者都熟悉新的理论方法, 更谈不上自如地运用于自己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往往是较年轻的学者因为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能够较好地运用新的方法创造出具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不能运用新方

法的学者则依旧按自己熟悉的方式做自己的研究。老学者面对新气象,也会有感慨,但不同于中国学者往往会体验到的深刻焦虑感。因为对中国学者来说,这些理论不但新,而且是从西方来的,在今天依然存在的全球权力结构中,西方的新知识,包括像女权主义理论这种产生于西方社会和学界边缘的知识,也会给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已经具有精英地位的知识分子)压迫感。这种状况是目前学术交流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在国内学界对外界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后,当具有新的知识结构的学者创造出新成果后,当知识界对自己的历史政治处境有更多的自省时,这种作为集体无意识的焦虑便会消退。这样说的含义是,社会性别史这类新领域一定会在中国出现。这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我们只好被动地让它“殖民”了,而是因为这个新领域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复杂丰富的认识。从这个领域在全球的发展经验来看,希望并有能力对人类社会做更深入探索的男女学者,必然会被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已经展示的广阔研究前景所吸引,会跃跃欲试,把新的理论方法用于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中,并且在自己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检视现存理论的不足之处,从而进一步丰富发展人类认识。欲加入“全球化”知识生产的中国知识界,必须同时在两个层面运作:既了解国际学术动态,又扎根本土研究。在理解的前提下从事新的研究实践,是中国学界同海外学界平等交流的坚实基础。说到底,还是我们老祖宗的那句名言最简洁: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在结束这篇介绍女权主义学术的文章之前,还有两点说明。

一、新的理论方法不意味着对知识的穷尽,并总是有自己的

局限,学术发展繁荣的前提是学者对最新理论也能看到其局限性。斯科特对社会性别概念重新思考的意义就在此。并且,新的理论方法并不总是意味着对以往的理论方法的否定或摒弃,而往往是对前人智性劳动成果的继承、修正、补充、丰富、深化。虽然女权主义学术以对男性中心学术传统的批判著称,它同时又是孕育于这个传统之中,并且始终注意从男性创立的各种理论中吸取有效分析框架,为己所用。“社会性别”这个分析范畴就是在吸收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后结构主义等多种理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当社会性别成为女权主义标志性概念时,需要强调的是,这既不是女权主义理论的惟一内涵,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所使用的惟一分析范畴,更不是女权主义希望以此来取代其他分析范畴的工具。排斥多样有效的分析工具只能是作茧自缚,更何况女权主义者对男性建构理论权威过程持清醒批判态度,这使她们难以产生排斥理论异己、“惟我独尊”的权力欲望。这种健康开放的心态也许是女权主义学术得以繁荣的无意识层面有利条件。

二、对外来学术的态度。鉴于知识产品总是具体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产物,我们在面对从别文化翻译过来的作品时需要了解其背景,理解作者面对的具体问题是什么,以避免把作者在具体语境中的关注点和论点作为跨越时空的普遍真理来对待。对这一点可以举个实例说明。9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女权主义者力图颠覆西方中心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这个历史框架中,中国是相对于欧洲“先进文明”的落后国家;西方关于中国愚昧落后的再表现相当大的部分同社会性别相关,即用

中国妇女的缠足、文盲、包办婚姻等等习俗作为中国落后的标志。中国妇女被表现为一个野蛮落后国度中的牺牲品，处境比西方妇女悲惨得多。面对西方这样的主流话语，中国研究领域中的不少女权主义学者以历史研究来论证中国妇女作为历史能动参与者而不是牺牲品的多样生存状况：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力，她们从“内”对“外”的渗透干预活动，她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她们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空间等等。这些著述证明，虽然历史上的中国妇女受到许多限制，但是与同时期同阶层的欧美妇女相比，未必处境更糟，相反，家国同构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突显了在“家”中的妇女的重要性。这些著述以大量的妇女活动史料改变了中国妇女历来是牺牲品的形象，也提升了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对社会性别议题的关注。对中国史学界来说，这类著述不仅在方法论方面可以为我们打开视野，也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史的基调，分析“祥林嫂”一类再表现符号出现的历史背景，考察社会性别话语同现代性的关系，审视历史生产与国族主义的关系等等。但是，从国内对这些著述的有限讨论中可以看到，史学界对这些著述的具体生产背景没有表现出关注，也没有深入探究这些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的历史研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如果我们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到作者的结论上，可能会导致一些简单化的争论，如引出“中国妇女在历史上地位究竟如何”这类命题。你可以举出贾母来证明妇女地位高，她可以找个童养媳例子来说明妇女地位低。这种讨论难以深化认识，同时也会缩减这些译作的含义。更进一步说，了解海外中国研究的背景，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思考以中文写作的中国史

学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而不至于盲目地追随海外学者用英文写作时的关注点(这种关注点也总随“时过境迁”而转移)。总之,在对待外来学术的态度上,我非常赞同赵世瑜先生的观点:要说自己的话,但不要自说自话。^②特以此文奉给希望进行东西方学界关于女权主义学术对话的学者,并祈望发出自己声音的中国女权主义学术繁荣昌盛。

注释:

- ① 《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中文版题为《美国妇女自我保健经典——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知识出版社 1998 年 5 月出版。
- ② 美国妇女学发展的统计数字来自下列著述: Marilyn Jacoby Boxer, *Women's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lio: Histoire, Femmes, Society*, 2001; *A Dictionary of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 edited by Michael Payne,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Oxford, 2000, 第 570 页。
- ③ Neera Desai, *From Articulation to Accommodation: Women's Movement in India in Visibility and Power: Essays on Women in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Leela Dube, Eleanor Leacock, Shirley Ardener ed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Vina Mazumdar, *Whose Past Whose History, Whose Tradition?* unpublished paper.
- ④ Neera Desai, *The Making of a Feminist*, *India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Vol. 2, No. 2, 1995; Vina Mazumdar, *Whose Past Whose History, Whose Tradition?*
- ⑤ 由于妇女学在世界各地发展迅速,难以对最近的情况获得准确的全面统计。这儿的信息来自笔者近期参加的一些妇女学国际研讨会。全球各地妇女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不少有网站,下面这个网址提供各地机构的网址。

<http://research.umbc.edu/korenman/wmst/programs.html>

美国妇女研究方面有个协调组织“全国妇女研究委员会”，该组织的网站有不少美国妇女研究和妇女学教学发展方面的信息。网址是：

<http://www.ncrw.org>

- ⑥ 这儿使用的网上期刊资料信息由密歇根大学妇女学中心的图书资料员 Amy Robb 搜集，特此表示感谢。在此提到的期刊数字不包括商业性的妇女杂志。
- ⑦ 图书馆员对妇女学期刊的研究参见 *Women's Studies Serials: a Quarter - Century of Development*, edited by Kristin H. Gerhard, The Haworth press, Inc. New York, 1998。网络的发展为世界各地女权主义学者的沟通交流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核心期刊大多有了电子版，不过限于资源，并非所有欧美大学都购买了版权，欧美以外地区的学者上网阅读英文期刊电子版的机会更小。
- ⑧ 如果把中国放到女权主义学术发展的版图上，这个不平衡就更明显。中国在 80 年代中叶出现妇女研究热潮，其主要力量集中在政策干预上，对知识体系改造的学术力量较薄弱，至今中国主流学界对女权主义学术甚为陌生。在教学方面，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之前许多高校建立起妇女研究中心，但是跨学科的妇女学课程则在 90 年代末出现。近年来受到国际基金会的资助，许多高校学者在进行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程建设，下面的网址专为推动学科建设而设：<http://www.chinagender.org>，由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办。近期国内学者的社会性别研究发展参见：《社会性别》（第 1 辑），杜芳琴、王政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⑨ 女权主义学者对西方传统和当代理论流派的批评是女权主义理论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读者可从已经有中文译本的多种女权主义著述中看到各种批评。指出当代男性理论家的社会性别盲点的一个例子

是,凯瑟林·麦金侬对福柯的批评。她指出福柯对西方性话语的历史分析完全无视男性对女性的性压迫,包括强奸和性虐待这类历史上主要由妇女体验的经历。见 Catharine MacKinnon, *Does sexuality have a history?* in Donna Stanton ed., *Discourses of Sexuality: From Aristotle to AID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 ⑩ 较早表达黑人女权主义学者理论观点的文章见, *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in *Feminist Theory Reader*, eds. by 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 - Kyung Kim, Routledge, 2003, pp. 164 ~ 171; 另见文集,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eds. by Cherrie Morgag and Gloria Anzaldua, Persephone Press, 1981。
- ⑪ 此文的中译版已于 1997 年出版,但至今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甚至史学界主流的关注。见《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编,北京:三联书店,151 ~ 175 页。译文对斯科特的原作有个别误译与漏译之处,原作见: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6, Vol. 91, No. 5, 并收入斯科特自己的文集: *Gender and Politics of History*, ed. Joan Wallach Scot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8 ~ 50。
- ⑫ 斯科特, *Gender and Politics of History*, 34 页。
- ⑬ 斯科特, *Gender and Politics of History*, 48 页。
- ⑭ “对社会性别和政治的进一步思考”收入译文集《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主编:钟雪萍、劳拉·罗斯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1 ~ 21 页。此处引文译自原文。
- ⑮ 盖儿·卢宾的重要理论著述“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收入译文集《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21 ~ 81 页。把性活动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已出了许多成果,近期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是安·斯多勒的论文集《肉欲知识

与帝国权力:殖民统治中的种族与亲密关系》。Ann Laura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⑯ 美国《妇女史学刊》电子版首页, <http://muse.jhu.edu/journals/jowh>
- ⑰ 见“思考美国妇女史状况”,美国《妇女史学刊》2003年第1期,145~163页。这是一个专题讨论的记录,一些美国妇女史资深学者参与了对美国妇女史现状的讨论。格德·勒纳的调查显示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对史学界的深刻影响,“语言”的转向在美国妇女史研究中也非常明显,众多年轻学者的近期研究成果集中在文化和再表现方面。格德·勒纳提醒妇女史界不要忽略对社会和政治运动、社会组织 and 团体及其他非再表现领域的关注。
- ⑱ Tze - lan D. Sang,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 - 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⑲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 ⑳ *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 A Reader*, eds. by Susan Brownell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㉑ 国内已经开始对社会性别史关注,最突出的成果是杜芳琴的论文集《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其中与蔡一平合作的论文“中国妇女史学科化建设的理论思考”表达了作者们从新的理论角度对中国妇女史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文章对如何有效地利用外来理论来拓宽中国历史研究的路子做了深刻的思考。另见《历史、史学与性别》,李小江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 ㉒ 参见《历史、史学与性别》中实录的史学界对西方理论的讨论。
- ㉓ 《历史、史学与性别》,357~358页。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越界

作者 =

页数 = 238

SS号 =

DX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书名
前言
目录

录

前言

心智的选择

“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

——对当代中国女权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析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序

当代中国妇女研究

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

孔雀舞与社会性别

高等教育中的妇女学中美比较

——在“社会性别与教育”读书研讨班上的发

言

突破单一的“地位”分析框架

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

关于gender的翻译

妇女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

面对女权主义学术